

反右派雜文選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統一書號：3106·70
定 價：(5)0.30元

反右派雜文選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漢

反右派雜文選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譯、出版（武漢郵政特准掛號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開·4 3/8印張·99,000字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500

統一書號：3106·70

編者的話

反右派斗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深入地展开，为了配合这一伟大的斗争，我们特编选了这本反右派杂文集。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驳斥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和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二）批判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

收集在这本小册子里的43篇杂文，都是从各地报纸上选来的，这些文章对于右派分子经常用来攻击党的各种谬论，作了尖辛的讽刺和严正的驳斥；对于反右派斗争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错误思想认识，也作了严肃的批判。选用的这些文章，我们对某些篇仅作了个别词句的修改。由于时间匆促，未能一一征求作者意见，特致歉意。

编者 1957年9月

目 录

为什么要肯定成績?	景 吳	1
沒有党的領導, 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李宝恒	5
党領導的天下——人民的天下	金 重	11
駁“党天下”謬論		
不許誣蔑建党工作	李正模	17
駁斥右派誣蔑思想改造的謬論	全增嘏	20
关于“卖身投靠于党”	庄 农	24
一定要保护肃反中的积极分子	巨 掌	26
积极分子万岁!	天 馬	29
“应声虫”新解	昆崙山	31
“諾諾”与“諛諛”	陳 楚	35
从中国的“受禪”到西方的民主	阮延順	37
論“哇啦哇啦”	岳 軍	40
談“有职无权”	党 哉	43
談“称职”	周鴻印	45
談“干部自由市場”	聞 达	48
誰是外行	韓 言	49
在党性問題上駁斥右派	馬 司	52
略論人性和党性	馬俊芝	57
反革命的“人性論”	張嗣澤	64
論“人的尊嚴”	左 艾	68
談認六亲	周光廓	73

談“人情淡薄”	沈半丁 75
我們提倡怎樣的獨立思考	曾習三 77
也談“發展個性”	群芳 82
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	汪子嵩 87
立場和動機可以截然分開嗎	季申 92
談“士可殺不可辱”	朱微園 95
“士為知己者死”	唐駿 98
厚顏無恥之“士”	施文遜 100
“叛逆性格”	姚以鏞 102
慘痛的教訓	巴金 104
——“過關談”之一	
“國士論”	巴金 106
——“過關談”之二	
談黨內的右派	許邦儀 108
對黨內右派分子不能心軟	許邦儀 110
右派隱形術	阮延順 112
反右派要狠	禹材 114
致“最大的善意”論者	昌達 116
是非和溫情	何明 118
疑慮和溫情	原應南 120
應不應該“一棍子打死”？	星環 124
論打“落水狗”並不違反忠厚之道	顧言 126
在“給黨員提意見”的背后	德麟 128
是“說錯了話”嗎？	丁冲 131
斥“惜才論”	張起 134

为什么要肯定成績？

景 吳

我們做工作，一般的总有成績和偏差。我們同志，一般的总有优点和缺点。成績和偏差、优点和缺点往往是互相对立、互相联系的，它們构成了我們的工作結果和思想特征。正确地估計这两方面，才能使我們正确地認識客觀事物，得出正确的經驗和教訓，确定繼續前进的方向。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很想抹杀我們的成績，夸大我們的缺点，并利用我們的缺点向我們进攻。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們除了用指白为黑的手段进行顛倒是非之外，并提出了只許講坏，不許講好的口号，作为抹杀成績的手法。右派分子黃紹竑說：強調了成績便会掩盖錯誤，不強調成績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人民都会知道的。右派分子陈銘樞則說：“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

要不要講成績呢？肯定是要的。尤其是在右派分子企图抹杀我們的成績的时候，我們更要大講特講。成績是客觀存在的，但人們認識成績如同認識任何客觀事物一样，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成績和自己的优点，如果不經過一番总结，他也不是十分清楚的，至于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以至我們国家的成績和优点，本来是有目共睹的，但要做到完全了解也并不容易。而且，有时因为人們的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觀點和方法不对头，往往会为某些現象所蒙蔽，把成績、优点看

成了偏差和缺点，这也是常有的事。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前夜，不是有的人竟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富农或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认为农村合作化事业没成绩，应该下马吗？这个事实不仅说明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对成绩和缺点的估价不同，而且因为错误地过低估计了成绩，因而也就丧失了前进的信心，看不到工作的方向，得不出正确的工作经验。这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从另一方面说，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成绩也就是对敌斗争的战果。大家知道，军队打仗没有不统计战果，宣扬战果的，这叫做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我们每年“五一”劳动节、国庆节游行的时候，总要扛出我们的成绩，这对人民来说是庆祝，对敌人来说便是示威。我们的敌人总是歪曲事实，造谣污蔑，想否定我们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强调成绩的一面，这就有利于敌人的活动。

不提优点只提缺点，是否符合整风精神呢？什么是整风精神？这就是治病救人，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替人治病，一定要全面了解病人的健康情况，如果只看到他不健康的一面，而看不到健康的一面，那么，不仅病人会失去信心，看病的人也会失去信心的。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这个愿望不是空洞的，必须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这就是说，批评时还必须看到对方有优点存在，有积极因素存在，如果认为对方一无是处了，那还有什么团结的基础呢？因此，只提缺点，不提优点，并不符合整风精神。右派分子所以这样提，显然是歪曲整风的精神，以此来向党进攻的。

在肯定成绩，肯定优点的条件下，如何向对方提意见，那就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方法问题是依具体条件为转移的。对有些人可以正面先谈优点，再谈缺点；对另一些人可以先谈缺点，再谈优点；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只谈缺点，也不是不可以的。

事实上，成績和偏差，优点和缺点往往是密切相联的，机械地划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你在考虑缺点时，如果不考虑优点，这个缺点便不会恰如其分；反过来，在考虑缺点的同时又对比了优点，对这个缺点的估計，就会比較恰当些，这时候，即使你在談別人的缺点，也不会抹杀別人的优点。可見，这个提意見的方法問題，也还离不了治病救人、实事求是的方針問題。

以上这段話是就批評者这方面來說的，至于被批評者，他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評，都应抱“言者无罪，聞者足戒”的态度，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肯定优点、实事求是地提出对缺点的意見來才接受。

肯定成績、肯定优点，会不会掩盖偏差和缺点呢？这个問題的关键是在于对待客觀存在的成績和缺点采取什么态度。在胜利和成績面前冲昏头脑，把成績看成是私有财产，是自己单独創造的，居功自傲，并要求論功行賞。这是一种态度。在我們现实生活里也有这种人，他們有較濃厚的剝削階級的个人主义思想，有了几許成績便驕傲自滿起来，不仅貪集体之功以为己功，甚至捏造成績，謊报邀功，以此作为向上爬的資本，作为掩盖缺点的护身符。这种人虽是个别的，必須坚决反对。但即使对于这种人，我們如果不端正他对待成績和缺点的态度，光講缺点，不講成績也是不解决問題的。还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态度。共产党人本着对人民負責的精神，从来就严格地实行批評与自我批評，努力与偏差、缺点作斗争。在共产党人看来，成績是人民創造的，是正确貫徹党的方針政策的結果，它也不是什么个人向上爬的資本；在共产党人看来，工作取得了成績，事物便向前发展了，如果我們主觀不努力，就要落后于客觀了，就不能繼續前進了。事实說明，共产党人正是不断地吸取了前一阶段的經驗，更有信心地前進的。1949年全国胜利的前夜，

党中央和毛主席便向全党发出号召，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党号召所有党员提高警惕，适应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虚心学习自己所不会的东西。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分析了新形势和新任务，要全国人民虚心学习，艰苦奋斗，并作出了整风的决定，以克服思想落后于实际，主观落后于客观的情况。这都充分地说明了共产党永远不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永远是虚怀若谷。右派分子说，讲了共产党的成绩和优点，共产党人便会掩盖错误和缺点，这是没有丝毫事实根据的。右派分子这样提出问题，目的在于只许他们说坏，不许别人说好，使人们看不到党和国家的成就，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疑，对前途丧失信心。右派分子的这种阴谋，现在已被揭穿了。

右派分子是别有用心地来看待我们的缺点的，他们把我们个别的、暂时的、局部的缺点，总是夸张为普遍的、永远的、全部的缺点，把不严重的也说成是严重的。同时，他们对缺点的产生，完全抹杀许多复杂的原因，而一概归罪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归罪于无产阶级专政，总之，是归罪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上面。这不是什么批评缺点，这是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我们在工作中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我们知道，我们的各种具体的偏差和缺点，都是在前进中不断产生的，而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它能够发扬我们国家干部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特别是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成绩总是基本的，缺点、偏差总是个别的、暂时的，而

且是会及时地加以克服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对待成績和缺点的問題上，是有不同的立場、观点和方法的。只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績和認清缺点，正确地理解我們为什么能取得成績，認清缺点的性質和它产生的原因，我們才能在胜利的基礎上，不断地巩固并扩大我們的成績，不断地克服缺点，不断地前进。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的叫囂是吓不倒我們的。我們要堅決、彻底、干淨地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繼續前进。

(1957年8月29日“解放日报”)

沒有党的領導，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李宝恒

沒有党的領導，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沒有祖國的獨立富強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这个顛扑不破的真理，已經为我国广大人民牢牢地掌握，在宪法中也已經明文規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以保証我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得以順利实现。

資产階級右派也懂得，只要取消了党的領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就不能成功，資本主义复辟的阴謀就容易实现。因此，他們向工人階級发动猖狂进攻时，就必然要把斗争的鋒芒对准着領導中国人民堅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的中国共产党。他們把党的領導說成是“党天下”，誣蔑“党是宗派主义的根子”，并为否定或削弱党的領導找寻各式各样的“理論根据”，說什么“党是階級斗争的工具，革命时期需要

党，建設时期不需要党”，“党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党不能领导高等教育”，“党不能领导文艺”，……要党退出领导。这些谬论曾经造成了一部分人思想上的混乱，因而必须加以澄清。

建設社会主义要不要党领导？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斩钉截铁的。我们认为，建設社会主义，必须由党来领导，绝对不能否定或削弱党对革命和建設事业的领导权。

右派理论家们否定或削弱党的领导权的理论根据之一，是说：“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时期需要党，建設时期不需要党”。可是，这种谬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无论国际或国内，都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它集中地表现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五大运动中，以及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国内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虽已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展开的这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恰好证明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至于国际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严重的阶级斗争，那就更不待言了。

其次，我们不能把建設社会主义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好象只要能够掌握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就能解决问题似的。

掌握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离开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成繁荣幸福的

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单单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建成。科学技术，按其客观内容来说，对各阶级是一视同仁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服务，也可以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科学技术，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支配之下，只能使剥削和失业扩大，引起危机和战争，它给劳动人民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技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是劳动人民用来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强有力的工具，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科学技术，一旦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对社会主义事业起消极作用。例如，我国著名建筑科学家梁思成，曾经提倡过复古主义的建筑理论，这种理论使大屋顶风行一时，造成了基本建设工作中的严重浪费现象。幸亏党及时批判了这种错误理论，指出它违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之一——增产节约，才使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错误迅速地得到纠正。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党的领导。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掌握和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善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 and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为指南，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规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善于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艰苦奋斗，才能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因为，一、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党的坚定不移的目的，就是要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是中国人民历来所憧憬的大同世界。二、党的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党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就提出

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又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明确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和政策，保证了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三、党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是党做一切工作的传统作风，党是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大团结的核心，只有党才能团结最大多数群众。

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而且，在我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政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如此伟大的理想。

右派分子所谓“不要共产党领导，也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谬论，是无稽之谈，是欺人自欺。请问：现在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有那一个国家不是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呢？又有那一个国家，不要共产党领导，也在建设或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呢？

任何国家不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现代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經驗，都一再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否定或削弱党的领导权，只能加强资产阶级的影响，帮助反革命复辟。

党能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复也是肯定的，斩钉截铁的。党能够，而且也只有党能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右派分子制造“党不能领导……”论，是为了逼党下台，让他们上台。可是，这种“理论”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事实胜于雄辩。解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已經証明了党不仅能够領導社会主义建設，而且領導得很好。这个事实不論从工农业生产或經濟文化建設那一方面來說，我們都可以举出一系列数字来加以証明的。这些得来不易的偉大成就，不都是在党的領導之下取得的嗎？从这些鉄的事实中，必然得出的邏輯結論，只能是，党能够領導社会主义建設，而且領導得很好。

为了弄清楚“党能不能領導一切”的問題，我們首先要“何謂領導”這個問題弄清楚。我們所理解的“領導”，是指党对于一切工作在政治思想上、方針政策上和組織上的領導，而不是要党去解决一切單純技術問題，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們說党应当而且能够領導一切。

例如，拿党对于科学事业的領導來說，主要的也是指党在政治思想上、方針政策上和組織上的領導。几年来，党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針、政策，如科学事业必須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方針，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方針，国家建設需要和科学家的个人专长相結合的方針等，这些方針对于发展科学事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去年，党又根据国家建設的現狀和任务，根据国家建設对科学的目前的和长远的各个方面的需要，領導科学家制訂了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将促使科学事业更加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推动科学工作有計劃地迅速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至于几年来党在团結和改造科学家方面所做的工作，其成效显著，更是人所共知的。党是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但它沒有必要去直接为一切学术問題下結論，这些一般是科学家的事情。党对学术問題的領導方針是百家爭鳴。党主張，学术問題应当通过学术界的自由爭論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反对輕率地作結論，因为，真理是在不断地同謬誤作斗争

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因此，它当然也是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百家爭鳴的方針符合真理发展规律的要求，符合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要求，因此它一定能够引导和推动科学进步，加强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解放以来，我国科学事业的规模和科学工作的队伍，都大大地扩大了，科学水平也提高了，百家爭鳴方針提出以来，学术界特别是生物学界、史学界和哲学界都出现了生气蓬勃的自由讨论的学风。这一切证明了党对于办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很内行，证明了党能够领导科学工作。

誠然，党对于某些具体业务問題，还不够精通，甚至还不太熟悉，这一点，我們从不諱言。党是实事求是的，党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来不强不知以为知。不过，我們从不安于做外行。党总是要求自己的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善于学习乃是我們党的特点。在党成立之初，我們对于革命，也不那么内行；在南昌起义时，我們对于革命战争也不那么内行；在革命根据地剛建立的时候，我們对于政权工作也不那么内行。可是，由于我們善于学习，我們不仅学会了，而且学得很好。我們有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作我們的良师益友，我們有充分的决心和信心精通一切，把社会主义建設领导得很好。国际资产阶级早就誹謗过，布尔什維克只会破坏，不会建設，嘲笑共产党这也行、那也不行。今天，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又在重复这些早已被苏联共产党粉碎了的謠言，其結果当然只能在现实面前幻灭。

(1957年9月13日“解放日报”)

党领导的天下——人民的天下

駁“党天下”謬論

金 重

儲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謬論，把今天党领导国家的局面誣說成共产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其最狠毒的用心就是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对立起来，暗示今天根本談不上人民的天下，人民要坐天下，就要起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的领导在哪些地方竟然妨碍了人民坐天下呢？儲安平說：“在全国範圍內，不論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細，都要看党员的顏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而党却要把他們“安置在各种崗位上”。照他的意思說，共产党既专权，又用人唯私，和封建帝王专制时代的“莫非王土”簡直沒有两样了。

共产党员做“头兒”，是社会主义建設需要

儲安平当然是恶意夸大了事实。在我們国家领导机关和經濟、文教事业的领导部門中，許多的非党同志在担任领导工作。有时他們担任正职，而党员則担任副职。而在一个科或一个組中，沒有党员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非党同志的职权一般的是受到尊重的，即使有些地方未受到充分的尊重，党也一直認為这是不合理的現象。在他們的职权範圍內，許多事情也都要他們“点了头”才算数。

儲安平的确也說到了今天的一些实际情况：許許多多单位，

都有共產黨員做“頭兒”；許多事情是要共產黨員“點了頭”，表示了意見才行得通；許多黨員的確在他們的崗位上還不是內行，等等。問題是對於這些現象，儲安平有儲安平的看法，人民有人民的看法，看法完全不同。

既然是人民的天下，為什麼到處都要有一個共產黨員做“頭兒”呢？這是人民的需要。人民根據常識懂得不管做什麼事，沒有“頭兒”是不行的。誰來做“頭兒”呢？人民信任共產黨，信任共產黨員；當然也信任黨或黨所領導的政府所委派的非黨人士。人民不是希望共產黨員的“頭兒”越少越好，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共產黨員做“頭兒”，同時也希望更多的非黨員的“頭兒”（包括許多專家）成為黨員。

共產黨員做人民的領導幹部並不是自封的，一般地說，他們是在鬥爭中成長起來和湧現出來的。由於群眾水平不齊、覺悟程度不齊，自然地會接受能引導大家走上正確道路的先進者的指揮。有人說：以前搞武裝鬥爭、階級鬥爭，共產黨員強，今後搞建設了，就不要共產黨員做“頭兒”了，這是謬論。我們是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可是這終究是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資本主義建設或其他什麼建設。而社會主義建設並不是任何人都喜歡、都習慣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當然是極不滿意社會主義的，比如他們提出不要黨領導文化事業等等，其目的已經證明是要把我們的文化建設事業調一個方向，不是建成社會主義，而是建成資本主義。他們的這一陰謀還曾經在一些認識模糊的人中引起共鳴。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階級鬥爭仍然存在，仍然需要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共產黨做核心，帶領人民，教育人民。社會主義建設不象資本主義建設那樣無政府狀態的自由競爭，為了資產階級的私利，置人民的巨大損失於不顧。比如因生產不平衡引起經濟恐慌，因供求

不平衡引起物價暴漲暴跌，等等，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司空見慣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允許這種無政府狀態。這就要求人們更多發揮主觀因素的作用，掌握社會發展規律，有計劃地去安排社會生活的各個部門，及時地發現與解決矛盾。在今天，誰最能掌握社會發展的規律呢？這就是長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自己，並經過無數次考驗的共產黨。由此可見，在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黨的領導不是更加不重要了，而是更加重要。

儲安平可能會為自己辯解說：“我並沒有否認黨應該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我只是反對到處安排共產黨員做頭兒。”的確，儲安平是這樣說的，但這正表現了右派分子的陰險、狡猾，他們繞了一個彎子，以反對黨的組織路線來達到取消黨的政治路線的目的。我們知道，如果沒有許多黨員幹部在許多崗位上擔任領導職務，黨的政治路線、方針、政策就只能是空中樓閣，就永遠不可能實現。為什麼呢？因為：（一）無產階級的政治路線不可能依靠非無產階級的人來貫徹，只能依靠無產階級自己的覺悟較高的幹部，或出身於剝削階級但經過改造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化的幹部來貫徹。立場問題永遠是首要的問題。比方說，依靠工人办好企業的社會主義經營管理方針，難道能夠讓給與工人還格格不入、缺少共同思想感情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去實現嗎？今天我們的建設事業只有兩個方向，即社會主義方向和資本主義方向。堅定地代表着社會主義方向並執行符合於這一方向的政策，是工农基本群眾，它的先鋒隊和領導者——共產黨及其黨員。頑固地堅持資本主義方向的是資產階級右派。介于或動搖於這兩者之間的是一般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當然他們裡面也有不少人是左派，但他們中左派的形成，正是由於有共產黨的領導，由於他們緊密地依靠黨的領導。）取消了共產黨員的領導，這意

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党的正确的政策无从实现，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影响将加强，我们的建设事业将被引向资本主义方向。既不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又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影响的“真空”状态，是不可能有的。（二）共产党员干部经过党的挑选和教育，经过各种运动的锻炼，一般说，比较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有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作风，这就使他們能够较好地领会党的路线、政策，较好地贯彻这些路线、政策。（三）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还必须要有组织的保证。共产党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统一的整体。共产党员担任各项工作岗位的领导职务，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才会是坚定不移的。从上面三点看来，共产党选派自己的党员干部担任各项领导职务，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到处党员做“头儿”的局面是不得不然的。当然储安平之流会以他們的毒舌肆意诽谤，但这吓不倒我們。因为我們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到处是共产党员做“头儿”也是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并不象那些资产阶级党派“结党营私”，见不得人。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共产党员从来就是当仁不让的。

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事实已经驳斥了这种论调。的确，在不少单位里做“头儿”的共产党员对业务并非内行或还不精通，可是他們中大多数人还是做好了工作。因为要做好工作，领导者具备一定的才能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依靠党和依靠群众。党中央和毛主席掌握了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政策，党员干部能具体地贯彻这些政策，依靠广大群众一起想办法，并依靠与专家合作，工作就能做好，这是许多事实证明

了的。儲安平說黨員干部不稱職，誰比黨員能領導得更好呢？被儲安平奪取了領導地位的“光明日報”，我們已經領教過了。

黨員領導干部當家，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

“到處是共產黨員做頭兒，事事是這些共產黨員頭兒做主，這樣還算人民當家做主嗎？”從機械的觀點去看，是容易搞不清的；可是用辯證的眼光看，這就不難解釋。群眾是國家主人，應該當家做主，在我們國家里，一切重大的方針性的問題都是經過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共產黨也從來就鼓勵人民積極參加國家的管理和政治、社會活動。可是即使在一個合作社里，也不可能什麼事都開大會決定。特別今天有許多事業是全民所有的，能不能什麼大小問題都來個全民討論，才體現全民做主呢？當然更不能。可見人民群眾作主必然要通過領導人作主來體現。今天的問題是這些當了領導人的共產黨員是不是聯繫群眾，能不能有事與群眾商量着辦，具有民主作風。如果是的，那麼由共產黨員做的“頭兒”作了主，就是人民群眾做了主。共產黨員不是資本家、剝削者，他的工作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產黨員是人民里面的先進分子，在黨的教導下，一般的能聯繫群眾，代表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他們有些人在作風上滋長了三個主義，因為不是立場的問題，也是容易改正的。由此可見，共產黨員當家，並不影響人民當家做主，恰恰相反，這是人民當家作主的表現。

“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眼色行事。”這話是儲安平的“歪曲報道”，好象人民群眾成了黨員的臣屬了，可是這句話也反映了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享有高度威信，人民很願意聽共產黨員的話。共產黨在群眾中有高度威信，這是好事。人民群眾緊密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行動一致，是解放以後許多巨大成就的

基础，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的保证。可是在仇视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眼里，这就是“可怕的集体”。他们必欲打破这一集体而后快。储安平大叫共产党员事事做主威胁了人民做主的权利，其实并不是为人民着想，而是因为党员代表人民作主就使右派分子做不起主来。共产党当家，要将人民带到社会主义的美满境界去，因此就不允许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民主”，比如就不允许右派分子有放火放毒而禁止别人干涉的“自由”。右派分子对此是不甘心的。徐铸成阴谋使“文汇报”成为攻击社会主义的障地，由于同时也有党员做“文汇报”的“头儿”，他就难于施展，因此，他就拚命要排挤共产党员。右派分子储安平叫喊人民不能做主，其实质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有人民的天下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的天下。这是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在今后，这仍然是真理。共产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火车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就只能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有人民的天下的。谁看到在资本家私有的工厂里，工人能够当家做主呢？

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保卫党的领导，也就是保卫人民的天下。

(1957年8月22日“解放日报”)

不許誣蔑建党工作

李 正 模

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的总攻击中，对党的組織建設也进行了恶毒的誣蔑。他們抱怨“解放后共产党組織发展得太快了”，反对共产党在知識分子中发展党员，說什么“共产党在知識分子中发展党员与民主党派在知識分子中发展党员有矛盾。”他們还毫无根据地誣蔑共产党只接受那些“打击別人、抬高自己”，“阿諛逢迎，吹牛、拍馬”的人，而不接受那些所謂“不肯对党盲从”的人为党员。右派分子的用心是很恶毒的，他們企图降低党在人民中的威信，达到“平起平坐”，进而推翻共产党的目的。

共产党在解放后几年中发展得太快了嗎？据1957年公布的材料是1 200万人。实际上解放后 8 年中增加600多万党员，即增一倍多一点。其中1955年到1956年发展党员比較多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处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形势下，各方面涌现出了大批的經過各次运动鍛炼、对党有認識的优秀分子，他們积极要求入党，党接收了其中基本上合于党员条件的人，这完全是正常的。我們知道，在解放后几年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发展得非常迅速，特别是当国家进入計划經濟建設以后，各方面都需要加强党的领导，而加强党的领导就必得要在全国各方面、各部門建立党的組織和发展一定数量的党员，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不这样作就要犯历史性的錯誤。就目前党员人数在全国人民中的比重来看，現有1 200万党员，只占六亿人民的 2 % 左右，这个比例数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太大。苏联現有700多万党员，占全苏联人民的3%以上，我国还没有达到苏联的比例，能說我們的党员发展多了嗎？右派分子的攻击

是沒有根据的。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这样进行攻击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党的力量壮大了他们不能“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一句话，他们是要共产党停止发展，让他们发展，以便他们在力量充足的时候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以章、罗联盟为首的民盟右派集团不是提出了要在一定时期内发展一、二百万盟员的任务吗？事实上，据最近已揭露的材料，如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右派分子的操纵下，已经在全国各地大肆发展党员，把形形色色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都拉入他们的组织内。自然，民主党派在共产党政治领导下为了更好地团结群众，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组织是需要的，但是，他们的发展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利益，必须保证不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有人想以扩大组织来达到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目的，那是决不为人民所容忍的。

右派分子特别怨恨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所谓“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与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有矛盾。”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要共产党退出知识界，由他们独霸，并以此作为向党发动全面进攻的基地。共产党能不能退出知识界呢？决不能。知识界是一条重要的战线，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当然也必须领导知识界，必须在知识界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展党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知识分子走上为工农服务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事实上，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他们决不容许右派分子把他们引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路上去。

共产党接受党员从来就坚持高度的党员标准。列宁说：“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壮耀观瞻，而是为了进行森严的工作。”“装饰门面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我们也是不收的。”中国共产党一贯遵循列宁的指示来进行建党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

員，他必須是工人階級中最優秀最覺悟的分子。如果不是出身於工人階級，他就必須脫胎換骨，拋棄自己原有的階級立場，等到具備工人階級的立場才能入黨。黨章第一條規定：“任何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承認黨的綱領和黨的章程，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并且按照規定交納黨費的，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這就是說，入黨的人，首先必須是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勞動者。其次他還必須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有起碼的認識，並加以承認。同時更重要的是要把這種認識體現在實踐上，那就是他必須把個人的意志和黨的意志融為一體，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進行積極的工作，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決議和遵守黨的紀律。這一條很重要，這是從事實上來檢驗每個入黨者是否真正具有共產主義覺悟。此外，還有按規定交納黨費的條件，這也是為經常檢驗黨員組織性所必需的。從這些條件可以看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加入共產黨的。那些抱有個人企圖而對黨採取阿諛、逢迎、吹牛、拍馬的人就根本不能入黨的。

共產黨員對黨的服從是完全建築在自覺的基礎上的，決不是右派分子誣蔑的所謂“盲從”。因為每個黨員都懂得，沒有黨的整體的利益，就沒有黨員個人的利益。所以，當他們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而服從黨的利益。

黨接收黨員除了一貫堅持高度的黨員標準以外，還一貫堅持按個別吸收的原則。這就是說，每一個入黨者，事先得經過系統的教育和考查，然後分別地、一個一個地按黨章規定履行入黨手續。即有正式黨員二人的介紹、支部大會通過和上級黨委的批准。這些嚴格的入黨手續保證了黨接收的大多數黨員符合標準和防止了壞分子的混入。

当然，也有个别党组织或由于粗率大意、工作不深入，或由于坏分子伪装得特别巧妙，以致接收了少数不够标准的人和个别坏分子。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也并不可怕。我们党有经常的思想教育，有一定时期的整风整党，这就能够保证党不断提高党员质量和不断把坏分子清除出去，纯洁党的队伍。因此，右派分子诬蔑我们党的质量在“逐步下降”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已经向全党提出了为更高的党员标准而斗争的任务，我们坚信，在全党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认真地执行这一任务之后，我们党必将在前进途中大大地迈进一步。

(1957年9月3日“重庆日报”)

駁斥右派誣蔑思想改造的謬論

復旦大學教授 金增嘏

所有右派分子总是把好事說成坏事；因为我们所喜欢的就是他們所憎恨的，我們認為好得很的东西他們总認為是“糟得很”的东西。很多右派分子就把思想改造說成“糟得很”。孙大雨說，思想改造把思想改“糟”了；王恒守說，思想改造是“镇压”知識分子；徐中玉說，思想改造中利用学生和助教正象利用貧农斗争地主那样来打击老教师；臭名昭著的六大教授之一的右派分子曾昭掄也說，思想改造运动是不合乎知識分子的思想发展規律的。我們必須把这些对思想改造加以誣蔑的右派言論加以駁斥。

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經

說得很清楚了。他說：“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許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識分子为誰服务的問題。”他并且指出，显而易见，沒有这个运动以及其它如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运动的胜利，便不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時間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与肃反一样，思想改造也为社会主义事业鋪平了道路。沒有这五大运动，就不能保証三大改造的順利进行。因此对思想改造的成績是絕對不能怀疑的。

通过思想改造，我們同三大敌人划清了界綫，和資本主义与資本主义思想也初步划清了界綫，換句話說，分清了劳动与剝削的界綫。很多人都暴露了自己的或檢举了別人的貪污行为。以复旦大学而論，繳出的脏款就有3亿(旧币)多。不但如此，在思想改造的同时还进行了忠誠老实运动，繳出了反动的証件等等，拿复旦來說，自动繳出的武器就有61件之多，很多人并把隱瞞的政治或历史問題都老老实实交代了出来。通过了思想改造，学校內部的团結也加强了。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也初步受到了批判。正因为如此，院系調整这个偉大措施才能实现。教員們的工作态度与劳动态度通过思想改造也有了改进，为以后的教学改革創造了很好的条件。

思想改造主要是改变我們的立場，叫我們走到为人民服务的立場上来。立場的改变主要是靠自己，这当然是要經過一番思想斗争的，而思想斗争是个痛苦的事。但是經過斗争，放下思想包袱以后，就感到輕松愉快了。同时，思想改造也得有外力的推动，他人的帮助是不可少的。一方面，要有自我批評，另一方面，也要別人批評和提意見。我自己深深体会到，別人的批評尖銳有好处。因为意見提出得不够尖銳，就不能刺痛自己、打中要害，也就不容易促起反省和檢查，使自己有所覺悟，把

錯誤的思想扭轉过来。

右派分子对于思想改造的成績一笔抹杀，完全加以否定，难道是他們真正瞎了眼睛看不见上面所說的这些成績么？不是的，他們的眼睛并没有瞎，而是他們看見这些成績根本就不高兴。思想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建設鋪平道路，但右派根本就反对社会主义。他們坚持他們的反动立場，他們要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資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們必然会抗拒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在內。他們是从根本上，从本質上否定了思想改造这个运动，因为他們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反动立場。他們坚决要为資产階級、資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服务，而不为工人与农民、不为人民、不为社会主义服务。

右派分子常說思想改造太粗暴，言下之意，他們只是对于这个运动进行的形式或方式有些不滿。这也是他們的一种障眼法。事实上，他們不只是从形式上而更主要的是从本質上、从根本上来否定思想改造这个运动。在思想改造中，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說，做法或許往往有些“粗糙”，但“粗暴”二字可用不上。譬如，在思想改造时，有些工农干部对知識分子提出意見时往往是很坦率的，但决不能把这种坦率說成是粗暴。这也正是資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知識分子應該向工农学习之处。我們这些人提意見时往往是轉弯抹角，吞吞吐吐的，解决不了什么問題。只有用思想見面的办法最能接触思想，只有用坦率的提意見的办法最能考驗我們，使真正愿意改造自己的人們，也能以同样的坦率的态度来对待提意見者的坦率的态度，把自己的問題无保留地完全摊开出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才能够收到真正思想改造的效果。

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有的五大运动都起了思想

改造的作用。党平时也在关怀我們，教育我們，所以，就是不在运动的期間，真正愿意改造自己的人，在工作中学习中也无时无刻不在党的帮助下进行自我改造的工作，也无时无刻不深深体会到“教育者本身必須受教育”这句话的深刻的意义。总的說，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績是要肯定的，思想改造必須不断地进行也是肯定的。人民決不容許右派分子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績，誣蔑思想改造以及三反、肃反等运动，或企图进行倒算。

在我校整风运动开始时，有一位教授向党委書記楊西光同志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将来会不会再来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再来整我們一下？”这里的“整”字，意味着是对知識分子的打击报复，这种提法根本上是錯誤的，同时这位教授也沒体会到我們应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是說經過一次思想改造运动，过了关，就算完事。

拿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來說，这对我們每个人都應該起一个思想改造的作用，使我們每个人都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在斗争中提高認識。这次的运动使我們在党的教育之下又一次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課。从这次运动来看，更加說明了知識分子必須不断地改造自己。

对右派分子來說，这次斗争也是一場思想改造，但首先他們也必須認識这也是一場严重的政治斗争。他們的思想必須改造，这是十分明显的了，但在接受改造之前，他們首先必須彻底交代自己的問題，向人民投降，低头認罪。我們不能允許他們把他們的問題說成只是一个思想問題。他們現在最主要的是首先拿毛主席的六項标准来衡量一下自己的言行，好好地老老实实地交代。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寬恕，然后再老老实实的改造自己。

(1957年8月22日“解放日报”)

关于“卖身投靠于党”

庄 农

“卖身投靠于党”，是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员的恶骂。这引起了共产党员们的愤怒。愤怒者之所以愤怒，是看穿了恶骂者意在把党员与党离间开来，使党员“独立”之后，来消灭共产党。这当然是右派分子们的一种自我陶醉的梦想。

对于共产党员，本无所谓“卖身”。“把一切献给党”！是我们入党时就庄严地宣布过的。献（不是卖）出的岂止“一身”呢？封建社会里的“卖身为奴”，是谈不到“卖出”一切的，因为奴隶决不肯出卖他们对封建主的仇恨。至于历来那些认贼作父、卖身求荣的败类们，“卖身”也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还在“求荣”，那是更谈不到卖出“一切”的了。至于共产党员为了人民，为了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是真正要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无数共产党员用鲜血向人民说明了这一点。这正是我们的莫大光荣！

对于共产党员，就更加谈不上“卖”。共产党员之要参加共产党只有一个最崇高的代价：“取得全人类的解放！”除此以外，是再没有任何代价的。既没有想到过索取什么代价，也不要从中取得什么私人利益，因此在发展共产党员时，也就没有摆过什么丰盛的筵席，或者是付出过车马费之类。如果说，担任某种工作职务的党员，取得了一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对此，我们是问心无愧的。问心有愧的，倒是那些拿了人民的钱，不真心为人民办事，却还要处心积虑地来反对人民的右派分子们。共产党员由于忠实于党而被右派分子诬蔑作“卖身投靠于党”，应

該引以為榮，理直氣壯！

不能說，在我們黨內，沒有抱着“賣身投靠”想法的投機者。但是這些人，並不是右派分子所要罵的；而是右派分子在共產黨內的伙伴。就是在平日，他們也總要表現出與黨不同的立場。作過13年共產黨員的劉賓雁不就說：“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黨是自己的。”他們懷揣二心，不僅不肯獻出一切，就連毛髮也是不肯輕易交出些許來的。因為他們入黨就是想謀自己的利益，就是想作買賣。這也是一種定律：愈是想到“賣”，便愈是索盡量高的價，而盡量少的付出東西。在黨的歷史上出過陳獨秀、張國燾以及大大小小的在緊急關頭叛黨的人；在現在的右派頭面人物中，有些也曾是作過這種“買賣”的。這次反右派鬥爭中，黨內又出現了這樣一些人：他們看到頭頂上有了一些烏雲，眼前刮起了一陣邪風，便以為“靠山不穩”了，賣身賣錯了，於是便一面苦喪着臉大叫“黨員也有苦衷”，“我過去是被黨利用了”，一面便“站出來”、“起義”，反過來向黨進攻了。其實，並不是他們真的“弄明白”了一些什么，只是借此刷上一層便於向另一家“賣身”的色彩而已。

這種人“站出去”了，對我們來說，只有好處；這種人中還有些未曾來得及站出去的，倒是值得他們好好考慮考慮：倘不去掉“賣身投靠”（也要脫胎換骨一番的）的想法，遲早也會“站出去”的。在我們黨內來說，這種人是我們最沉重的包袱，雖然，在他們沒有“站出去”以前，我們總是要盡量挽救他們的。

惡罵者會說：這是提倡黨內的盲目服從，保護教條主義者。答曰未必。我們黨內是有教條主義者的，這種人也是力求把“一切”獻給黨的，但還遠未作到“全部”。身是獻出來了，但腦子還獻的十分不夠，因此還常常不自覺地表現出與黨的要求相左的現象。共產黨要求黨員獻出“一切”，是包括着要黨員克服教條

主义的。右派分子們虽也不喜欢党员中的教条主义者，但实际上却不是反对教条主义，因为他们明白，保留着教条主义，进攻起党来是要容易得多的。

教条主义者，有了献出“一切”的意愿，经过严重的努力，是可以逐步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许多人就是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能够解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升发到完全献身于党的程度，是人的莫大光荣，也是人生的莫大幸福。

(1957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一定要保护肃反中的积极分子

巨 掌

右派分子在向党、向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同时，还穷凶极恶地对积极分子、特别是对肃反积极分子大肆诽谤、诋毁。他们血口喷人地谩骂靠攏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是奴颜媚骨、阿諛奉迎、投机取巧的尾巴分子，咒骂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勇士为走狗、奸细、特务，是没有灵魂的人，是血手起家的“暴发户”，等等，不一而足，把积极分子咒骂得“一文不值”。个别单位的右派分子甚至肆无忌惮地包围和斗争积极分子，妄图把积极分子一棍子打死。

我們所称的革命的积极分子，是指那些具有必要的社会主义觉悟，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历史清楚，立场坚定，能坚决地同国内外敌人和一切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坏人坏事展开严肃的斗争；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

主义觉悟程度和科学知識水平，积极参加生产建設工作；能联系群众，并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去推动和帶領群众，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不懈的人們。

党正是依靠了广大积极分子的带头、骨干、桥梁作用，依靠他們同群众一道，經過不屈不撓的努力，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成就。同样，肃反中的积极分子是党在肃反战綫上的有力助手，他們在党的领导下，是和人民群众站在一道最坚决地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勇猛战士。为了贯彻执行党所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針，他們不仅积极地响应了党的号召，团结教育群众，克服右傾麻痹思想，大胆揭发检举，对反革命分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而且为了进一步弄清許多人的政治問題，还不辞艰辛地披星戴月，櫛风沐雨，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冒着严寒与酷暑，置飢餓于不顧，日以繼夜，有的虽磨破了脚底，感染了疾病，仍坚持不懈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給他們的調查任务。他們辛勤劳动的結果，不仅清查出了一批隱藏在国家机关、学校、工厂里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实事求是地弄清了許多人的一般政治历史問題，保护了好人。如无錫县党群系統肃反积极分子在調查蔣××案件时，弄清了同名、同姓、同年龄、同学校、同时間有两个蔣××，最后查实参加中統特务的蔣××并非該县之蔣××。又如泰州市中粮公司保化員張×，宿迁人，肃反运动前，根据群众检举和敌人档案資料，張系匪“中統县室督導員”，检举信上并注明張臉上有個“疤”的特征，該公司張×臉上恰有个“疤”，看来可以確認無疑了，但是公司为了慎重起見，即派肃反积极分子三去宿迁調查，发现宿迁乡下另有个張×，臉上也有个“疤”，經詳細核實，弄清了同名、同姓、同乡、同特征的

两个張×，“中統县室督導員”并非該公司的張×。类似以上情况，在肃反运动中是举不胜举的。由此可见，肃反积极分子儼似“包公”复活，胜如“况鍾”再世，决不是臭得很，恰恰是香得很，不是毒草，而是香花。右派分子的造謠誣蔑，故意歪曲，只能迷惑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了解真情实况的人是会群起而攻之的。

当然，少数积极分子因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加之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本来是一件难事，因而在运动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现象，錯斗了一些好人，伤了一些人的感情，損害了他們的名誉，但是，他們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当时并不知道而且很难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因此，对他們所犯的錯誤应当有所諒解，具体分析。而且这些錯誤已經糾正或者正在糾正。关于个别混进肃反积极分子队伍的誣陷无故好人的坏分子，一經发现，都作了严肃認真的处理，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跟这些坏分子本来就是毫无姻緣的。如果右派分子别有用心地想借此来否定整个积极分子，显然是枉費心机。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极尽其能地誣蔑、咒罵积极分子、尤其是肃反积极分子呢？其用心何在呢？从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咤风叱雨，呼鬼喚神，毕露原形的当儿，就不难洞察其底細了。人所共知，积极分子爱戴的是共产党，向往的是社会主义，当然就不能不成为右派分子的“眼中釘”了。肃反积极分子更把他們的社会基础、狐群狗党——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了，削弱和孤立了他們，这也难怪他們要切齿痛恨并借机打击报复了。但是右派分子的这种仇恨，不仅仅是出于阶级本能，而有其更为恶毒的阴谋，那就是，由于积极分子在共产党和群众中起联系和桥梁的作用。积极分子愈多，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愈紧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愈高，力量

愈大，右派分子們就愈感到勢單力薄，孤掌難鳴了。他們十分清楚，要推翻社會主義，打倒共產黨，必須打倒積極分子，截斷共產黨和群眾之間的橋梁，使共產黨在群眾中孤立起來，最後實現其資本主義的復辟陰謀。原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打倒積極分子，以孤立和打倒共產黨，再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也。右派分子的這種“一箭雙鵰”的戰術不可謂不巧妙，手段不可謂不毒辣！然而，好景不常，美麗的幻想竟似惡夢一場，在太陽光底下，他們的原形畢露了，最後被孤立的不是共產黨，正是右派分子們自己；積極分子沒有被打倒，恰恰是右派分子被人民駁倒了。

積極分子在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都響應了黨的號召，站到鬥爭的最前列，在這次反右派的鬥爭中，也是象過去一樣，站穩立場，聯繫群眾，堅決、勇敢地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給以致命的反擊，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1957年9月2日“新華日報”）

積極分子萬歲！

天 馬

胡風反革命集團曾經罵積極分子是“螻蛄”，是“向上爬的蛆蟲”，狗嘴裡哪能出象牙，且不去管它。現在，右派分子在向共產黨進攻的時候，狼牙棒揮舞的對象之一，仍是積極分子。他們罵積極分子是“護城河”；是“築牆挖溝的義勇隊”；是“牆外的鐵絲網”。有的人甚至把積極分子說成“比狗屎還臭”。在這些人看來，積極分子真是一無是處，罪該萬死了。有一位先生曾

說“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未尝不可”，我看有些人真是企图一棍子打死积极分子哩！

否定一切，罵倒一切是容易的，动动嘴巴就行；問題是这样信口开河，臭罵一通，痛快固然痛快，可就是罵不倒，也否定不了。

罵积极分子的大概有两种人。一种人自命清高，看見积极分子接近领导，就說是“吹牛拍馬”；看見某些积极分子有缺点、錯誤，就把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否定了。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在“三反”、肃反运动中受到了誤伤，对积极分子怀恨在心，趁这次整风的机会来发泄和报复一下，他們对积极分子不是采取“治病救人”，帮助改正缺点的态度，而是抹杀一切，罵倒一切。这种人我这里不多談，我相信經過这次运动，他們是会多少受到一些教育的。

值得注意的倒是另外一种人，他們之攻击和詆毀积极分子是別有用心的。积极分子是党和群众联系的紐帶，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設中都建立了偉大的功績，积极分子不是臭得很，而是香得很！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那些別有用心的右派人物不是沒有看到这一点，相反的，他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而怀恨在心。他們想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来混水摸魚，企图变天，要共产党下台。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們沒有群众基础。虽然有葛佩琦、王德周之流出来冒充代表人民說話，但結果証明，除只能代表他們自己和与他們同类的一小撮人之外，誰也代表不了。因此，社会主义的事业愈前进，共产党的力量愈大、威信愈高，这些先生們的反感也就愈大；共产党与群众的联系愈紧密，他們也就愈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孤掌难鳴。但是他們又不甘心于希望的幻灭，还想与共产党决一雌雄。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經对党进行“挖心战”，而

右派分子們却选用了“挖根”的战术，他們要挖共产党的根，砍断共产党的左右手，使共产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于是他們选中了积极分子作为攻击的目标。战术不可謂不巧妙，手段不可謂不毒辣了。奈何天不佑人，事情不那么称心如意，被孤立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本来面目在群众面前更加暴露了！

說积极分子是“护城河”，是“牆外的鉄絲网”，我看比喻得很好，积极分子正是护社会主义之“河”，护社会主义之“网”，当这些别有用心的阴謀家們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他們不是已經挺身而出予以有力的反击了么？

积极分子是人民的驕傲，是无价的财宝，愿新的积极分子更多地涌现。我要高呼：积极分子万岁！

（1957年7月9日“人民日报”）

“应声虫”新解

昆侖山

我很缺乏自然科学常識，“应声虫”这一小动物是个什么对象？有些什么特征？我不知道。然而，在“鳴”“放”声中，却常常有人提到它，并且破口大罵。我才如梦初醒，原来他們所指的“应声虫”并非真的昆虫，而是积极分子的代称。

据說，这种“应声虫”，主要的有两大特征：

其一、听话。具体点說，就是：“木头人”、“缺乏独立思考”、“唯唯諾諾”、“唯命是从”、“上級的指示，奉为圣旨”、“领导的意見視若神明”等等。归根到底一句話：他們沒有（据說是不敢）

反領導。

的確，共產黨的周圍團結着千千萬萬的積極分子，並且，他們是很聽話的：聽共產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勞動人民的話。

君若不信，有例為証。就說“肅反”吧，黨中央一號召；“人民日報”一發社論；各級黨組織一動員，你看吧！真是：一呼百諾，萬眾一心。聽話的積極分子們，組成了強大的“肅反”大軍，其聲勢之浩大，真足以排山倒海。結果怎麼樣呢？好得很！肅清了一大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偉大成績的由來，是有積極分子們聽話的功勞在內的。因此，我說這種聽話的積極分子，並非“木頭人”，而是光榮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其二、善“拍”。據說，“拍”的表現是：“倚牆為生”，“靠匯報吃飯”。因此，積極分子落下了“小丑”、“媒婆”、“宦官”、“太監”、“特務”等等罪名。歸根到底一句話：他們太忠實（據說是不該）于共產黨了。關於這點，我也想發一點議論。

積極分子有個最最突出的優點，叫做組織觀念強。他們相信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時時刻刻依靠黨的組織。比如說，他們工作上有什么困難，思想上有什么問題，生活上有什么苦悶，他們自覺地、經常地找黨的（或團的）領導同志談談，從而得到批評與幫助，提高工作效率，改造自己思想。這是就他們本身而言的，從另一方面說，積極分子生活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間，他們是最能聯繫群眾的，確乎是領導與群眾的橋樑。他們也是自覺地、經常地把群眾對領導的意見和要求，向組織上反映，幫助領導改進工作，幫助群眾解決困難。此外，他們更是自覺地、經常地把某一些人的錯誤言行，向組織上匯報。其目的，在於使組織上對幹部有所了解，便於幫助教育，培養提高。現

在看来，有些人最恨的（也是最怕的，因为賊胆心虛）是汇报二字。在我看来，这汇报二字好得很！應該大大提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积极分子們过去还汇报得很不够。比如說，有些人的“私房話”，就沒有汇报出来。幸喜来了个“大鳴”“大放”，由那些罵別人是“靠汇报吃飯”的人，自己向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汇报出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露出了原形，原来是些牛鬼蛇神，难怪他們对积极分子的汇报恨入骨髓了。

綜合以上所述，这种“倚牆”（应更正为倚党）的积极分子，好极了！他們有一颗忠实于共产党、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心。

下边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問題：称积极分子为“应声虫”的先生們，究竟算什么东西呢？还是讓事实說話吧。我看这种人也有两大主要特征：

其一、善唱反調。我們說：“共产党偉大”，他們說：“偉大个屁”；我們說：“共产党大公无私”，他們說：“是宗派主义的集团”；我們說：“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他們說：“不如資本主义制度”；我們說：“民主集中制好”，他們說：“沒有民主自由”；我們說：“肃反运动好得很”，他們說：“糟得很”；我們說：“社会主义建設成績是主要的”，他們說：“漆黑一团”；我們說：“帮助共产党整风要和风細雨，促进党的工作”，他們說：“要暴风驟雨，要打倒”。如此等等，举不胜举。总之，他們戴着有色眼鏡，顛倒黑白，唧唧哇哇，善唱反調。

其二、善罵。（他們美其名曰“英勇”、“正义”，多么动听啊！）的确，这是他們的特长，張着那血盆大口，罵倒一切：罵共产党，罵我們偉大的領袖；罵共产党员；罵积极分子等等。不但罵，而且还要打：要打倒共产党；要杀共产党员；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这大概就是英勇吧？）。而且还要为死亡

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申冤？要為反革命分子報仇（這大概就是正義吧？）。總之，他們罵不絕口，棒不離手，耀武揚威，興風作浪，大有“英雄”氣概。這大概就是他們的“獨立思考，不盲從”、“不拍馬”的本來面目吧？其實呢，他們倒真是“聽話”、“善拍”的家伙。聽誰的話呢？諸君請看：

“鳴”“放”開始時，台灣的“自由中國之聲”電台曾向他們提出呼喚。要他們“借此機會，替曾在‘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中被錯整、錯鬥的人申冤報仇”。果然不錯，他們積極地響應了這一號召。他們提出要成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平反委員會”；他們說：“胡風不是反革命”；他們說：“資產階級沒有剝削”；他們要“延長定息二十年”等等。“大鳴”“大放”開展以後，台灣、香港的美蔣報刊、電台，不斷地對他們發出指示：“整風，是一個政治作戰上的可乘之機，應該有所作為，使它火上加油，把它轉化為對共產黨全面整除與否定。”“政權，不是哀鳴可以乞求的，而是要鬥爭才能獲得。”“不甘作奴隸的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為解放大陸同胞，為爭取自由生存而共同奮鬥！”果然不錯，他們是遵照指示辦事的。你們看：章羅聯盟和其它一些右派分子集團組織起來了。他們有的“掛帥”，有的是“先行官”，有的是“狗頭軍師”，有計劃，有綱領，有策略，有步驟，兩鉞一鑼很敲打了一陣。他們果然由個別問題的攻擊轉化到對共產黨的全面否定。他們高呼：今日中國是“黨天下”，“打倒共產黨”，“黨委退出學校”，“共產黨不能領導文藝”，“共產黨的天下漆黑一團”，等等口號。並提出“新”的主張：“政治設計院”呀，“輪流執政”呀等等。他們是照着台灣指示的那樣，想通過鬥爭，獲得政權的。哼！“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痴心妄想！

在“鳴”“放”聲中，右派分子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是大受台灣歡迎嗎？什麼“遙向儲安平致意”呀，“葛佩琦的言

論值得鼓掌”呀，“大陸上有你們這班人是可喜的現象”呀，“我們對自由戰士，應致萬分敬意”呀，等等。的確，這些掌聲、歡呼聲，對右派分子們是起過很大的鼓舞作用的。

誰知，好夢不長，勝景難再。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台灣又傳來了聲音，為他們開脫和打氣。表示：“支援他們，並肩作戰”，號召他們“繼續戰鬥”，盛贊拒不“脫褲子”的右派分子為“頗有種”。同時，也發出了同情的哀勸：“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應早作打算，不要做共產黨的祭品”。也就是說，你們快到“自由中國”來吧，我們歡迎你們，你們是我們的積極分子呀！

夠了，不再多說了。不過，還有一個懸案未解：善唱反調的先生們，究竟算什麼東西呢？我看，也可以稱他們為“積極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如果，他們討厭這個稱呼（因為他們痛恨積極分子這個字眼）的話，那麼，就根據他們和台灣遙相呼應的事實，把“封號”還給他們吧，呸！應聲蟲！！！！

（1957年8月14日“長江日報”）

“諾諾”與“諛諛”

陳 楚

在大鳴大放的時候，一些右派先生們翹起老高的尾巴，趾高氣揚的說：“自古以來的統治者，如果和知識分子關係搞不好，非滅亡不可！”他們還幌起腦袋，引經據典的說：“這叫做‘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諛諛’。”

好狂妄的口气呀！

自古以来的统治者，的确豢养了一小撮“搖鵝毛扇的人”替他們出主意，用用机謀，以防“黎庶小民”的“不安分”。这样，“吾主江山”，就可以“安如磐石”了。于是乎“搖鵝毛扇”的所謂“諛諛”之士，获得“主子”的垂青，“加官晋爵”一番，讓他們也騎到人民的脖子上去。于是乎，他們在感激涕零之余，发誓要为“知己者死”了。

所謂“千人之諾諾”的“千人”，当然指的是“黎庶小民”。这个“諾諾”，依我看，應該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在“自古以来的统治者”那一段漫长的日子里，这个“諾諾”的声音，是反抗统治者的声音，也是鄙視和仇視那些“搖鵝扇”的“諛諛”之士的声音。

但是，在今天說来，这个“諾諾”，是为共产党领导他們威为国家主人翁而欢呼的声音，是为共产党领导他們掙脱了几千年来套在脖子上的枷鎖而欢呼的声音。具体的說，就是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

“千人諾諾”的声音，永远是对的，是正确的，不管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

也許右派先生們还不服气，他們会詭辯：过去我們虽然是为反动统治者“諛諛”过，今天是人民的天下，我們也是为了人民才“諛諛”的呀。

假定这些“諛諛之士”真的为了“諾諾之千人”来“諛諛”一番，“千人”們是会高举双手欢迎之不暇的。

可惜得很，事实否定了上面的“假定”。且看看这些“諛諛之士”“諛諛”出来的貨色吧：

“人民要起来反对共产党了！”“沒有共产党也不会亡国！”“人民要杀共产党！”“共产党是外行，不能领导科学和高等教育！”

然而“諾諾之千人”又是怎样一种声音呢？

他們說：“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学校向工农開門，我們窮人家子弟有書讀了！”“农业合作化战胜了天灾，增加了產量，农民的生活大大提高了！”

显然“諛諛”之声，和“諾諾”之音調子剛好相反。

其实，右派先生們所引用的这两句“經典”之言，本身就有問題，他还不愿意承認“历史是劳动人民創造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1957年8月2日“光明日报”)

从中国的“受禪”到西方的民主

阮延順

資產階級右派，同一切其他反革命一样，刻骨地仇視人民民主專政。这原因其实很簡單。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是針對着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他們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場上，自然便时刻感到这專政的威胁和压迫。至于人民民主这一面，他們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們所要的是取消人民民主和对人民專政的“民主”和“自由”。

于是，他們一边发出了要求“民主”、“自由”的喊声，一边便向蒙受資產階級思想影响的人献出“西方民主”的标本：“两院制”、“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等等。

一百年前，“西方民主”确曾饗过盛名，不过，現在好象就在許多西方人中也已臭得很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你不行我

来”，或許还不够熟悉，但对中国早年的事总应该是懂得的。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們中国就有过“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的事了。中国文人們，素以尧舜禪讓的事作圣訓。因此，三国时候的曹操父子、司馬昭父子，都还要耍这套把戏。曹丕禪汉，司馬炎禪魏，都是說的“你不行，我来”；而且是硬逼对方說出“我不行，你来”的。所謂禪讓的圣事，也不过如此。連曹丕本人在受禪以后都說：“舜、禹之事，朕知之矣！”其实，不管是曹丕来也好，司馬炎来也好，反正天下沒有小百姓的份。当时，如果有个老百姓跑去对那哭鼻流水的皇帝說：“你不行，讓我来吧”，我看要被杀头的。三国演义作者說这是“再受禪依样画葫蘆”，就說明連他也懂得这是騙术。本国的事，傳說还这样不可靠，远隔重洋的傳說，倘未加証实，是更应该怀疑的了吧？

西方的“你不行我来”，好象要比中国早年的那种好些。它究竟是有了“議會”这种文明的形式，资产阶级老爷們（較之封建主他們表面上是文明些的），起碼再不用象曹、司馬那样去帶劍逼宮了；更不必装腔作势地临时搭禪台。現成的場子和班子，只要“哇啦哇啦”一陣，就作出“你不行我来”的戏了。“西方人”大概是很爱好“文明的民主”的。昨夜翻苏联小說“白樺”，看到过这样一个典型。德寇司令官，强迫苏联农民选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农民作村长。他說：“我提議大家来选洛普霍夫先生作你們的村长。有人反对嗎？沒有，解散，快。”当人們走散以后，他就对这位“民选”的村长說：“你要听德国司令官的命令。”而他的命令就是，劫收农民所有的小麦，和絞死反抗的人。这在右派分子們看来，大約是很民主的吧，但我們却持有相反的看法。

我对西方的“你不行我来”，虽沒有作过实地的考察，不过，也有些根据使我怀疑它仍还是“依样画葫蘆”。从二次大战后短短十多年，法国政府变更了23次。这可說是“你不行我来”的大

乘了。但是变来变去，也未曾出过资产阶级的圈子。你“来”过了，我又“来”，几个资产阶级政党，象走马灯一样，都轮过几遍了。总算证明它们都“不行”了吧？今天功冠全国的法国共产党还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足可证明法国人认为它是最“行”的了，但资产阶级却还不肯让它“来”一下。原来所谓“你”“我”者，乃资产阶级互相之称谓也，人民是被统治者，哪有资格同它们并称你我。难道这种“民主”，真就那么可爱？至于公开迫害进步人士的美国，还用得着说吗？

右派分子把西方的“你不行我来”粉饰为一种“活力”，以便把它搬给中国人。其实，这是自己打嘴，难道你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不行”，还不就是指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统治不下去？“你不行我来”，虽可勉强凑合一时，但也不过是维系着苟延残喘的死力而已。至于在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里，共产党不仅“行”，而且这种“行”的来日方长。别的例证不举，右派分子们尝到的苦头不就也是证据。梦想推开它，“你不行我来”，而且为了表示存心公道，还加了句“我不行你来”（这是西方资产阶级不曾对人民说过的），也是骗不了人的。我们老实不客气的说：“不让”！因为历史早就说明他们不行了，何况，根据古今中外的事情看来，他们一朝权在手，便压根没了人民的份儿。

说说一种极简单的常识吧：少数人用强力压多数人，最终是压不住；多数人用真理压少数人，最终要压下去。至于人民内部的民主，还正在充分的发展，不过这是与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没有多大关系的。

（195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論“哇啦哇啦”

岳 軍

民主，民主，多少人为了民主而流血牺牲，又有多少人挂了“民主”的羊头在卖狗肉！国外的资本主义维护者說，我們的議會整天“哇啦哇啦”，多么民主；而你們，总是“完全拥护”，“一致通过”，哪有民主呀。国内的右派野心家也在高唱资产阶级民主的頌歌了。章伯鈞說：“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这就是活力。”

当然，右派先生們主張资产阶级民主，是为了通过議會政治，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但资本主义国家議會里的“哇啦哇啦”，常常容易給人一种所謂“绝对民主”的錯觉，这种錯觉，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是存在的。

不錯，资本主义国家議會里可以“哇啦哇啦”，但是，誰能在那儿“哇啦哇啦”呢？主要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美国的参众两院里，只有华尔街老板控制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美国劳动人民在国会里沒有地位。即使在議會外面，人民“哇啦哇啦”也得有个限度，就是說，不得危害资产阶级寡头統治，否則就是“非美活动”。

右派先生們很贊美英国的政治，我們就談英国吧。英国下議院主要是保守党和工党，这些党也都是资产阶级政党。英国人民好象可以在議會外面的海德公园“哇啦哇啦”，但在海德公园以外，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組織要举行竞选大会，却常被拒絕租賃会场或被拒絕在电台广播；竞选人还要交納大量資金作保

証金。这在实际上阻塞了貧困的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表进入議會。当然，英国共产党有时也能够冲破資產階級的阻撓把代表送到議會里去，但是这些代表的呼声照例总是被資產階級的新聞机关扼杀了。可見英国式的“哇啦哇啦”，完全是为了巩固資產階級的統治，并且是为了欺騙劳动人民的！

章伯鈞說，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可以“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这象煞很民主，但“你”“我”都是資產階級政党，換来換去也是換湯不換藥。試問美国資產階級愿意讓美国共产党出来組織政府嗎？原来資產階級換来換去的是自己的左右手，并且用这种換法来欺騙人民。

右派先生們又說了：我們不要資本主义的經濟制度，只要資本主义的議會政治。章伯鈞不是認為中国的社会主义沒有加上英美的議會政治，是件大憾事嗎？他不是說“我愛社会主义，也愛民主”嗎？国际上的右派社会党人不是在高喊“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嗎？但高喊“民主社会主义”的英国工党，在过去执政期間，实行了什么社会主义？有了資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只有在工人階級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和巩固。如果我們按照右派先生們的意見，真地实行了英美式的議會政治，讓一小批資產階級政客整天“哇啦哇啦”，到了那时，还想保存社会主义經濟，那未免太天真了，在階級社会里，超階級的国家不会有，超階級的民主也不会有。民主制是和掌握政权的階級的专政密切关联着的。哪个階級掌握政权，哪个階級就决定了民主的本質。我們从不掩盖这一点，而資產階級总是欺騙人民說，他們的民主是超階級的。然而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使他們不可能給別的階級以民主。資產階級所謂的民主，不过是他們一个階級的民主，甚至是少数壟断資本集团的民主，对別的

階級，只能說是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議會的“哇啦哇啦”，象一件五顏六色的外衣，好象很美麗，然而它掩蓋了多少勞動人民的飢餓、貧困、眼淚和痛苦呵！

誠然，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政治，較之封建專制制度，是大大地跨進了一步的。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和共產黨，也通過議會進行鬥爭。但這決不是因為它比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有什麼優越性，而是因為他們處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議會是現實存在的東西。至於我們，既然有了比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先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為什麼要倒退過去呢？

我們說，我們這裡對人民有充分的民主。人民代表大會上、政協會上，不是有很多人說了話、並且批評了政府工作中的缺點嗎？我們有一致的目標、共同的利益，什麼問題經過事先的充分協商和討論，都有可能“一致通過”、“完全擁護”的。我們的憲法，在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之前，經過了各方面代表人物將近一年半時間的醞釀，最後交全國人民討論，有一億五千多萬人參加，這是何等廣泛、充分的民主！是的，我們的“一致通過”、“完全擁護”，也曾經包括少數混在人民隊伍里的右派分子的假通過、假擁護，但這只能說明他們陰險的兩面手法。這種充分協商的民主精神，和對黨外人士的尊重，即使是右派分子自己，也無法否認的。至於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這個壟斷資本集團和那個壟斷資本集團之間，或者資產階級議員和勞動人民的議員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不可能有我們這樣的“一致通過”“完全擁護”的。列寧說，資產階級民主是“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民主，對於富人為天堂，對於窮人和被剝削者為陷阱為騙局”（“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而右派先生們偏偏還想兜售這種破爛貨哩！

（1957年8月11日“中國青年報”）

談“有职無权”

党 哉

担負了一定的“职”，就要負責尽职，就要有負責尽职的一定行为的“权”。职、責、权，三者是紧密相联不可分的。

給人以职，却不給人以尽职的权，是难以想象的事。我們国家机关和經濟机关的工作人員，不論是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絕大部分是尽职的。他們勤勤恳恳地做，老老实实地学，依靠他們，在短短的几年間完成了全国社会主义的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很大胜利，稳步的向消灭剝削和貧困、建立繁荣幸福社会的大路前进。在他們中間——很尽职的或一般尽职的共产党員和非共产党員中間，在工作討論上、工作檢查上，大都感到事业新鮮、任务繁重、学識不够用、經驗不够用或者時間不够用，以致常不免发生缺点和錯誤，但沒見有人感到权力不够用。虽然也有人埋怨他的工作沒有得到有关方面有力的配合，或者他的意見，沒有得到某些領導者的有力支持，但這些，是工作上相互研究、相互調整、需要費些力量与時間的問題，而不是关于工作人員职务上的权的問題。

有一种人，消极怠工，应做的事不做、应管的事不管，有权不使用；又有一种人，“下車伊始，哇喇哇喇”，不去了解与分析实际，仅凭自己的地位，乱发命令，結果把事情办坏。二者都是失职。不行使权与乱行使权，更不是与有权与否相关的事。

“有职无权”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但是，在某些非党的工作人員身上又确实存在着。那是某些机构的党組織不善于征

求非黨工作人員的意見，尤其是負一定責任的非黨人員的意見，加以研究和採納；不善于幫助非黨人員使之了解黨的政策，應該經過他們去實施的沒有經過他們。這樣，使人感到非黨人士是擺樣的，有職無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個別的非黨人員，有作客思想，不肯深入地鑽研業務，工作來了，提不出辦法或提得很膚淺，有權不能行使。你不行使，必得有人代為行使。因而表面看來，象是無權。

必須糾正這種現象，黨要幫助非黨人士使他在工作的實踐中提高自己、提高其負責盡職的積極性；對於不尊重非黨人士的地位及其正當意見的人須給以教育和批評。同樣，非黨的工作人員也必須以國家主人翁自居，負責盡職，有阻礙其負責盡職的，就和他鬥爭。職的所在，即權的所在。無權的現象也就沒有了。

應該指出某些右派骨幹分子所叫囂的“有職無權”，他們是不把“權”看做是办好“職”的方法，而把“權”看做是個人作威作福的工具。比如他們要求有不受限制的用人權與用錢權等，這是我們不能容許的。一個機構的負責人有權選擇你的助手，如部長局長要推薦某人當司長科長或其他的人等，但必須經過人事機構的審查，經過一定的任命手續。同樣負責人有權審查監督本機構的行政經費和事業經費的收支，但必須符合財政制度，經過一定的審核程序。憑首長一個條子，就可以把某人用進或把某人辭退；憑一個條子就可以提取多少款子或報銷某項用項，這是國民黨的作風，我們早已把它根絕了。我們國家里沒有“用人唯私”、甲來帶一套人馬、乙來又換一套人馬的現象；沒有濫用公款的现象。這難道是不好的嗎？

在這上面——用人和用錢上面黨對黨員的要求是嚴格的。不管你擔負什麼職務，違反制度任用了私人要挨批評甚至處分，違反制度亂用了錢要賠償以至處分。如果也叫做權的話，那共

产党人不比非党人員多而是比非党人員少。

要注意消灭某些有职无权的不正常的現象，更要注意的是某些右派分子自己不尽职却假借有职无权的話向党进行攻击，企图破坏国家严肃的行政制度，恢复国民党的作风，必須給以有力的不可調和的斥責。

(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談“称职”

周 鴻 印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口号之一，就是“很多共产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不相称”，既不称职，那就應該“下台”“下轎”，讓那些资产阶级的“大知識分子”“各得其所”，如果我們党不同意这样做，就是“宗派集团”，就是“党天下”思想，好厉害的罪名！

当然，我們不能說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称职的，如同我們不能說每一个非党人士都是称职的一样。在这一个大轉变的时期，許多事业都是新的事业，許多問題都是新的問題，因而在办理这些事业，在处理这些問題的时候，大多数同志（无论是党内或党外）是缺乏經驗的，因而暂时的某些不称职的現象是存在着的，这是一种发展中的必然現象，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决不可能为我們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建設的干部，因而解决建設任务与干部水平之間的矛盾的唯一办法是依靠我們自己来培养，依靠我們广大干部自觉的虛心的学习。

承認我們暂时还存在着某些不称职的現象，从而加重我們的学习任务，这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应

該看到，我們的干部比起旧社会一切統治階級的“干部”来是最称职的，他們最忠实于人民，最忠实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最能依靠人民，發揮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創造性，他們还有一个最偉大的最富有經驗的党領導着他們前进，因而他們能够創造出許多空前偉大的業績。我們今天各項事业的輝煌成就正証明了这一点。这是問題的另一方面。承認了这一方面，就可以打破右派分子對我們干部和我們党的干部政策的誣蔑，也可以使我們更有信心地前进。

由此可見，关于“称职”問題，与一切其他問題一样，我們与右派分子之間存在根本分歧，我們愛护社会主义，因而也愛护我們社会主义的干部，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因而他們希望并用种种阴險毒辣的手段要挾我們社会主义的干部“下台”“下轎”。

我們与右派的另一分歧是关于称职的标准問題，也就是怎样才叫称职的問題。我們認為，一个干部是否称职，應該从“德”“才”两方面去考察，而且“德”应占首要的地位。事实告訴我們，如果一个干部能够无限忠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事业，虽然在“才”方面有某些欠缺，他还可以为人民办好事，并从办好事的过程中积极提高自己的才能。相反地，一个資產階級右派，虽然他有着某种才能，但他只会利用他的才能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最近一个时期所揭露的一切右派的行徑正証明了这一点！而右派分子則只講“才”不講“德”，他們提出了一种“理論”，似乎在今天的条件下，“德”已經是可有可无了，“才”才是衡量干部的唯一标准，他們还不惜对“德”加以恶毒的貶斥和誣蔑，說什麼服从組織領導是“唯唯諾諾”，是“拍馬屁”，執行組織的決議是“机械服从”，是“沒有創造性”，甚至是“沒有社会主义良心”，对敌人和一切坏分子进行不調和的斗争是“打击別人、抬高自己”，等等。总之，我們所認為的一切社会主义的美德都受到了右派分子的恶

毒的攻击。談到“才”，我們与右派分子也有着不同的标准，我們所說的“才”，是保卫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才能，它包括文化知識、科学技术、工作經驗，也包括組織領導工作、群众工作、政治思想教育等工作等各方面的才能，我們認為任何一个干部，他除开要作技术工作以外，还必须作政治工作，干部的“才”与“德”是不能分离的。而右派分子則將“才”簡單化成为文化水平，甚或簡單化成为資產階級的学历与經歷，一切有着較高的資產階級的学历与經歷的人，他們就認為是“大知識分子”，而一切从革命斗争中、从劳动中鍛煉出来的干部，他們則認為是“土包子”、是“老粗”、是“外行”。

由于我們与右派关于“称职”的标准不同，因而我們認為称职的干部，他們認為最不称职；他們認為才能超过职务的所謂“大知識分子”，由于墮落成为右派而受到我們全体人民的唾弃。章伯鈞、罗隆基之流不都自認為最有“政治才能”么，但在人民的眼中，却是一群政治騙子；錢偉长也自封为“万能科学家”、“老教育家”，但剝开皮来一看，原来是罗、章部下的一名悍将。

右派分子所以提出另外一种“称职”的标准，所以誣蔑我們很多党的干部不称职，其用心是非常明显的。他們也知道“干部决定一切”的道理，當我們党的总路綫已經决定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干部可以决定我們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資產階級的“干部”則会偷运資本主义的貨色，用偷天換日的方法达到資本主义复辟的目的。因此，从右派分子對我們的干部和我們党的干部政策的进攻中，可以吸取一条很重要的教訓：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从反右派斗争中进一步純洁我們的干部队伍，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干部的水平。讓那些右派先生們在我們坚强的干部队伍和广大的觉悟了的群众面前向隅而泣吧！

(1957年9月2日“长江日报”)

談“干部自由市場”

聞 達

說來也驚人，有一個時候，“干部自由市場”之說，突然甚囂塵上。听了之后，頗為納悶：報上登過鷄鴨之類開放自由市場以後，供應量增加了，難道人也要象商品一樣來處理嗎？

一打听，原來提這類“建議”的右派先生們說，解放後的干部統一調配的制度，有礙於發揮“積極性”、“創造性”；不如從前人們可以“自由發揮專長”，得以“人盡其才”云云。

提起從前，可以搜索一下記憶，也可以翻一翻書。人的“自由市場”倒是確實存在過的。

在非洲，就有這種“自由市場”。成千上萬的黑人成了白色種族主義者的獵取對象。奴隸捉來後，用繩子、鐵鏈連成一串，裝船運走，在市場上“自由地”出售；一不如意，還可以“自由地”施以酷刑或者宰殺。對於黑奴來說，自然就是“自由地”被出賣，“自由地”受刑，以至於“自由地”被殺掉了。

主張開放“干部自由市場”的人聽到這些，一定會急了，他會辯解說：我不是說的這個！

那麼，不說非洲，且看舊中國；也不提賣身為奴的事，只說知識分子。那也是有的“自由市場”的。“自由市場”上經常有着數量眾多的失業大軍，供官僚買辦們自由挑選。挑中的，兢兢業業，唯恐丟了飯碗；挑不中的賦閑在家，窮途潦倒。象朱自清在“背影”里所描寫的老父，總算還是運氣，能夠勉強免于凍餓；而那些真不濟事的，就只有演懸梁投河悲劇的“自由”了。在那個“自由市場”上，还有着奇特的牌價；孔祥熙的中央銀行里

的茶房，收入远远超过中学校长。假如你愿意丢掉校长的职务不干，改行去当茶房，人家也有不予录用的自由，而你，也可以有活活气死的“自由”。

在“拉斯基門徒”們所推崇备至的英国，也是存在着人的“自由市場”的。但是，大多数的英国人对于这样的“自由市場”作何感想呢？民意測驗得了一个可惊的結果：41%的人希望移居国外。移民登記所門前排成了一条长龙，而希望离开的人，多半是有技术的年輕人。

这样看来，人的“自由市場”就其实質來說，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目前存在于資本主义世界的那种雇佣奴隶制度。資产階級右派用了“自由”、“發揮創造性”等等好听的名詞来装扮它，就是想要引誘知識分子来反对目前我国的既服从国家需要、又适当照顧个人兴趣与专长的干部分配制度，来拥护右派分子的資产階級复辟的綱領，重新实现資产階級剝削和压迫人的自由。

列宁說得好：“全部官場与自由派的科学，都是这样或那样来辯护雇佣奴隶制度，而馬克思主义却对这个奴隶制度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是的，我們要宣战，我們要把資产階級复辟的綱領的各个部分，都一个个地彻底粉碎掉。

(1957年9月2日“天津日报”)

誰是外行

靜 言

資产階級右派老爷們，口口声声說共产党人这也外行那也外行：

办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专科学校嗎？“你們外行！”

办报、办刊物、搞出版社嗎？“你們外行！”

搞科学研究嗎？“你們外行！”

甚至象立法、司法、行政等这样的階級专政的工作，楊兆龙、王造时这一些右派人物也竟敢喋喋不休地說：“你們外行！”章伯鈞要搞什么“政治設計院”，意曰：对于政治，你們共产党人也是外行！非讓吾輩来設計不可！在費孝通、吳景超乃至陶大鏞之輩的心目中，共产党人对于社会科学好象也是外行！

既然共产党人对于各行各业都是外行，那可怎么办呢？一句話揭开謎底，就是：共产党人退位，讓吾輩（右派）专家来大逞內行之才！

啊哟，这口气真也不小！

共产党人中的确有相当大的数量的同志，既无祖宗剝削余蔭，不曾讀过書，或者讀書很少，以后又长期与殘酷的階級敌人作斗争，沒有机会讀書，因而文化水平不高，专业知識缺乏，单从这个意义上講，也誠然对很多事情还是外行。不仅如此，科学愈来愈发达，社会愈来愈前进，知識的領域也愈来愈寬广，那就永远永远总会要对很多事情是外行。共产党人，在这些方面确实是应当永远要十分謙逊的学习的。共产党人决不認为自己对一切都是內行。可是，共产党人总是努力从外行变成內行的。开始对軍事是外行，經過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次抗日战争，現在是內行了；开始不懂得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六亿人口国家的复杂的經濟，經過八年来的努力摸索，至少不比右派先生們外行了，共产党人当然还会有許多事情不懂，但他們是要努力使自己弄懂的。

可是，話又說回来了，天底下，門門內行、无所不知、无所不曉的人，我看，过去不曾有过，今后恐怕也不会有。右派

先生們自命是內行，其实也不过指的某一門、某一行而已。而况就是这一門、这一行，他們也并非真的是和我們的語言相一致的那种“內行”。他們所謂的“內行”，不过是懂得从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学者和書籍那里承襲下来的一点点的知識；我們所說的“內行”，却是要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会得理論联系实际，找出事物內在的本質联系和发展規律，善于运用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如果这才叫做“內行”的話，我看右派先生們恐怕还真是道地的“外行”，这从他們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便可以証明。

右派先生們自以为靠祖宗剝削余蔭，讀了些綫装書，学了些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理論，就指手划脚自命“內行”，其实，他們一不懂种田，二不懂織布，沒有工人、农民的生产知識；他們也許有資產階級对付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知識，也許有資產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的知識，可是，他們从来也不曾有过无产階級及其他广大劳动人民对一切剝削階級进行階級斗争的知識。如此說来，右派先生們的这种“內行”也就很为可怜了。何况在这些右派先生們中还有不少只是些馬路政客、文化跑街以至旧社会大人物的跟班，連这一点点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書本知識也并不多呢？

古往今来的社会上千行万行，除了原始公社制度的行当不談以外，归結起来也只有四大行：奴隶主事业一行，封建主事业一行，資本主义事业一行——这三行合起来也可称之为剝削階級事业一行，除这三行之外的另一行，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資產階級右派先生們对于前面三行可能算得上是“內行”，但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这一行，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是完完全全的外行，为什么？因为他們不仅从来不曾干过这

一行，而且他們根本反对这一行，他們又怎能会成为“內行”呢？

工人階級、共产党人和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战士，对于前面三行誠然是外行，而且很坦然地說，他們也决不以对这三行是外行为耻，倒是以对三行是“內行”为耻（自然，这并不是指熟悉这三行的內幕和懂得与这三行作斗争）。所以，右派先生們如果罵他們对这三行是外行的話，他們一定点头称是，不以为怪。可是，說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这一行，那就不能說工人階級、共产党人和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战士是外行了，他們也不应当是外行，倘或不信，請打开中国的革命史来看一看吧！新中国是怎样建立的？八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是怎样进行的？甚至連这一次与你們右派先生交鋒也包括在內，請你們自己去冷靜評判一下，到底誰是外行？

（1957年8月17日“解放日报”）

在党性問題上駁斥右派

馬 司

在大鳴大放中，右派分子极力攻击共产党的党性，他們的目的是模糊人們对于党性的認識，把党性說成坏东西，动摇党的原則，从而动摇党的領導。他們散布了許多关于党性問題的謬論，他們的手段是，对党性先加以歪曲，然后加以攻击。

什么是党性呢？在階級社会中，一切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階級的，它的党性就是所代表的階級的階級性的集中表現，我們的党性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性的集中表現，我們党性的最高原則是為了广大劳动人民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右派分子叫喊：

“共產黨員只講党性，不講人性”“党性扼殺了人性”“党性是冷冰冰的，沒有人情。”在他們看來，為了廣大勞動人民和全人類的解放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董存瑞、劉胡蘭等無數千萬的烈士，都是沒有“人性”。許多大公無私的共產黨員都是沒有人性！那麼什麼人才有人性呢？大概叫喊“殺共產黨員”的葛佩琦才有“人性”吧！當蔣介石到處“剿共”，滿手沾滿人民的鮮血的時候，那個大吹大擂還要“思想剿共”成了“思想剿共”先鋒的羅隆基才有“人性”吧！我們共產黨員的確沒有這種“人性”，我們並且一定要“扼殺”這種“人性”。在階級社會中，沒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我們主張工人階級的、人民大眾的人性，反對反動剝削階級的人性。因此，我們共產黨員的黨性和人性是一致的，不是對立的，我們的黨性，充分集中地體現了工人階級、人民大眾的善良的人性。魯迅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具有我們這樣黨性的人，對敵人，確實是“冷冰冰”的，而且還要“橫眉”哩！敵人如果不投降，我們就要消滅他！但是對人民自己，我們是“甘為孺子牛”，右派分子說我們“有黨性沒有人情，”如果指對人民，那就有無數事實說明它是歪曲、誣蔑。我們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血肉聯系，是任何右派分子怎麼挑撥也破壞不了的。

右派分子又用把黨性和個性對立起來的手段，來攻擊我們的黨性，說什麼“黨員只有共性，沒有個性，都說一樣的話，死板得很。”是嗎？有共性就沒有個性嗎？所有共產黨員都要承認黨綱黨章，參加黨的組織，為黨的事業而奮鬥，每個黨員都有這個黨員的共性，這是一點不用含糊的，沒有這個共性，也就不成其為共產黨員了。當然，右派分子對這個共性是很不高興的，他們高興的是，共產黨員應該有一種時常可以衝破這個共

性的“个性”。其实，說共产党员沒有个性，完全是歪曲事实，閉着眼睛說瞎話。在我們国家各条战綫上都有共产党员，他們的个性也是千差万別的，但是，在和党性一致的条件下，他們的个性得到了更好地发展，許多党员成为各种事业的专家，發揮了自己个人的特长。每个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长和才能来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个性，但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长和才能，是为了党的偉大事业，这又表现了党性。我們共产党员要发展的正是这种有利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个性，而不是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个性。右派分子叫囂共产党员沒有个性，他們所指的原来是后一种破坏性的个性。右派分子江云的手法更“高明”，她干脆把这种破坏性的个性改称为“党性”，你看多厉害！原来沒有这种破坏性的个性就是沒有党性呀！她說：“党性起了盖子作用，應該更換一下党性的內容：服从組織（‘听話’）不叫党性，坚持己見（勇于向組織斗争）才叫党性。”你如果不坚持己見，向党进攻，江云就会給你一个“沒有党性”的結論，言下之意，就是要把你开除出党了！你要是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江云会提醒你，不如在进攻时戴一頂“党性”的帽子，因为这样才可以迷惑更多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员一起向党进攻呀！右派群丑能够得到江云这样挂着“紅色”招牌的參謀，怎么不高兴呀！

为了攻击党性，右派分子又誣蔑党性是宗派主义的根源。章乃器、程千帆等右派分子都极力歪曲攻击斯大林所說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的原意，說这句话是“墙”和“沟”的思想基础。其实，这句话的原意是說明共产党员應該認識自己不同于一般群众，应發揮先鋒队的作用。右派分子歪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这种先鋒作用。章罗联盟的湖北据点——馬哲民說：“今后人民內部的差別是共同进步中的快

慢之分，沒有更大的區別。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特殊性不要再強調。”馬哲民多么異想天開呀，如果共產黨的特殊性不強調了，先鋒隊的作用喪失了，共產黨和一般群眾沒有差別了，那麼，誰來領導群眾呢？資產階級右派不就可以毛遂自薦了嗎，資本主義的夢不就可以變成現實了嗎，帝國主義不就可以拍一下馬哲民的肩膀了嗎！當然，右派分子知道共產黨是不會這樣順從他們的，為了對不放棄先鋒隊特殊性的共產黨施加壓力，他們就開出了一張罪狀，那就是：共產黨強調自己的先鋒隊特殊性，不和一般群眾完全一樣，這種黨性就是“牆”和“溝”的根源，宗派主義的根源，他們還一再宣傳有黨就有宗派，黨都是代表狹小集團的利益。可是全國廣大人民已經從足夠的切身經驗中認識到，共產黨決不同於他們所說的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不是代表狹小集團利益的宗派，她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也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因為工人階級不同於資產階級，它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基本上一致的，工人階級必須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除了工人階級、人民大眾的利益以外，共產黨員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又是團結全國人民的核心，因此，共產黨的黨性不但不是宗派主義的根源，而且是與宗派主義完全不相容的。

右派分子還把黨性和科學性對立起來，攻擊黨性。吳開斌說：“我們的黨性和立場是服從階級利益的，但在複雜的事物面前卻不符合真理。黨性、立場與真理、科學性不能一致，要黨性就要犧牲真理，要認識真理就只有不講立場、黨性。”黨性和科學性或真理是對立的嗎？我們的回答正相反：工人階級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必須堅持真理才能解放自己，因此，工人階級的黨性和科學性是完全一致的。共產黨的世界觀，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已經是为实践所証实的真理，我們的党性要求每个党员必須学会掌握这个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作为認識一切問題的总的观点，在处理一切問題上都要坚持辯証唯物主义的原則，也就是坚持科学的原則，坚持真理。在阶级社会里，人不可能不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場，在资本家看来，资本家剝削工人是天經地义，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永世长存的社会；在工人看来，资本家剝削工人是罪恶，资本主义社会是罪恶的根源，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是永世长存的社会秩序。事实說明，只有站在反动剝削阶级的立場上，才会歪曲真理、歪曲事实，与科学性不能一致；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場才能認識真理，坚持科学性。我們共产党，由于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因此能够正确的、科学地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性，能够了解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必然性。我們党的一切政策和实践活动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严密估計客观现实、通曉社会发展規律的基础上。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遭到彻底的失敗，就深刻地說明了右派分子不能科学地估計现实，不能認識客观規律，不了解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党正由于能够科学地估計形势，因此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右派击垮了。这也是共产党的党性和科学性一致的表现。由于工人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它的最終目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不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相矛盾的，而是相符合的，因此，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正視社会发展規律，才能对它有科学的認識。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就曾經力图証明馬克思主义的党性似乎是与科学性相矛盾的，他不滿地說，“資本論”是一本帶有严重傾向性的著作，因为它証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他愿意这本著作成为中立的、超阶级的著作。列宁是坚决反对伯恩斯坦的謬論的，列

宁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是科学研究中战斗的党性的典范。由此可知，“資本論”既具有高度科学性又具有高度党性，而且正因为具有高度党性才有这样高度的科学性。可見我們的党性与科学性的一致。

捍卫党性，反击右派，这是我們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員及一切正直的人們的重大任务。在党性問題上駁斥右派，是关系到捍卫党、捍卫党的領導、捍卫社会主义的有着严重意义的斗争，我們必須在这一斗争中把右派謬言駁得体无完肤，取得彻底的胜利。

（1957年9月5日“湖北日报”）

略論人性和党性

馬俊芝

在右派分子的进攻中，对党射出的毒箭之一，就是罵共产党人“只有党性、沒有人性”。有些好心腸的朋友們，也跟着說什么“共产党员只能做同志，不能当朋友”，不自覺地受了他們的迷惑。因此，說明一下人性和党性的問題，还是必要的。

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不同的階級地位决定不同的人性

什么是人性呢？人性問題，是回答人的本質、本性是什么的問題。我們知道，人类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类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不和魚类、鳥类、兽类等一样仅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的产物。决定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不在于它的自然本質，而是在于它的社会本質，在于它的社会性。因此，我們所

說的人性，實際上是指的人的社會本質、社會性而言。

那麼，人的社會性又是什么呢？它是如何形成的呢？馬克思曾這樣說過：“人的本質，並不是個別的個體所具有的抽象屬性。就其現實性來說，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費爾巴哈論綱）

人一生下來，就不是孤立存在而是集體生活的，相互之間必然發生一定的關係。這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社會，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的總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極複雜多樣的，如有家庭關係、親友關係、政治關係、經濟關係……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關係，即生產關係，它決定着其他方面的關係，是社會的基礎。

生產關係，在階級社會里，則表現為階級間的關係。在階級社會中，不管他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一個人總是作為一定階級的人而存在的。一定階級的人，由於長期地站在一定的經濟地位上，以一定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產着、生活着、鬥爭着，於是形成了他們的特殊的要求和特殊的觀點、心理、感情、習慣等等，即形成了一定階級的人們的特殊性格。就是說，人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着人們的社會本性，決定着人們辯明善惡的標準，即決定着人們的人性。

右派分子又會說，這是“教條主義”，是“庸俗社會學”，我們說，這是事實。在階級社會中，某一階級鼓勵、贊許某一行為，但另一階級卻譴責這一行為；你說是善良的，我說是丑惡的。歸根結蒂，標準是各自的階級利益。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把寄生蟲式的生活看做是人性的善，是“福”，勞動人民則看做是人性的惡，是可恥的事情；全世界人民把英法帝國主義者對埃及人民的侵略看做是人類良心的毀滅，而英法帝國主義者則說這是“保衛”中東的和平，好像他們是大慈大悲的如來佛；我

国人民把鎮反、肃反看做是人性的大善，而右派分子則說是“令人发指”……如此等等。难道这是教条嗎？不，是事实。人性总是具体的，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过去如此，現在如此，将来也还是如此。就是以后階級消灭了，虽然象階級社会中人性之間这种根本对立的現象是不存在了，但也不会有抽象的人性。因为，人們仍是在矛盾中生活着，因而到那时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有先进的人和落后的人。

由此可見，所謂人性，就是指的人的这种社会性、階級性而言，离开了人的階級性、社会性，就无所谓人性。在我国历史上，孟子、荀子、告子等人关于人性善恶的問題爭論不下，就是因为他們不懂得或者故意掩盖人的这种階級本質、社会本質。

“人之常情”不是抽象的，它也体现了不同的階級性

有人認為，有些問題是由階級性决定的，但如对儿女的爱、男女之間的爱情、友情等等这些所謂“人之常情”，則不受階級性的限制，沒有階級的原則，是为人类所共有的。

是的，母爱、友情等等，这是些“人之常情”，是为人所共有的，但是爱什么、如何爱法、怎样才算爱，其中就大有文章了。这就是說，“爱情”、“友情”的內容，仍然是具体的、各异的，它不但受階級性所影响，而且也是以階級利益为轉移的。当着这种友情、爱情危害着他所屬的階級利益的时候就不存在了，或者是使它服从于他的階級利益。封建社会在男女婚姻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則，叫做“門当戶对”，多少男女之間の真正爱情被扼杀！地主階級强迫女儿做望門寡妇，甚至强迫自尽殉节来换取貞节牌坊，把这看做是对女儿最大的“爱”，但在我們看来这是最大的殘忍。“牛虻”把他亲生父亲蒙泰里尼紅衣主教对

他的“愛”形容为：“可是你呢，‘請你自己在死刑判決書上簽个字吧，我的心太軟了，實在下不了手。’啊！这样的办法只有你們基督徒才想得出来——好个善良、慈悲的基督徒。”在这里，父“愛”仅仅是“不忍”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而讓他自己簽字。“第六縱隊”中的瑪德琳对沙利的母愛是叫沙利向祖國請罪，而沙利对他母亲的“愛”則是：“杀死自己的母亲并不容易，可是不得不这样做……”在这里对母亲的“愛”，也仅仅在于杀死母亲“不容易”罢了。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人之常情”和一切生产品一样，也完全商品化了。“有奶便是娘”，这就是資產階級的人情世故的写照。有錢就有“愛情”，如果“友情”不能带来名利，这种“友情”也就是多余的。真正的友情、愛情，只有在劳动人民当中才找得到，它建立在共同的階級利益基础之上，是在共同的生产斗争、階級斗争中形成起来的。

这样看来，要想离开人的社会性、階級性去找抽象的愛情、友情，也是不可能的。費尔巴哈就是不懂得人的社会性和階級性，去抽象地空談人类的愛，由于把“愛”抽象化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恩格斯对这一点曾严加批評，他說：“这样，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气味也烟消云散了，所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調子：彼此相愛吧，大家不分性別和等級都來親嘴吧，——大家一團和氣地痛飲吧！”（“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当然，实际生活是极其复杂的，人性也是极其复杂的。在許多偉大的作家們所描写的愛情故事中，有些是突破了階級性的限制的，例如，王金龙不顧丟掉烏紗帽的危險去愛一个妓女，至今仍傳为佳話，这和他的階級身份是不相称的。但是，如果說这是証明了愛情不受階級性的限制，倒不如說这是在愛情这一点上背叛了本来的階級。这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本来一

个人的阶级性是可变的。既然各个不同的阶级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就免不了互相间的影响。所以，不能因此就得出爱情、友情不受阶级性的影响和限制的结论。

总之，在阶级社会里，要想找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抽象的人性，要不是故意否认人的阶级性，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世界上有的只是各个不同阶级的人性，各个不同阶级的人情。任何一种人性、人情，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人性和人的阶级性是一致的，各种人性之间的对立，正是反映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对立。

历史是发展的，人性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只有那种和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相符合的人性，那种促使历史发展的人性，才是美的、善的；反之，就是丑的、恶的。原来是被认为善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也会变成恶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口号，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是善的；到今天，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随着时过境迁，也就变成了恶的，因为它已起着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现在只有无产阶级的人性，才是有史以来最善良、最优美的人性，因为它主张彻底消灭人吃人、人压迫人的剥削制度，要将人类引导到人间的天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能区别人性的善恶的。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它和人性是一致的

我们明白了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也就明白了人性和党性的关系。所谓党性，就是阶级性的最高而又集中的表现。共产党人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又集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最高而又集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本质的最高表现。既然人性和阶级性是一致的，党性又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那么党性和人性也是一致的。

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的彻底性……等等，而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具有这样高度的党性，以便担负起最后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没有这种党性，就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不论在法庭上、刑场上从来没有低过头。黄继光烈士为了使同志们少流血，用自己的肉体堵住了敌人的枪口，罗盛教烈士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小孩子而献出生命：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也是无产阶级的人性！党教育我们共产党人这样去做人，教育我们要具有这样崇高的人性，教育我们去克服那些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性。因此我们说，只有有了无产阶级的党性，才有更高尚、更优美的人性。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人硬说共产党人有了党性就没有人性了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说的人性、人情，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情。我们老实说，这种人性、人情，共产党人的的确确是没有的（有一点点也要整掉它），这种人性、人情和共产党的党性的确是不相容的，有了这种人性、人情，就没有了共产党的党性，起码是党性不纯或党性不强；要有党性就非排除这种人性不可。右派分子徐中玉好似抓住了小辫子似的，攻击我们说：“你说先得成为朋友嘛，人家说原则第一。”（见1957年5月12日“光明日报”）我看“原则第一”这句话，并没有半点错误。如果不是“原则第一”而是“朋友第一”，就不是共产党的党性，也不是共产党人的人性。即便是按照徐中玉的意见，先为朋友，后讲原则，当然也尚无不可，但我们还是要朋友服从原则，而不能原则服从朋友，这还是原则第一；不然，这个朋友共产党人是交不成的。还有人说：“一个人一入了党，

和朋友就疏远了，見了面也无話可說；如果一被开除党籍，反而覺得可親了。”親愛的先生們，這話說的完全對，可惡的是，你們沒有敢公開說明是和那些人疏远了、對那些人可親了，沒有敢說明這些朋友是些什麼樣的人。是的，有些同志因為入了黨，和他的某些朋友疏远了，因為他這些朋友反對共產黨。不要說入黨了，君不見，不是有些同志僅僅因為和黨靠近些，就變成了右派分子的眼中釘嗎？是的，有些人被开除出黨后，使某些人覺得可親了。那些所謂“起義黨員”，君不見，不是馬上成了右派分子的密友了嗎？但是，他和人民之間却築上了深溝高牆，成了社會主義的罪人。他們本來是臭味相投、物以類聚，這又有什么奇怪呢？由此可見，在這兒根本不是黨性和人性的矛盾問題，而是這種黨性和那種人性的矛盾問題，是無產階級的黨性和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人性的矛盾問題。有些人就是要共產黨人拋棄共產黨的黨性去接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人性，這是一萬個辦不到的。

當然，我們也承認，有些同志的確存在着對人不熱情，關心人不夠，不善于交朋友的缺點，這是應該糾正的。但這和共產黨的黨性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不但不是黨性強的表現，恰恰是黨性不強的表現，或者是教條主義地來理解黨性。黨性決不排斥朋友間的友情、家庭間的天倫之樂。無產階級的黨性，要我們愛整個人民，當然也包括我們的親友在內。愛人民、為人民服務是具體的，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們不但要注意“原則第一”，還要注意把原則具體化；不但要注意大事，也要注意小節。一個具有高度黨性的人，必然能做好朋友、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兒女……，但是在這些和人民的整體利益有了沖突而不能并顧的時候，共產黨人會毅然地丟開這些東西。這與“冷酷無情”毫無共同之處；恰恰相反，是一種最崇高的感情的表現。

总之，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党性越强，他的人性也就更崇高、更完美，他对劳动人民就越有深厚的感情，他也就更为人民所爱。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1957年9月4日“解放日报”）

反革命的“人性論”

張 嗣 澤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少社会大变动时期，“人性論”的爭論，就是階級斗争的一种表现。有时是进步的階級或进步的集团提出革命的人性論，反对反动势力的凶殘和反动思想的丑恶，比如：俄国十九世紀后期許多杰出的民主主义者所提出的人性論，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有时是反动的階級或反动的集团提出反革命的人性論，反对革命階級的革命行动，比如，今天資產階級右派在共产党面前大談特談的“人性論”，就是反革命的人性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鬼把戏。

資產階級右派的“人性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人性与階級性对立起来，抹杀人性在階級社会里的階級性，倡导人性是超階級的共性的論調。右派分子章乃器說：“人的特性是共性（一般性），人性首先表现大家都是人，人同野兽有本質的区别。”右派分子金諾表述的更具体。他說：“什么是人性呢？与动物不同的特性：乐生恶死；爱和憎；劳动（包括資本家，只不过与工人有所不同）；集体主义。”并由此得出結論：“階級性和人性不是一个东西，前者为个性，后者为共性。”这些都是右派分子把人性說成是超階級的論据。

右派分子以人和动物的区别来说明人性是超阶级的，这实在是愚蠢可笑和枉费心机。人和动物有区别，正是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性是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差别。因此，人性指的就是人的社会属性。如果“人”不是社会的，仅是自然的，那么它将不成为人，不过还是动物罢了。人的社会本性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诸关系的反映，其中主要的是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关系的反映。每一个人的社会性都是由他的特定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这样看来，人们的社会本性，由于阶级的划分而严格地区别开来。比如，各个不同阶级的人都有爱和憎，可是爱和憎的内容，不同阶级的人是根本不相同的。右派分子乐资本主义之生、恶资本主义之死，仇恨共产党，仇视新社会的事实本身，就揭穿了他们说爱和憎是超阶级的弥天大谎。右派分子认为资本家也有劳动，也有集体主义，更是欺人之谈。事实告诉我们的是：工人劳动，资本家却不劳而获；资本家占有生产手段，剥削工人剩余劳动，养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等特性，而无产阶级失去了生产手段，他们与一切劳动者没有基本的利害冲突，养成了集体主义等特性。所有这些都是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本质方面的根本区别。右派分子显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阶级性和人性不是一个东西，前者为个性，后者为共性。”是的，人都具有社会性，这是每一个阶级的人都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共性不是离开具体的东西凭空出现的，而是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例如，果子这个概念，是从一切具体的果子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有不是具体的果子。同样，人性这个概念，是从一切具体的人的社会本质或本性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有不是具体的人的社会性。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我们只能

看到，不是資產階級的社会性——人性，就是無產階級的社会性——人性，在我們這裡，看不到抽象的人性，也看不到超階級的人性。右派分子想在共性和個性問題上大做超階級的“人性論”的文章，非但沒證明他們有什麼高明的地方，反而證明他們的手法太拙劣了。

右派分子的“人性論”大体上就是這些，他們拿着這種東西干什么呢？除了咒罵共產黨員沒有“人性”，挑撥黨群關係以外（這個問題，馬俊芝同志在9月4日本版上的“略論人性和党性”一文中已經批判，這裡就不談了），他們還從所謂人性是共性的謬論出發，作出如此荒唐的斷語：“在社会上，除了階級標準以外，還應有人道主義標準，才能辨明是非。共產黨的階級教育是不完備的，片面的，應加強人道主義的教育。”

這種斷語是顯然違背事實的。首先，正如前面所說，在階級社會里沒有超階級的人性，也就沒有各階級共同的人道主義標準。

右派分子說，沒有超階級的“人道主義”標準，就不能辨明社會中的是非。這是他們偷天換日的陰謀。按照他們的說法，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共同的“人道主義”標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就會有理說不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沒有客觀真理。再引伸下去就會認為，資產階級右派要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也不一定是錯的，而工人階級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也不過是出於它的“階級偏見”。這是多么荒謬和反動的邏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有沒有辨明是非的客觀真理呢？當然有的。真理就是人們的認識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是誰才正確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了呢？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事實告訴我們是無產階級。近幾十年中國的歷史證明：社會制度是不能由人任意選擇的。康梁變法，

曾經要在中國搞個君主立憲制度，結果失敗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企圖在中國建立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結果失敗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要想永遠堅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結果也失敗了。他們都不能反映中國社會發展要求。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它是最先進的階級，看清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道路，結果勝利了。這就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除了工人階級以外的一切其他階級的階級要求，都是與客觀真理相違背的。而工人階級的階級要求是與客觀真理相一致的。由此可知，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之間辨明是非的客觀標準，就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就是它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學說。對於我們社會來說，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是我們政治生活中判斷一切言論和行動的是非標準，因為它最準確地反映了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代表了我國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右派分子提出什麼“人道主義”標準，實際上就是混淆視聽，顛倒黑白，妄想以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來代替我們的六條政治標準，以便達到偷社會主義之天，換資本主義之目的目的。這是我們不能容許的。

右派分子從所謂超階級的“人道主義”出發，還企圖誹謗共產黨對群眾只提倡階級鬥爭，不講“人道主義”。有些好心腸的人听了，一時也覺得有些道理，不自覺地也把黨的階級鬥爭與真正的人道主義對立起來了。其實，他們不懂得：什麼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誰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我們知道，在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里，人權是屬於少數人的，大多數人是沒有人權的，所以真正的人道主義是不可能有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情形就根本不同了，人民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社會地位上都是平等的。馬克思說：“真正的人道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誰是真正人道主義的代表者和執行者

呢？毫無疑問，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因為工人階級擔負着破資本主義，立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由於它的社會地位和鬥爭條件，培養了它對全體被壓迫者深刻的人道感情，如恩格斯所說：“他們的命運是艱辛的，所以他們能夠同情境況不佳的人。在他們看來，每一個人都是人，而在資產者的眼光中，工人不完全是人”；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它為解放全人類，消滅一切使人不幸的社會條件而進行的階級鬥爭本身，就是高度地體現着真正的人道主義精神。由此可見，真正的人道主義，不是表現在對人施點小恩小惠的同情上，更不是表現在偽善的說教上，而是在實踐上歸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你不要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滿口“人道主義”，實際上他們是道德最敗壞的人。他們假仁假義地到處鼓吹人與人之間應講友愛，却處心積慮阻礙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做危害人民的事情。

（1957年9月13日“解放日報”）

論“人的尊嚴”

左 艾

右派先生們談起“人的尊嚴”來了。

“人權被踐踏，人的尊嚴受侮辱”。這是右派先生們加給黨的罪名之一。例如右派分子劉賓雁說：“新三反後，……人權受踐踏，人的尊嚴受侮辱，肅反中錯誤更大。不大會尊重人，把人的尊嚴權利看成微不足道。”又說：“現在很難怪誰，這是全國問題，歷史性問題，也是個小小的悲劇。”

好一個人權的維護者。但是，畢竟還不鮮明，右派先生們

要維護的是什麼人的尊嚴和權力呢？

在我們看來，人的本身是有階級烙印的。在階級社會中，由於人們所處的階級地位、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思想、感情、見解等等也就各不相同。人們總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為本階級的利益、權利、尊嚴作辯護，作鬥爭。右派先生們好像在為一切人爭人權、爭尊嚴，其實是自欺欺人。

在階級社會中，人的尊嚴也是不平等的。有剝削階級的尊嚴，就沒有被剝削階級的尊嚴。剝削階級人口雖少，由於占據統治地位，一切高人一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處於被壓迫被侮辱的地位，經濟上政治上既然是被統治的，精神生活上也是被束縛的。現在的青年對於過去的时代自然是太不熟悉了，但在六、七十歲的長輩們是見過也聽到過的。官上几品，出來鳴鑼喝道，前呼後擁，人民必須肅靜、回避，不僅是尊嚴而且是威嚴。不僅皇親國戚犯法不與庶民同罪，就是知識分子也比勞動人民高一等。見了父母官百姓要叩頭作揖，知識分子是不用下跪的；犯了法，必須革去“功名”，才能挨板子；同時，百姓得罪了他，一張名片送到衙門，便有被捉到衙門去的危險。“惡佃”（農民）欺主罪名，是可以殺頭的。地主老爺們打殺了農民，欺凌了他們女兒，是可以無罪的。到了民國，似乎是要好一點了，但是勞動人民仍是沒有權，更談不到什麼尊嚴的。不僅談不到人民的尊嚴，連民族的尊嚴也遭到玷辱。帝國主義倒可以在我們祖國土地上為所欲為，人民被屠殺被蹂躪。勞動人民處於飢餓與死亡綫上，只有被抓壯丁、被派款、指定圈名、被關、被打、被殺、被出賣之權。見了一個警察、保丁都要怕，人民那里來的“尊嚴”？自然和統治階級沾邊的知識分子，仍是高人一等。只要在外國鍍了金，住過國民党的中訓團，廬山受過訓，當了個偽國大代表、戡亂委員、立法委員……就會拿高薪，

享优待。不仅尊严，也十分威严。不过这些，黎民百姓是怎么样也没有份的。

和资产阶级的虚伪相反，工人阶级公开地宣布人权的阶级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和资产阶级的国家相反，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是统治阶级，他们有权，有地位，也有尊严。这就是工人、农民，及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那些成千上万的旧社会老爷看不起的粗人、庄稼汉、放羊娃、洗衣妇、唱戏的，数不尽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现在管理着这个伟大的国家。他们枯黄的脸色，双锁的愁眉，……都已经不见了，代之以喜形于色，主人翁的尊严和气势。有几种人是没有地位和失去尊严了，那就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反革命分子，他们是革命的对象，专政的对象。右派先生们为这几种人悲哀、感慨、争权，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

右派先生们大骂社会主义制度不民主，不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好象他们向往的资本主义就是自由的王国了！这是天大的撒谎。且看今日资本主义世界：阿曼起义者正遭受英军疯狂镇压；阿尔及利亚自由战士，正遭受法帝国主义野蛮的屠杀；在星条旗下，印第安民族差不多已完全被消灭，黑种民族不能和白人一样生活。这些民族的尊严受到了践踏。许许多多的象罗森堡夫妇一样正直的人，共产党人，和平战士被囚在囹圄，被监视，被限制，被莫须有地定上罪名。社会主义消灭了这一切罪恶，伸张了民族的和人的尊严。然而右派先生却不乐意。右派先生要的是什么“人权”呢？

右派先生们抓住了“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肃反运动，想从这里作文章，放毒箭。其实，任何人都知道，“三反”“五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斗争，资产阶级违背了遵守共同纲领的诺言，向党和国家猖狂进攻，大施其五毒，因而党领导了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不法行为进行了反击。这是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巩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更有效地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克服其消极的一面，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有利基础。思想改造运动，是知识分子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进行的自我改造，批判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这是一次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对于提高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起了重大作用。肃反斗争是处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和国家的进攻，由于全国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而引起的。这次运动，对保证我国和平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这些运动是采取群众路线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从运动本身来说，这些缺点也很难免，虽然上至中央，下至各级党和人民政府都采取了許多措施来力求避免偏差与错误。在发现了偏差与错误后，党和人民政府也立即进行了严肃处理 and 纠正。在这里，只有赞成不赞成这些运动，没有什么触犯人权和尊严的问题。右派分子在这里假借“人权”、“人的尊严”之名，而暗作其反面文章的花招，不是很明白么？在这些右派先生们看来，他们是“国宝”，不论他们有什么罪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还是一概碰不得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居然搞到他们头上，要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还了得。所以今天非翻案不可。

右派分子还说：“你们这次在全国发动反右派的斗争，是尊

重人嗎？”的確，这回右派先生是大出丑了。但是，只能說是自找苦吃。人民對待你們不算菲薄。在你們之中，不少人身為人民代表、政協委員、人大常委、部長、省長、局長、廳長……人民給予你們的信任和榮譽還算小嗎？四級部長羅隆基先生看球賽不都要坐在主席台上嗎？假如有良心的話，至少應該說自己所得到的要比給人民的多得多吧？！然而并不知足。你們要和人民走不同的道路，不要社會主義，而要資本主義復辟。趁着黨要求各民主黨派人士幫助整風的機會，到處召開座談會，大量發展組織，密示行天下，特派記者滿天飛，封官許位，四處点火。一時之間，風雲變色，右派先生們興高采烈，得意之至。專等時機一到，出現一個匈牙利事件的局面，演出改朝換代、黃袍加身的喜劇來。這種行為早就違背了中國人為人的道德。如果說尊嚴，首先是自己揭破了假面具。古語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己作了見不得人的事，怎能反過來說別人傷害了自己的尊嚴。想把工農勞動人民趕下台，重新安上資本主義寶座，人民起來還了手，保衛了社會主義天下，明明是場偉大的決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勝敗的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怎能說是傷害了先生們的尊嚴？

右派先生們的高論，自然也可以暫時蒙蔽一部分缺乏政治經驗的人，沒有領教過舊社會生活教育的人，俘虜一些不能從階級分析來看問題，本身還有許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觀點的人。但是，生活本身也是教育，歷史更是一面真理的鏡子。廣大人民記憶猶新。不久以前，九龍大慘案，台灣國民黨人員劉自然被美軍槍殺，兇手逍遙法外，中國人一條性命不值一文錢的慘事，仍然鞭打着人民的心。1949年10月1日，這是中國人民春天的開始。從這一天起，中華民族才以獨立而強大的巨人姿態出現於世界，中國人民才開始過着人的日子，享有人的

权利和尊严。人民把这当做一条永远的真理：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就永远没有人民的地位和尊严。社会主义是属于人民的！

右派分子说得对，的确，人的尊严问题是个“历史性的问题”，“全国的问题”；自然，也是个“悲剧”，不过不是人民的“悲剧”，而是右派先生代表的人们的悲剧，对于人民则是个大大的喜剧。

（1957年8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談認六親

周光廓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有一条策略叫做“共产党员六亲不认”。这就是说，一个人一入党，就来也不认爷，去也不认娘，当然更不要说什么兄弟、妻子、朋友了。咱们中国的传统习惯，一向是讲究个认六亲的，现在你们这班共产党员一反传统习惯而行之，连六亲都不认，这还了得！于是，颇有不少人上当受骗，跟右派分子一道跑了。“右派元帅”程千帆，在珞珈山上高挂“帅”字旗，招兵买马，恶毒的向党进攻，这个“六亲不认”的策略也被他用上了，而且也迷惑了一部分人，因此有加以驳斥的必要。

共产党员认六亲么？我们说，也认也不认。如果六亲都是汉奸、特务、土匪、恶霸、封建会道门头子，是为非作歹的家伙，是人民的敌人，那不认；不但不认，而且要检举。如果六亲都是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是右派分子，那不认；不但不认，而且要同他们展开斗争。如果六亲是阶级敌对分子，那

要看他們接受不接受改造，接受改造的就認，不接受改造的就不認。如果六亲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哪怕他們有缺点，甚至有錯誤，只要他們愿意改正，也照样認。共产党員認六亲，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看問題，而是从階級观点出发的。是要党要社会主义？还是要六亲？这里的界綫明白得很。

共产党員就止于認六亲么？不，共产党員有比認六亲更崇高偉大的愛。請看：

馬刀加頸，林祥謙拒絕了軍閥发出的号召复工的命令。

吃草根，啃树皮，爬雪山，臥草地，前有堵击，后有追兵，上有飞机，下有大炮、机关枪，紅軍縱橫十一省，坚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鋼刀在前，刘胡兰挺身就义。

为了减少同志伤亡，董存瑞托起了炸藥包，与敌人同归于尽。

在朝鮮，黃繼光用胸膛抵住了敌人的机枪；邱少云忍受了烈火焚身；罗盛教从冰窟里救出崔蠐，而自己献出了年輕的生命。

請問：这些共产党員，这些共产党教育出来的祖国的好儿女，他們拚头顱，洒热血，到底是为了六亲中的哪一亲？請問：崔蠐是罗盛教的父党？母党？还是妻党？請問：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又几时有过这种崇高偉大的愛？为了6亿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世界的持久和平，为了我們的子孙万代，无数共产党員献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今天，为了把祖国建設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还有无数共产党員在各种工作中坚持斗争。很明白，这种愛不知比那区区認六亲偉大若干万倍！这种感情是右派分子如程千帆之流永远也不会懂得的！

右派分子这么強調認六亲，那么他們該能身体力行的罢？

不錯，他們有時候似乎很能認一番。不信么？有事實為証。君不見害群之馬林希翎忽然成了老妖婆譚惕吾的座上客，君不見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韦卓民也忽然与右派元帅程千帆有了交情。当然物以类聚，这班野心勃勃的家伙为了统一向党进攻的步調，呼朋引类，原是难怪的。不过，有时候，他們这个六亲却有点認得奇怪。别的右派分子不說，单說程千帆。1956年冬天，程千帆到北京开会，向一个人大吹他和錢鍾書先生的关系如何好，說錢先生暑假到武昌华中师范学院来看他父亲的时候，还特地到珞珈山来看他。那人恰好同錢先生相識，以后見了錢先生便特別問起这件事，錢先生說我与程千帆素昧平生，根本不認識他，怎么会去看他！无巧不成書，沒几天三个人在一次会上碰到了，那人冷眼旁观，有意看程千帆如何同錢先生談話。一看，原来所謂老朋友者，还得彼此請教一番。这情形，使得錢先生也忍不住同那人相視微笑。招搖撞騙，投机倒把，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有勢就是爷，这就是右派分子的認六亲之道。

(1957年8月25日“长江日报”)

談“人情淡薄”

沈半丁

前些时，一些右派分子对新社会心怀不滿，不滿他今天的地位、待遇，不滿他的一些朋友被鎮压，不滿某些运动里党对他的审查，許多不滿化为憎恨，因而借“人情”問題来攻击新社会，攻击党。說什么“現今人情淡薄”，說党連起碼的“人情”都不講了，还有什么好处可言！

談到人情，想起俞伯牙和鍾子期的故事來，伯牙、子期的純朴的毫無隔膜的感情，為歷代人民所歌頌，但是在舊社會里，這種感情並不常見，特別在“文人”中間，更是難得，不然，在舊社會也就不會有“文人相輕”的話了。拿俞伯牙來說，這個曾獲得珍奇的人情的詩人，也嘆息道：“春風滿面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警世通言）就是連辛棄疾這樣熱愛祖國、胸懷磊落、交游廣闊的詩人，也曾嘆息道：“知我者，二三子。”當時知音少，倒也罷了，最大的問題，是由於階級的壓榨而給勞動者帶來無窮的災害，廣大的勤勞的人民，自己辛辛苦苦打的糧食，堆滿了豪門的倉廩，而自己卻掙扎在飢餓綫上。對於這些貧者，那般封建老爺們可曾講講人情？可曾想到貧者的飢寒？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有名詩句，不僅是封建社會里人民生活的寫照，同時，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主對百姓的所謂“人情”，是何等的菲薄！

人情，在階級社會里是有階級性的。

有些人，對黨不滿不忠實，隱瞞歷史，從來不講一句真心話，甚至暗地進行反黨活動，而他卻大罵黨不信任他，不講人情。而黨對他的教育照顧，他一概視而不見，這就是他們對黨之情。再來看看他們對別人的人情吧：有一右派分子，曾借錢給別人，而後却經常借討債為名，要挾那人，無理地讓那人為他效勞，而他也口稱“今日人情淡薄”，難道他借討債而奴役別人，也算是深厚的人情嗎？更奇怪的是，象江蘇省文聯右派分子陳椿年，一個道德敗壞的人，也高叫“今日人情淡薄”，這不是奇妙的諷刺嗎？在右派分子大嚷“人情淡薄”的時候，眼睛明亮的群眾，所想到的真正的人情淡薄的人，就是這群敗類！

與右派分子的謬論相反，在今天的社會里，人情得到最高度的最廣泛的最有意義的體現。趙桂蘭寧願雷汞炸掉自己的手

腕，而保全工厂和同志們的生命；罗盛教宁愿牺牲自己，而救崔澧；最近南京也出現了許多为群众利益和救护別人生命，而自我牺牲的同志。在这些同志的身上，最本質的表現了今天人与人之间革命的深厚的无私的感情，誰能說这是人情淡薄！党的劳保和五保政策，表現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劳动者的关怀，誰能說这是人情淡薄！

今天的人情，不仅象阳光一样地普照每个同志和劳动者，同时，也照到了右派分子的身上，党和人民对他們不厌其烦的諄諄告誡，辯理，挽救，希望他能从歧路中醒悟过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应该說是党和人民最大的寬容，最大的人情。某些右派分子，若認識到这些寬容和人情，而彻底交代，痛改前非，回头是岸，还能有其光明的前途；若再执迷不悟，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場，那便是自絕于人民，而党和人民对他的“人情”也就要真的“淡薄”了。其結果，是值得右派分子深思的。

(1957年8月22日“新华日报”)

我們提倡怎樣的独立思考

會 习 三

右派分子誣蔑我們党的許多問題中，有一个問題是說我們黨員都只是一些“唯唯諾諾”的人，好象我們黨員只是些“庸材”，“不敢說話”，“不能独立思考”。

共產黨員是不是不会独立思考的呢？共产党是不是不提倡独立思考的呢？我們党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我們党从来就鼓励一切黨員的积极性和創造性。这种积极性和創造性，是只有經過每个黨員的独立思考才有可能發揮出来的。我們的

党章总綱已經写得明明白白：“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們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創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問題，并且使它的理論不断地得到发展。”党章第三条第六款規定：“对于党的決議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見”。党章第二十六条又規定：“下級組織如果認為上級組織的決議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門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級組織請求改变这个決議；……”这些就說明了我們党不但在理論上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地独立思考，而且在党章中作了庄严的規定。我不能說我們每个黨員都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們每一个好的黨員和干部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并且由于这样做的結果，我們得到的成績也是輝煌的。

設想一下：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由无到有、由小組——經過解放区——到领导全国政权的大党；八年以来由农村到城市、由战争到建設；在各项工作中由不懂到懂；到今天已經完成两个偉大的革命，正在胜利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如果不是全党同党外积极分子一起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解决了实际斗争中的各种問題，如果說大家都不会独立思考、只是唯唯諾諾，能做到这样嗎？党章总綱还說到“党必須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揚党内民主，鼓励一切黨員、党的基层組織和地方組織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加强上下級之間的生动活潑的联系”。这就証明我們党並沒有满足于已有的成績，还一直在采取有效的办法来鼓励一切黨員的积极性和創造性，也就是一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提倡独立思考。同样，我們党对一切党外朋友和革命青年也是提倡独立思考的，并且經常告誡黨員要能傾听不同的意

見，尊重每一個提出批評和建議的人。

我們是鼓勵獨立思考的。這同右派分子所吹噓的“獨立思考”又有什麼不同呢？我現在來說一說我的理解吧。

首先，我們提倡的獨立思考，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也就是中國人民的立場上、黨的立場上的獨立思考。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吹噓的“獨立思考”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也就是反對中國人民的立場上的“獨立思考”。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承認階級鬥爭，不贊成階級分析，也說他們是“人民立場”，實際上他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我們黨是公開宣布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的，毛主席說：“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又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這就是說，我們的獨立思考，不能離開社會主義，不能離開共產黨的領導。如果離開社會主義，就是完全錯誤的；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一個領導核心，社會主義就不能勝利。這不是很明確的人民立場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挂着“社會主義”的羊頭，但是他們否認過去八、九年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說這個錯了，那個又是“一團糟”，他們打着“擁護共產黨”的幌子，但是他們到處誣蔑共產黨，要求共產黨退出這裡，退出那裡，要搞什麼“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這不正是很明確的資產階級的反人民立場嗎？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其次，我們的一切思考，都不能是憑空的，只能是實事求是的。我們想什麼問題，就要全面地、如實地了解那個問題，真正研究那個問題，否則就得出不正確的結論。我們憑信的是事實的真相，不是事實的假象，也不是被誇大了或者被縮小了

的事实。我們服从的是真理。真理是不能凭空想得出来的。独立思考同空想根本不是一回事；至于把造謠說謊也叫做“独立思考”，那就只有下流政客才能做得出来。章乃器說資產階級沒有两面性，就是說謊，因为資產階級的确还有剝削的一面，还有不肯接受改造的一面。章伯鈞在6月6日六教授的會議上，說共产党沒有办法了，非要請民主党派出来收拾不可，难道能說是什么独立思考嗎？

說到实事求是，这也同立場有密切关系。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問題是不愿也不能实事求是的，因为‘它不能承認我們国家的成績（虽然是不可抹杀的），也不能同意資本主义制度的死亡（虽然是不可挽救的），所以只能說瞎話。我們看問題，則不但能看到成績，也不怕指出自己的錯誤和缺点，因為我們和全中国人民一致，对自己的事业和前途都有信心，沒有隱瞞任何东西的必要。

有人說，既然要从实际出发，那又为什么要服从上級呢？服从上級同独立思考不是有矛盾嗎？我們認為上級所代表的意見一般地都比下級更为全面，下級所了解的問題通常又比上級較為具体，两者是有差别的。差别也是矛盾，但是这只是在立場、观点一致的基础上所存在的矛盾，是容易統一起来的。前面所引党章第三条和第二十六条就是解决这一个問題的專門規定。党章第十九条第三款还規定：“党的各級领导机关必須經常听取下級組織和黨員群众的意見，研究他們的經驗，及时地解决他們的問題。”右派分子誣蔑我們的党有关黨員个人必須服从党的組織、下級必須服从上級的規定只是培养一些沒有思想的唯唯諾諾的黨員和干部，不是胡說又是什么呢？

有些野心分子标榜“独立思考”，說是党所說过的話不要相信，不要“人云亦云”。一些缺乏經驗的青年，以为这是“解放

了”他們的思想。他們不知道，只要是真理，誰說過了的我們都可以再說，何況是黨——在三十多年的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它是光榮、正確和偉大的黨，為什麼不能相信和重述它的話呢？我要在這裡以一個老共青團員的資格（右派分子劉賓雁就不喜歡這樣的人在報上說話）告訴一切贊成社會主義的青年朋友們一句話：我的經驗告訴我，跟着共產黨走，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話，是不會走錯路的。

最後，要進行獨立思考，也應該有個科學的方法。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於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要提出一些比較系統的意見，如果不經過調查，了解它的歷史發展和內外聯繫，如果不分析它在目前條件下的地位和可能的變化，我們能思考出什麼正確的結論來呢？

試一試，就你最熟悉的或者最關心的問題來研究一下。你如果是今年的中小學畢業生，也可以就升學和就業問題來研究一下。任憑你怎樣獨立思考，總應當了解解放以來文教事業迅速發展的事實，了解新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目的，了解中小學畢業生參加工農業和手工業勞動的意義；關於就業，也要分析國家的需要和目前的各種條件，不能只憑自己的願望。如果離開這些聯繫和條件去進行“獨立思考”，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結果也就不能正確地對待升學就業問題。

當然，要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還要樹立正確的勞動觀點，要有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艱苦奮鬥的熱情，這又不只是思想方法的問題了。無產階級的、國家主人翁的立場和實事求是的唯物觀點，又要在這裡起作用。所以我們研究和處理一個問題，通常總是把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聯繫起來進行思考的，在這三個東西之中又要把立場問題放在首要的地位。

（1957年8月22日“中國青年報”）

也談“发展个性”

群 芳

—

在这次大鳴大放中，一些右派分子向我們进攻的口号之一，是要求“发展个性”。他們誣蔑共产党压抑和摧殘人們的个性，認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性不自由。而有些青年，在右派的蠱惑下，或者跟着搖旗呐喊，或者暗中同情，好象共产党真的不贊成发展人們的个性似的。

其实，誣蔑共产党摧殘人們的个性，并非从右派开始，历来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誣蔑我們。有一些对共产主义不大了解的人，也不断地对此发生怀疑。而我們共产主义者，也是不断地对这种誣蔑和怀疑进行駁斥和解釋的。毛主席在“論联合政府”中就曾指出过：“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贊成发展个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殘酷地束縛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則正是解除这些束縛……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我們不仅在理論上說明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人們个性的发展，而且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也証明了人們的个性在新社会中有了空前的发展。我們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广大工人和农民，在解放八年中，他們的个性究竟比解放以前得到发展了呢，还是受到压抑？毫无疑问，由于他們从奴隶地位变为国家的主人，經濟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

文化生活也有所提高，他們發揚了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他們有了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他們的性格也變得開朗活潑了。總之，一句話，他們大大地發展了自己的個性。就拿郝建秀來說吧，她在解放前是個吃苦的孩子，拾過破爛，成天吃不飽穿不暖，年紀很小就到工廠里做工，過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在這種情形下，她哪能發展她的個性？只是在解放以後，她在黨和政府的關懷與幫助下，覺悟才有了提高，創造了先進工作法，受到了人民的表揚；之後，她參與了國家政治生活，進了學校，現在還在学习中。大家試看，郝建秀在解放以前和以後，完全是兩個人，稍微有些常識的人，都不會說她在解放以後沒有發展她的個性。

但是，右派分子為什麼仍然大叫社會主義社會妨礙人們的個性呢？一方面，他們有意歪曲事實，故意誣蔑共產黨。另一方面，他們所要求發展的，是右派的個性，是林希翎、譚天榮一類人的個性，這種反人民的個性，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當然不允許他們發展，這就無怪乎使他們感到憤憤不平。

由此可見，我們和右派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即使使用同一個名詞，也有不同的含義。在階級社會里，不但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打上階級的烙印，就是一些名詞，例如“個性”，也都有階級內容。因此，我們也必須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待個性發展的問題。

二

什麼是個性？抽象地說，個性是和共性相對而言的。所謂共性，就是人們的共同性。在階級社會中，人們不是超階級的，因此，所謂共同性也就是階級性。工人階級有自己的階級性，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階級性。至於個性，則是人們的差異性，

这种差异，不是自然本质上的差异，例如年龄的大小，身体的高矮等，而是社会本质上的差异，这不外是性格、兴趣、能力的不同罢了。人们的个性尽管有所不同，但是，属于同一阶级的人们。无论如何，必须首先有他们的共性，个性是在共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个性固然因人而异，但人是有阶级性的，个性也就不能没有阶级属性。要么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个性，要么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个性，不可能有中立的个性。

在右派分子中，也是各人有各人的个性的。例如刘宾雁是以“革新者”自居，林希翎擅长造谣欺骗，谭天荣极端狂妄自大，伍俊卿是流氓成性，但是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就是千方百计地谩骂共产党，诬蔑新中国，这就是他们的阶级性。如果我们不看他们的反动本质，而盲目夸奖以至羡慕他们的才华、勇敢、作风洒脱等等，若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由于自己的愚昧。

和右派分子相反，我们革命工作者有另外的个性。就拿我们所熟悉的英雄人物来说吧，卓娅有卓娅的个性，舒拉有舒拉的个性，董存瑞是一种个性，黄继光又是另一种个性，当然，他们的个性尽管千差万别，但是他们却忠贞保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好汉，这就是他们的共性，他们的个性是在他们这种共性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

由此可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能抽象地谈发展个性，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个性，也就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个性，而不是那种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个性。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只利于发展无产阶级的个性，不利于发展资产阶级的个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则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但资产阶级却说消灭这种关系

就是排除个性和自由哩！它倒是**对的**。是的，正是要排除资产阶级的个性，要排除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和资产阶级的自由。”

讓那些右派分子狂叫吧！我們今天就是要打击他們的反人民的个性，而发展无产阶级的个性！

三

我們既然了解了个性不是中立的，只有在不离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前提下，才能有**良好的个性**，那么，我們青年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个性发展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答了。

我們都知道：在我們知識青年中，大多数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由于他們中有不少人还没有完全叛变原来出身的阶级，皈依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因此，他們当前一項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立場，从非无产阶级轉向无产阶级，也就是說，要从他們身上削弱以至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增加以至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使他們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識分子。只有这样，才有条件正确发展他們的个性，使他們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不这样作，而是依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場上，就决不能为人民之所爱，作人民之所需，他們的个性越发展，对人民的危害越大，这样，又有什么必要发展这样的个性呢？

有人說：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或共产党的党性（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和发展个性不相容的，一个人有了强烈的阶级性或党性，便都成为一个模子出来的人，便不能发展个性了。这样看法是不对的。加强党性与发展个性不是不可以統一起来的。而且党性越强，个性越能得到正确的发展。我們前面已經說过：个性不外是人們的兴趣、爱好、性格和才能等等。而这些并不是先天生成的，主要是人們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生活条件的影响而逐漸形成的。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

們的個性也隨着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於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人們的個性有了最大發展的前途，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們的個性的發展，也取決於他們的階級覺悟的提高。如果人們建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的偉大理想，並且堅持不懈地為這個理想而奮鬥，那麼，偉大的目的必然產生偉大的精力，他就會有大智大勇，他必然能夠以最大的努力來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以求把工作做好，他也必然能夠在集體生活中培養自己的高尚情操，在鬥爭中鍛煉出堅強的性格，……這樣，他就由一個平凡的甚至庸庸碌碌的人，逐漸變為有雄才大略、堅強偉大的人。他的一切力量的源泉，就是由於有了堅強的黨性。

在我們現實生活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例如為我們所熟知的模範共產黨員吳運鐸同志，他本來是一個煤礦工人，後來他接受黨的教育，參加了革命部隊。他在極端艱苦條件下，刻苦鑽研，創造了多種武器，而且他一再冒着生命的危險，突擊緊急任務，三次負重傷，但他始終以頑強的意志工作着，與死亡搏鬥，當他躺在床上時候，還堅持學習，堅持寫作和科學實驗。……凡是讀過“把一切獻給黨”的同志，誰都不會否認吳運鐸同志是一個很有黨性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而他這種個性，不正是因為具有堅強的黨性，才得到發展的嗎？關於這個問題，陳伯達同志在“人性、黨性、個性”一文（載“中國青年”1956年第12期）里說得非常精辟。他說：“一個共產黨員的個性，必須與黨性相一致，必須在黨性基礎上，才能發揮自己的多才多能。我們看見許多共產黨員的多才多能。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祕密。這種多才多能的黨員，大抵屬於黨性堅強的黨員：當他們受黨的指令，不講價錢，而走到一定的工作崗位上的時候（今天黨根據需要，而要他做這樣工

作，明天党也可以根据需要，而变更他去做另一样工作），縱使他們平日对于那項工作有如何的不习惯，不熟練，可是因为他們把全身心貢獻給党，給共产主义，就都能够在任何工作角落，生出力量，愚蠢变成聪明，困难变成容易，危險变成坦途，所以也就能把任何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出类拔萃。反之，有一种党性薄弱的人，对党分配的工作总斤斤計較不休，并且时常拿出‘个性’作为抵抗党的盾牌，这种人就不会多才多能，也不会对任何工作特别出色，因为他沒有把全身心貢獻給党，給共产主义，所以也就不能在任何工作角落生出力量，而聪明也可以变成愚蠢，容易也可以变成困难，坦途也可以变成危險。”我們希望对发展个性有兴趣的青年同志，好好思索一下上面的这一段話。

(1957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

主觀动机和客觀效果

汪子嵩

反右派斗争已經深入，右派分子开始檢討自己的錯誤。他們为了減輕自己的罪过，总将自己說成“动机是好的，只是效果不好”。章乃器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檢討”中說：“我絕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所以他提出“請求領導上結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檢查。”而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也是振振有辞地說自己动机是好的，原想帮助党整风，只因为年輕无知，情緒偏激，做錯了事情，将好

事做成坏事。有些同学就同情他們，說應該看到他們的动机是好的，加以原諒。由此可見，所謂动机好，在目前不仅已成为右派分子企图逃避認識自己錯誤的遁詞，而且也成為某些群众丧失斗志的温情主义的論据了。說明一下這個問題，还很有必要。

动机和效果

一个人在做事情之先，总在心里有个想法：想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主观动机。当事情已經做了，在社会上起了好的或坏的作用，这是社会实践，也就是客观效果。要判断一个人所作的事情，應該将动机与效果結合起来考察，不能割裂开来只看一方面。做革命工作就要求动机与效果必須一致。一个人如果动机不好，只为自己打算，虽然有时也能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但那只是偶然的；在另外場合下就可以犯錯誤，有时是严重的錯誤。如果动机是好的，想为人民服务，但做出来的事情却对人民不利，这当然也不是革命工作者所应当做的。所以作为一个革命工作者，應該要求自己有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同时也应当讓自己的工作处处做得对人民有利。應該讓动机与效果統一起来。

动机是主观的，效果是客观的。动机是在人心里，它是好是坏，是真好还是假好，别人不易判別；而效果是客观的，大家可以一眼看清楚，因此我們日常总用效果来檢驗动机，用效果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学生参加考試，尽管他心里想考得好，但不能很好回答問題，教师当然不会給他打五分的。北大右派分子譚天榮尽管說他自己的动机是为了“探索真理”，口口声声說自己已經发现了最新物理学的規律，人們当然不会承認他那些荒謬錯誤的“发现”是偉大的科学成就的。同样理由，尽管章

乃器口口声声說自己“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但他的言行实际上阻碍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为资本家帮了倒忙，决不是“忠于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有罪，这也是很清楚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动机的标准，只有唯心论者才强调动机而否认效果。

唯心论者将动机与效果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动机，只讲什么“良心”、“意志”等等。做一件事情，不管产生了多么坏的后果，他只要“捫心无愧”，就可以心安理得。这种逻辑是荒谬的，按这种道理，那么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时，虽然对革命犯了大罪，但他也可以说所以要讓资产阶级来领导，为的是要使革命更易胜利，所以动机是好的，只是想法错了。按照这样说法，毛泽东同志是想使革命取得胜利，而陈独秀似乎也是想使革命取得胜利；虽然效果完全相反，但就动机说，两个人并无不同。这就成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了，这就是唯心论的诡辩。现在片面强调动机的人，是不是也犯同样错误呢？所以主观动机必须由客观效果来检验，才能明辨是非，这就是与唯物主义的認識論——真理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同样的道理。

动机和立場

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不能单看动机，动机必须由效果来检验。但是一个人的动机是不是很简单的，只要他自己说自己动机是好的，他的动机就可以算是好的呢？当然不是。尽管章乃器說他自己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但经过大家揭发，原来他一貫就敌視党，并且自己还是一个违法的资本家，我們当然不能承認他的动机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俗語說，“知人知面不知心”，右派分子就是“聊斋志异”里的“画皮”，是

装着人面的妖魔。妖魔无论装得多么巧妙，终究是妖魔，难免不露出原形。动机虽然是主观的，但不是完全不能客观地判別；因为一个人所以有这种想法，他所以要达到这种目的，总是与他自己的阶级性有关的，即动机与立场是分不开的。章乃器实质上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但人们看得很清楚，他的动机和出发点是为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利益，决不是为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一个人的立场常常通过他对于事物的看法、感情表现出来。他对于这一阶级与那一阶级，这一事物与那一事物的爱恶，就可以客观地表现出他的立场。有人说：象章乃器、章伯钧这些右派分子，可以根据他过去的一贯言行来判断他的立场错误、动机不好，这是对的；但是青年人，有的并没有一贯的反动言行，凭什么说他动机不好呢？问题还是要用阶级分析，看他立场站在那里。有些青年人看到各种各样右派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时，就感到“好得很”，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去点火；当“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出来之后，就感到“杀气腾腾”。相反的，广大的青年人看到右派言论时非常气愤，到“人民日报”社论一出，才感到扬眉吐气，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这说明：同样的事情，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对它的好、恶可以完全相反，你能说：这两种人的动机是同样的好吗？再譬如：同样是右派的反动言论，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来，就模模糊糊、分辨不清；但在工人、农民看来，却非常明显，所以北大的右派学生的反动刊物“广场”送到印刷厂去，一班班的工人都排不下去，说“我们工人不能用自己的手来打自己”，爱憎这样鲜明。这还不是立场问题？判断一个人的动机时，我们当然不能光听他说他自己动机是好的，还必须看看他爱的是

什么、憎的是什么，看看他的立場站在那一边，才能相信他的动机是好的还是坏的，是真好还是假好。动机虽然是主观的，但还可以通过立場与感情来客观地加以判別，简单地相信人家說动机是好的，那就难免上当。

有意和无意

我們可以承認有一些青年人是无意中犯錯誤：他原来是想为党好，积极帮助党整风，后来受了右派思想的影响，产生偏激情緒，最后不自覺的站上了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参加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有一部分青年表现出这样的动机与效果的不一致的。但既已发现了不一致，自己原来想为党好，結果却成为反党，那就應該根据效果来檢驗动机，特別應該深入檢查：为什么自己就这么容易受右派思想影响？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容易产生偏激情緒呢？仔細挖根，就可以发现自己的灵魂深处原来长着一些膿疱，或者是自己从家庭出身、过去历史种下有反党的階級仇恨，或者是自己有狂妄的个人野心，或者是錯誤地夸大了个人的利害得失，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或者是沾染了資產階級的各种思想……。这只有在群众的帮助下将膿疱割去，接受教訓，彻底改造自己，这样才能爭取动机与效果的一致。也只有这样严肃認真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才能說自己原来是誤入歧途。至于那些右派分子，在被揭发批判之后，还坚持錯誤，不肯向人民低头認罪的人，根本就沒有起碼的对革命、对人民負責的态度，可以想到，他們在一开始对党和人民就是怀着恶毒的敌意的。对这种人，温情主义者还要強調他們的“动机好”，这也不是对革命負責的态度了。

(1957年7月27日“中国青年报”)

立場和动机可以截然分开嗎

季 申

在反右派斗争中，青年同志中間有一些人認為不少右派分子虽然站到反社会主义的立場上，但是动机还是“好”的，因而在斗争中，就表現得很軟弱。这种想法是非常錯誤的。温情主义是右派的避难的場所，不同温情主义作斗争，反右派的斗争就不能获得全胜。

立場和动机果真可以截然分开，果真会发生“立場是坏的而动机是好的”这样的情形嗎？决沒有这回事。一个人的立場就是他立身处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他的根本思想，也就是他說話做事的根本目的、根本动机。說某一些話做某一些事情的具体动机就是由这个根本目的、根本动机支配的。立場和动机說的都是人的思想状况，它們在根本上是一回事情，不是两回事情。

立場問題在今天我們中国來說，就是一个人究竟为社会主义的利益去奋斗呢，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个根本立場，具体表现在一个人对各种問題的看法上面，具体表现在一个人贊成什么、主張什么、不滿什么、反对什么上面。站在社会主义立場上的人，积极拥护国家各項工作的社会主义的方向，积极主張党对国家各項工作的領導。站在反社会主义立場上的人，积极要求变更国家各項工作的社会主义的方向，主張摆脱或削弱党对国家各項工作的領導。我們能說站在反社会主义立場上、主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們的动机——他們在說話和做事

时候所抱的目的是“好”的嗎？

比方說，有的右派分子提出要求取消高等学校中党的領導，叫囂党派退出学校；要求取消学校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反对政治課的必修制；要求按照資本主义国家里的一套去办我們的大学，反对学习苏联等等。据他們自己說，他們的动机是为了把我們的大学办“好”，而現在我們大学办得很“糟”，非根本改变方向不可。这个“好”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把我們的学校变成一个培育資本主义思想的温床，破坏我們国家造就社会主义建設人才的事业。“好”、“糟”这些字眼，在敌对階級代表者的口中，向来有相反的意思。右派分子所說的“好”，我們看来就是“糟”。他們自己認為“好”的动机，在我們看来就是很坏的动机。

資產階級右派要求变更我們办大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变更我們发展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要求絕對的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要求用人可以不問政治，……以至要推翻“作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根源”的“无产阶级專政”“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言論和行动，从站在反社会主义立場上的人来看，都是“好”的，在发表这些言論和进行这些行动时的动机也是“好”的。在反右派斗争沒有展开以前，如果有人去問这些右派先生們的时候，他們也会回答你說，我們所想、所說、所做的全是“好”的。那时候他們的立場是很鮮明的。那时候他們是站在反社会主义立場来使用“好”“坏”这样字眼的。直到反右派斗争展开，他們的反社会主义立場彻底揭露之后，他們才被迫承認自己說了“坏話”做了“坏事”，这就是說，他們被迫用我們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語言来称呼他們的言論和行动。但是許多右派分子，却至今不肯承認他們的动机也是坏的，这說明了他們的立場並沒有改变过来，还在坚持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立場。

用“好心說了坏話”、“好心做了坏事”为自己辯护的右派分子以为，“話”是別人听得見，“事”是別人看得到，而“心”是別人听不見、看不到。因此“心”的好坏可以随便由自己來說，別人无法測度。其实用眼用耳看不見、听不到的思想，用腦子也是可以捕捉得住的。办法是仔細地分析他們的言論和行动，把右派分子的本質一层一层地揭露出来。

当然我們不否認有这样的人，他們在发表右派言論的时候，自己沒有明确地意識到这些言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實質。这样的人，同那种事先明明白白地抱着反共反社会主义目的的人，是有区别的。后一种人是阴谋家和政治野心家，他們对人民、对共产党有着更深切的敌意，是更恶毒的右派分子。但是，前一种人同后一种人間的区别并不具有根本的意义。我們不能說前一种人的动机是好的。姑不論前一种人或是后一种人他們都是有意識地反对社会主义，因为言論和行动都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不同的只是意識明确的程度罢了。对这种原先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識不十分明确的人，現在正經歷着一个考驗：当党和人民指出他的錯誤的时候，如果不痛改前非，那么他就完全自覺地站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場上面。

有的青年同志还有一种錯誤看法，認為不少右派分子虽然站在反社会主义的立場，但是他們的心还是“善良”的。他們以为有些右派分子只是对国家的某項工作提出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主張，而看不到右派活动的危害性。他們不了解在各个方面右派的言論和行动，如果不受到有力的回击，是会汇合起来成为一个不可忽視的反社会主义的力量的。这个力量会把我們国家的发展引上資本主义的道路。而在我們的国家走資本主义道路是什么意思，在我們国家走資本主义道路的结果是什么，一个真正心腸善良的人是不能不考慮一下的。我們可以想一想中

国如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复辟呢？其结果必然使我国重新沦为殖民地，使被推翻了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重行骑在人民头上，使我国人民重新处在灾难的境地。我们还要记得，中国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就会使世界和平遭到破坏，战争的灾难就会落在各国人民的头上。我们能说企图使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心”是“善良”的吗？“善良”也是有阶级性的。如果认为右派分子的心是“善良”的，那么为了人民过幸福光明生活奋斗的心就不是“善良”的，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观点吗？

“立场是坏的，动机是好的”，或者“好心说了坏话”、“好心做了坏事”这些说法，是右派用来削弱人们的斗志的手法。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特别要警惕这点，明确自己的立场，揭破他们的欺骗，克服温情主义，坚决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1957年8月5日“中国青年报”）

谈“士可杀不可辱”

朱 傲 园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有些右派先生一谈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传统时，就愤愤然地带着示威性的语气说：“士可杀，不可辱”！言下之意，儼如我们的党和劳动人民真的侮辱了知识分子，他们这些抱不平的“英雄”大有不甘罢休之势。

不错，在祖国悠久的历史上，忧国忧民、宁死不屈的“士”，确是不乏其人。远的不说，近代的李大钊、瞿秋白、李公朴、

聞一多等，就都是這樣的“士”。他們為國家和人民的美好將來，不畏艱險、視死如歸，英勇頑強地和反動統治者進行搏鬥的精神和高尚氣節，將永遠被人民歌頌不忘。可是，在今天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里，竟有人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成效地領導着 6 億人民建設幸福生活的共產黨，也講起什麼“士可殺不可辱”之類的話來！這恐怕很難證明講此話的人們是“有骨氣”吧！

那些說“士可殺不可辱”的人們，認為共產黨在什麼事情上侮辱了知識分子呢？請聽！

有人說：肅反運動慘無人道的侮辱民主黨派和教授的身份。

有人說：許多人聽到改造就很厭煩……為什麼硬要用改造這兩個字引起知識分子的反感呢？

有人說：通過歷次社會改革運動，一次再次三次殘酷地打擊他們（按：指知識分子），唯恐斬殺不絕，千方百計地從精神上加以折磨……

類似的話，不勝枚舉。總之，說這類話的人在不同程度的表現出對我們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進行的各種政治運動的反抗情緒，認為政治運動是“整人”的運動，對他們是一種“侮辱”。他們這種看法對嗎？應該怎樣去理解呢？我想應該從兩方面看。

對某些右派分子說來，他們認為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受了“侮辱”，倒可能有幾分是真的。因為，不少材料證明，有些右派分子就正是過去政治運動中的鬥爭對象。既然這樣，什麼“狡猾”、“抵賴”、“不老實”甚至“耍死狗”等等在“文人學士”看來“有傷大雅”的逆耳之言，在運動進展中有的群眾可能也會指着這些“學者”、“教授”、“頭面人物”們的鼻子說過幾聲。這對他們豈不是一種“侮辱”嗎？我想，果真如此的話，那也是“咎由自取”，不能怪別人。倘若自己徹底乾淨地交代和批判了自己的反動言

行，而沒有做出什么丑态，別人何至于“出言不遜”！同时，話又說回来，开展任何一种政治斗争，就連对斗争对象說来，也决不单单是为了斗争，除此之外，还有一面，那就是挽救他們，使他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可惜，有些人只看到前者，不看后者，运动过去几年了，仍耿耿于怀，象受了什么奇耻大辱似的。这除說明他們自己抗拒改造，頑强与人民作对之外，說明不了別的任何問題。

至于对广大正直的、爱国的知識分子說来，过去的各种政治运动，非但不是什么“侮辱”問題，恰恰相反，倒是“愛之以德”的表现。就拿“許多人(?)听到改造就很厌烦”的思想改造运动來說吧，人所共知，这个运动批判了許多反动思想，大多数知識分子就是通过这个运动初步弄清楚了为谁服务、走什么道路等带根本性的問題。事实証明，这样做真是大有好处。这次整风运动中，那些表示坚决贊成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領導，能經得起风浪冲击，不受右派分子花言巧語所迷惑的知識分子，就正是过去比較認真地进行了思想改造，又在其他政治运动中确实受到了鍛炼的人。可以預料，如果沒有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改造，知識分子中定会有更多的人被右派分子拉下水去，陷入泥淖，其后果何堪設想！由此看来，党領導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帮助他們清除头脑中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階級思想，树立起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不正是真心实意地愛护他們，团結他們嗎？何辱之有呢？

事情很清楚，今天右派先生們把知識分子在旧社会受压抑、遭迫害的情况下所喊的“士可杀不可辱”这一有力的反抗呼声，搬来向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示威”，显然是别有用心，蓄意煽动知識分子来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劳动群众。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他們当然也还抛出了其他一些含毒的甜藥来迷感知識

分子，如罗隆基說的“十个大学教授可以抵得上十万群众”，就是一剂披着誘人的糖衣、含着猛烈的毒性的毒藥。正直的、愛国的知識分子們一定要提高嗅覺，擦亮眼睛，不上他們的当。

我們再看一下吧，那些口喊“士可杀不可辱”的右派先生們，有那个不曾向他們的“故主”——国内外反动派搖尾乞怜，獻媚討好呢？大概那就是他們做人的“尊嚴”吧！明眼人不難看出，他們這流人是根本不可能具有“士可杀不可辱”这样的气节的，說他們具有死也不肯接受社会主义的反骨，倒是千真万确！

(1957年8月22日“長江日报”)

“士为知己者死”

唐 弢

封建社会早已結束了，然而也还有人留恋着那时候的生活。作为知識分子的祖宗，孔老夫子一生栖栖皇皇，坐着大車到处奔走，希望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主子，好推行自己的主張。风尘仆仆，辛苦自然是辛苦的，也許就是因为是孔老夫子的緣故吧，在寻覓“知己”之际，毕竟还能抱着“合則留，不合則去”的原則。到了末流，士——所謂知識分子也者，終于淪为食客，逐臭寻羶，朝秦暮楚，其目的只在于啖飯，談不到什么远大的理想了。这时候，“有乳便是娘”的哲学便抬起头来，但也还有一个比較文雅的名詞，叫做：“士为知己者用”。于此野心家也就有了回旋翱翔的地盘。

今天的右派集团是很懂得这套哲学的。烏鴉徐仲年說：“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正是待善价而沽的意思。丁陈反

党集团里的陈企霞还要进一步，改“士为知己者用”为“士为知己者死”，从他自己的角度說，是我为人死；从他所号召的对象說，是人为我死。死什么呢？曰：死“知己”；所“知”者何？我看頂多象历史上蔡邕哭董卓一样，只为董卓对他有过一点小恩小惠而已。这是十足的封建社会的关系，不料竟成了共产党员陈企霞所奉行的經典！

作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不应该怕死，然而却只能为阶级的真理而死。李大钊、方志敏、黄繼光、董存瑞都是这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陈企霞有什么理由要为丁玲去死？丁陈反党集团又有什么权利来要求别人为他们而死？在永无餍足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蠢动下，通过一点假仁假义的“撫慰”，就要换取别人的生命，这不叫做“知己”，而是资产阶级一本万利的“生意經”。有人还在高叫什么“士可杀而不可辱”，据我看来，单就这一点而論，也已经被“辱”得很够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的毛病，所謂“秋毫”，实际上只是他个人的“秋毫”，即使是衣服上的一个折縫，一着了肉，也会觉得如芒刺在背，从心底里感到不舒服。因此对于許多个人問題，終是撒不开，忘不掉，洒不脫。丁玲就是最善于从这种地方来籠絡人心的。你觉得行政工作太多，沒有時間写作，心里正有点煩厌嗎？她就說：“你現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你觉得很久写不出东西，有无限苦悶，心里正在着慌嗎？她就來提倡“一本書主义”，說：“只要你写出一本書，誰也打不倒你。”逢人之惡，阿人所好，这就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本領”。而且也的确有些人，忘記了党对他們的培养，从这里产生“知己”之感，引丁玲、陈企霞为同調，墮入彀中，成为这个集团的“死党”。由于今天知识分子的生活已經得到保障，这些人虽然不至于真的去当丁陈門

下的食客，但在精神領域內，却的確分到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一杯羹，舒舒服服地咽下肚去了。

這就是所謂“士為知己者死”的實質。

果真有這樣的“死黨”嗎？在無產階級思想光輝照耀下，集體主義的精神是一定要勝利的，知識分子的毛必須依附在無產階級的身上，黨，才是每一個人的真正的知己。

8月26日夜。

(1957年9月2日“人民日報”)

厚顏無恥之“士”

施文遜

當人民抓住這些右派先生，讓他們向人民交代罪行，並揭露了他們的丑惡本質，要他們低頭認罪改邪歸正的時候，有的右派分子不但不感激人民的寬大為懷，反而叫喊什麼“士可殺不可辱”，認為人民侮辱他了。如果這些人不是野心不死狡猾抵賴，當真還懂得什麼叫做羞恥，就應該用自己的眼睛看看事實，用自己的腦子想想自己的言行。遠的我們不說，單看他們在黨整風，以坦蕩的胸懷征求意见的時機，却鬼鬼祟祟地“做為”了一番；他們誣蔑了人民，誣蔑了社會主義事業，誣蔑了共產黨，而且到處放火，挑撥是非，陰謀蠢動，企圖騎到人民的脖子上去，建立他們的統治。他們做了這麼許多不可告人的醜惡丑事，事實上人民絲毫沒有侮辱他們，而是他們對人民做下了比侮辱還毒辣的罪行。難道這還不允許人民來做正義的責問嗎？歷史上的統治者是有這條金科玉律的，他們把自己對人民的欺凌說

成是皇恩浩蕩，當人們反抗的時候却認為是對他們的侮辱，侵犯了他們的尊嚴，但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

在一陣造謠誹謗之後，這些人不以為恥，却還居然以“士”的身分自恃。究竟是什麼樣的“士”呢？拿出這些頭面人物來看看，這都是些“學而優則仕”的人們，有幾個不是舊社會里上層的风云人物，名流之士？他們有的是輾轉於政治舞台上的政客、政治野心家；有的是壓迫勞動人民的幫兇，即所謂謀臣術士；有的干脆就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的“士”；這些人都是相棋盤里身居“將”“帥”左右之“士”，他們在舊社會里，熟知世故之道，在統治者的階梯上爬上爬下的名士，他們這些“士”不僅是站在勞動人民之外，而且是站在勞動人民頭上的。他們是“禮不下庶民”的自封為“人上人”的特權階級。

黨和政府向來重視發揮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祖國各項建設事業中，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努力工作和學習，進行着自我改造的。而右派先生們却叫着什麼中國有“禮賢下士”的傳統，贊揚着中國古代統治者的“謙恭下士”的“美”德，同時又高唱“士為知己者死”，言下之意是，勞動人民和人民的領導者沒有象舊社會統治階級那樣把他們當做“知己”，尚不“知”他們。我們說，這些腐臭發霉的士大夫思想，正說明了他們不“自知”。我們勞動人民是非常懂得禮貌的，更非常懂得什麼叫侮辱；在舊社會里我們已經受盡剝削階級的欺凌與侮辱，我們絕不會使用這套手法把它加諸於任何人；而不懂得禮貌為何物的，正是這些干了丑事不知羞恥的“學而優則仕”的右派先生們。

反右派鬥爭中，人民已經是多麼寬宏大量！如果這些右派先生們認為人民的指責是侮辱，傷害了“士”的自尊，那就只有他們自己放下這個臭架子，放下“人上人”的身分來說話，否則，自以為“士”的奇貨可居，竟拿出“死”和“士”的派頭來堅持反動

立場，以表示自己的臭硬，這只是自絕于人民而已，豈能吓住勞動人民！頑固的右派分子有的尚故做鎮靜以自慰，他們還自吹什麼“沉得住氣”、“從容的風度”、“平靜的心靈”，却不說他自己這張文雅的臉皮太厚了，當稱之為厚顏無恥之“士”。

(1957年8月15日“北京日報”)

“叛逆性格”

姚以鈺

這次文藝界揭發的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當中，有不少人自詡具有“叛逆性格”。

人們知道，在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時，我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分析，了解到“紅樓夢”里面的賈寶玉、林黛玉的靈魂深處發出光輝的核心的正是他們的“叛逆性格”。這是在封建的藩籬之下，新的時代精神的萌芽；這是一道閃光，照亮了人們為着爭取作為一個人的待遇所應走的道路。但是，先進的思想，不能為當時的時代所理解，叛逆的火花注定了他們的命運的悲慘的結局。

居然，在時隔數百年之久的今天，社會生活的巨輪已經經歷了遙遠的路程，達到賈寶玉時代所不可企及的高峰，却有人又在發出深沉的嘆息了。右派分子王染野就訴說着自己的苦悶，大聲感嘆：“為時代所不能理解的苦悶啊！”“我這是賈寶玉式的苦悶啊！”等等。王染野說他的苦悶是賈寶玉的苦悶，不言而喻，他一定是把今天的社會生活看成和束縛個性發展的封建藩籬一樣了。於是，我又想到北京的右派女將林希翎，也曾長吁、短

叹于她的生不逢辰，早生几十年，可以干一番事业；迟生几十年，据说也可以干一番事业，可惜，偏偏生在今天，为时代所不能理解。于是，也有她的苦闷。看来，右派分子的苦闷真是差不多的东西。

目前，虽然他们的威风被打垮了，不得不低下头来。可是也许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支柱——自以为是代表新的时代精神的萌芽，有着为当代人所不能理解的“叛逆性格”。试看右派分子陈椿年把自己比作一棵小树，说是被你们砍了一刀（事实是党和人民为了挽救他而给他的教育），过一年以后就会恢复生命力的说法，不正是这种所谓坚毅的“叛逆性格”的明证么？

世界上如果是有英雄与狗熊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贾宝玉的苦闷和王染野之流的“苦闷”的差异，难道还不是明显的么？把自己打扮成英勇的骑士的右派英雄们，又是产生在什么样的腐烂的根子上面，不妨揭示一下。

说是叛逆倒也确实是叛逆，王染野之流的叛逆是对当今的时代精神、人民事业、社会前途、党的领导的叛逆；是对他们的革命外衣、进步幌子的叛逆。如果说，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是新的时代精神的火花，那么，右派分子的“叛逆性格”则是已经进了坟墓的没落阶级阴魂的回光返照。如果说，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在当时受到压抑而终于形成一种斗争力量的话，那么，右派分子的“叛逆性格”就只是绝望的无力的反扑，只要稍稍一触即溃的。差异就在这里。

危险并不在于右派分子自我欣赏的“叛逆性格”的“坚毅”，危险却在于有些人天真无知，受到这种所谓“叛逆性格”的蛊惑。常常欣赏这些右派分子的“才气”。只要看到所谓“大胆”、“勇敢”、“别创一格”、“与众不同”，就不分青红皂白，拍手叫好或者暗暗称许起来。因此，不剥开这层外衣来看到内体的话，一则

見不到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二則，說不定你會被他們這層外衣所迷惑，跟着他們跑。到那時候，可就糟了。

(1957年8月19日“新華日報”)

慘痛的教訓

——“過關談”之一

巴 金

這次反右派的鬥爭的確“震動了知識界”。右派分子一個一個地被揭露出來，現了原形。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大家熟悉的各界的“知名之士”，其餘的至少也是知識分子。所以有人說：“這次是秀才造反”。這倒是值得知識界好好考慮的。這一兩年來知識界中充滿了一種論調：“知識分子已經改造得差不多了。”領導同志曾經客氣地說過：知識分子是國家的財富。這原是一種鼓勵的說法。許多人居然真以“國寶”自居，口口聲聲夸耀自己是“高級知識分子”，要求特殊的地位和所謂“國士”的待遇，大有建設新中國非我莫屬之概。特別是這一年中間有些所謂“高級知識分子”的氣焰高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高到了快要恢復“勞心者治人”的舊看法了。也有人暗地里擔心過知識界中要出鬼。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鬼會出得這麼快，而且鬧得這麼大。前些時候右派分子一直在嚷“揭蓋子”，現在蓋子真的大大地揭開了。於是大家看見：（一）有些所謂“高級知識分子”的面目原來是這樣丑惡；（二）他們的野心原來是這樣大。大家才恍然大悟：知識分子的改造並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很遠”。右派分子既然

要跟工人階級爭領導權，哪里還承認改造？既然不要工人階級領導，哪里還肯走社會主義的路？他們哪里要建設新中國，明明是想把大家拉回到舊中國去。這不是“造反”是什麼？

有一個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得意地招供：“秀才雖然不能造反，可是他們會鼓動別人造反”。所以右派分子到處點火，煽動學生上街，準備在中國製造匈牙利事件。他們自以為算盤打得很好，“天下”唾手可得，卻沒有想到現在已經不是“勞心者治人”的時代了。放火的只是一小撮人，滅火的卻是廣大的人民。他們妄想自己可以抵擋三百万軍隊，誰知僅僅三篇社論就把他們繳了械。右派分子雖然狡猾陰毒，可是除了低頭認罪外，再也沒有別的生路。

右派分子從進攻到失敗這一段時間內的活動可以說明一件事：這些知識分子不但沒有知識，而且也沒有常識。他們只有一樣本領：騙術。他們先騙了別人，然後欺騙自己。又有人把他們比作賭鬼，整天關着門聚賭抽頭。外面已經在大喊“抓賭”了，他們的賭興正濃，還夢想一擲千金，贏來一個王國。在這些人的身上哪里還有一點書生的氣息？雖然他們披着“教授”“學者”“作家”“代表”“高級知識分子”的外衣，干的卻是賭鬼、騙子的事。等到有人敲門抓賭，他們的騙術當場出丑，他們就吞吞吐吐、躲躲藏藏、哭哭啼啼，甚至裝病裝死，耍無賴、耍流氓腔。這就是他們的“骨氣”，這就是他們的“清高”。他們大概因為沒有受到“國士”的待遇，就率性撕掉假面，露出流氓面目來了。

遠的不說，象我們近來常常看見的陳仁炳、彭文應、孫大雨、王造時、陸詒、許杰等等不都是這樣的人麼？

他們這一小撮人的確是我們的反面的教師。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接受這次慘痛的教訓。我們都應該好好地檢查一下：我們究竟有多少知識？我們究竟改造了多少？我們拿什麼來為

人民服务？又怎样过社会主义的关？

(1957年8月27日“解放日报”)

“国士論” ——“过关談”之二 巴 金

今天的知識分子中真正和工农打成一片的新知識分子还是占极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是旧知識分子。旧知識分子喜欢吹嘘自己的“清高”和“骨气”，字眼当然是很漂亮的。其实这种高不可攀的“清高”和“骨气”，說穿了也并不希奇，用他們常常摇头摆脑地念来念去的一句“豪迈的話”来解釋倒很恰当，那就是“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我現在把它称作“国士論”。右派分子在这次猖狂进攻和退却檢討的时候都使用过“国士論”这个武器。例如徐中玉在他的所謂“第五次檢查”里就一再地承認：“具有‘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的思想，”“象‘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之类的思想在我身上是十分严重的”。要是得不到“国士的待遇”呢，据他自己解釋就会“滋生出反党的情緒和思想，进一步就会做出反党的行动来”。

徐中玉說得很明白：我反党，因为党不以国士待我；党要是早以国士待我，我早就拥护党了。章罗联盟中的所謂“大知識分子”都說过和这类似的話，好象錯不在他們似的。那么我們再看这些先生們是不是受到了“国士的待遇”呢？大家可以替他們算一算，他們究竟身兼若干职位。这是有目共睹的。連徐中玉

也不是例外。可見党待他們實在不薄，他們为什么还要反党呢？原来“国士”的解釋可大可小，个人的野心无穷无尽，做了皇帝还想成仙。象章伯鈞、罗隆基之流，即使做到了总理、副总理，他們也不会認為受到了“国士的待遇”，更不会停止他們的反党的活动。即使在檢討中，他們还繼續提出要求：“拿国士的待遇”来。

“国士論”做了右派分子的武器，并不是沒有原因的。它本来就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长久被人販賣，又染上了市儈气。发明“国士論”的老祖宗豫讓有过这样一段历史：他当初在范中行手下做事，范中行把他当普通人看待。后来智伯灭了范中行，他又到智伯手下做事。智伯很喜欢他，他認為自己受到了“国士的待遇”，等到赵襄子灭了智伯，他就出来替智伯报仇，說是：以国士报答智伯，又說是“士为知己者死”。这件事似乎成了千古美談，至今犹为旧知識分子所津津乐道。“国士論”也成了旧知識分子經常夸耀的处世哲学。其实我們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剝掉它那“清高”与“骨气”的綉花外衣，看到里面腐烂发臭的膿疮。所謂“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在今天看来不过是“求善价而沽之”的生意經。旧知識分子喜欢把自己当做商品，拿自己去卖好价錢，专等大主顧、大老板“三顧茅廬”。誰出得起高价，就跟誰走。哪个最看得起我，就是我的知己，不管他是好是坏。沒有大主顧，就“退而求其次”，反正得几分錢給几分貨，自己又不会吃亏。范中行待我不厚，我就替他的敌人出力。智伯待我不薄，我就为他送命。蔣介石来也好，章伯鈞来也行，只要他能出高价，“以国士待我”，我就“以国士报之”。有奶的便是娘。哪个管你“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死活？这种出卖自己灵魂的市儈哪里有一点“清高”和“骨气”？也許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清高”和“骨气”吧。沒有“原則”，沒有“是非”，这正說明

了旧知識分子过去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帮闲”和“帮凶”的地位。他們认为自己并没有“立場”，其实他們是站稳了资产阶级的“立場”的。现在还迷恋那种地位的人必然会掉进右派的泥坑，这是不足惜的。但是还没有掉进泥坑的大多数旧知識分子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

今天并没有“帮闲”的地位留下来，国库里也并未贮存“国士的待遇”。新社会不是过去的那种大老板、大主顾。新社会有一道人人要过的大关口，那就是“社会主义关”。谁要在新社会长期生存，就得过“社会主义关”。要过“社会主义关”，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場”。要从“待价而沽”的“国士”变成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新知識分子，并没有“捷徑”，只有一条长长的路：認真地改造自己。

不改造，或者改造得不好的人都过不了“社会主义关”。

8月28日

(1957年9月2日“解放日报”)

談党內的右派

許邦儀

共产党內有右派。这是我們必須加以正視的事实。有一些好心腸的同志对于这个事实还有点儿将信将疑。他們总是認為：既然是共产党員，怎么会是右派呢？應該說，这种看法本是无可非議的。一个共产党員当然不应当是一个右派。可是，我們党內确实又有一小部分是名副其实的右派人物。如果我們忽視党內右派分子存在这个事实，我們就将会犯不可寬恕的政治錯

誤。党内的一些右派分子在名义上虽是“共产党员”，而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上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是社会上右派分子在党内的应声虫。他们在党内人数虽少，危害极大，乃是党的事业的心腹之患。君不见，在这次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中，党内的一些右派分子竟然密切配合，乘机出击。他们有的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同谋”或“共鸣”；有的互相呼应，里应外合；有的是“急先锋”，有的是“后卫队”；有的是“作战参谋”，有的“呐喊助威”。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成了党的叛徒。

党内右派分子与党外右派分子，既然都统称“右派”，也就可以说明他们是有共同性了。他们之间的共同性，简单地说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不过，一个是在党内反，一个是在党外反。“内”和“外”，可以互相勾通，也可以互相支援。有的党内右派分子就企图借党外右派分子的支援来达到个人反党的目的；而党外右派分子就尽力寻找党内右派分子作为内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党内的右派分子都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他们共同的攻击目标就是党。

党内的右派分子由于有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更容易欺骗人和迷惑人；他们比党外右派分子更多一个“本钱”，就是多知道党内的一些机密（这次社会上右派分子对党进攻，就有一些党内右派分子提供机密材料）；此外，有些党内右派分子在党内又是有较高职位的，他们对党的破坏性就会更大。

难道我们对于党内右派分子能够等闲视之么？切切不可。在这次政治大风浪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既然表现得对党那样无情，那么，我们也就应该在群众面前剥去他们漂亮的外衣，使人们认清他们丑恶的真面目。在这一点上，理应同党外右派分子“一视同仁”，来不得“温情主义”。

按照辯証法，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党内有右派是坏事，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党内的右派反党活动暴露以后，又可以使我們接受教訓，教育每个党员，并把不可救藥的右派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使党更加純洁，更加巩固。这样，坏事也就会轉变成好事了。

正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党内右派分子之形成为右派，也有他們的发展过程。有相当数目的党内右派分子发展过程的路綫，往往就是从思想上严重的个人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右派（至于原先就是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又当別論）。他們在党内往往由于个人的欲望（地位、級別、待遇、享受、权力等等），得不到滿足；或者在党内受到一些“委屈”，于是就怀恨在心，到处不滿；于是就离心离德，三心二意；于是就否定一切，尽找缺点，不看成績；只看阴暗面，不看光明面；于是就別有企图，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欲达目的，不擇手段；于是就墮落成为右派人物，于是是什么共产主义，什么为人民服务，就“吾不复梦见周公”矣。

（1957年8月4日“人民日报”）

对党内右派分子不能心軟

許邦儀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党内隐藏着的一批右派分子已經紛紛被揭露出来了。这件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把党内的右派分子揭露出来，第一，可以使人們認清楚这些反党分子的真面目，不再受其欺騙和迷惑，党的事业也就可以免于受到危害；

其二，使全党的团结和统一进一步巩固起来，会使党成为比以往更强大、更与群众密切联系和更加能引导群众走向胜利的先鋒队；其三，可以使每个党员吸取到深刻的教训，并受到一次究竟什么人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实际教育，这会使党员的称号更加提高，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真是一举数得。无论是从眼前看，无论是从长远看，揭发党内右派分子这件事，确实是好得很。

这是件好事，但并非易事。这除了由于党内的右派分子更善于伪装，更会适应环境，还由于我们有些同志对于他们有点儿“怜恤”和“姑息”，或者有点儿心软和手软。特别是有些同志看到有一些反党分子有二、三十年党龄、是“老党员”和“老干部”，就有点更不忍心了，就更有点儿温情了。

无疑的，老党员和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是应当爱惜和受到尊重的。我们党内绝大多数老党员和老干部又是久经考验和无限忠诚的，是真正经得起大风大浪的。可是，事实又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内确实有一些“老党员”和“老干部”是蜕化了的，是变了质的。象馮雪峰、丁玲、刘培植等人，他们虽有二、三十年党龄，如今他们却堕落到可耻的反党泥坑里去。我们首先要肯定这一点，这是一个质变，他们是从党员变为党内的敌人。只有把矛盾的性质弄清楚和弄明确了，才能消除“温情”，也才能给那些牛鬼蛇神以充分的揭露和有力的打击。

谈到“老”，既然是“老”党员和“老”干部，就理应党性更强，立场更稳，也就理应表现得更好。“老”，那就不应站在党的对立面，来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老”，更没有反党的特权。难道二、三十年党龄可以作为反党的本钱吗？难道因为“老”就可以不受党的管教吗？天地间是找不到这样一个党，是可以允许

自己的“老”黨員进行反党活动的。任何一个“老”黨員有了反党的言和行，就应受到党的制裁，这是天經地义。否則，那还叫做什么共产党呢？

总之，对于党内右派分子，同样要狠心。共产党员是不可以做一个东郭先生的。如果不把他們充分揭露出来，容忍他們隱藏，那么，他們就会运用法术，一級一級地爬上去，后患就不堪設想了。

(1957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右派隱形术

阮延順

秀才当了賊，就在招供时，也是善于辞令的。其妙处在于，当他被迫在脏証面前承認了罪行以后，还可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良民；借以軟化一些人的心腸，擋住別人揭发他更多的罪証，以隱住真形混过关去。右派“头面人物”們正是这样一些貨色。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們被迫承認了揭发的一些事实；“投降”呀，“請罪”呀，“認錯”呀，“要求寬恕”呀，“重新作人”呀，个个显得誠恳异常。但說到自己是什么人时，却又說并非右派分子。

根据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是各有另外的名号的：黃琪翔是“二十年間……思想上沒有一时一刻离开过共产党”的；譚惕吾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就热爱党，靠攏党，决心跟着党走”的；章乃器是“真金不怕火”，“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沒有任何共同之点”的；黃紹竑是想“跟着共产党后面混

进社会主义社会”去的；龙云是主观上的“爱国主义”者；儲安平在“政治上”沒有“勾搭上”罗隆基；叶篤义“远在1952年就在政治上和他（罗隆基）划清了界限”；馬哲民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同李伯球都是“受毒而不自覺”的。如此这般，个个都“干淨”、“漂亮”的很。

那么他們为什么又都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呢？据說这也只是：“立場不穩，为右派言論所动摇”，“容易被右派分子所利用”，“給‘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場”，“不自覺的充当了右派的工具”，“血压过高”而“冲动”了，“不知不觉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立場”而已，为此，他們“开始还覺得忠心耿耿滿腹委屈”呢！

章罗联盟的首腦之一，被上述右派分子指为“受他利用”的“他”，即罗隆基，总應該是一名右派分子了吧，然而据說也不是的，只是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自問絕對沒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不仅自己，就連他的“无形小組織”中的人，也只是“勾結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而并非就是右派的。借用武家坡上薛平貴一句話：“真真地推了一个干淨啊！”

彼此都是“被利用了”的，或者仅仅是“助长”者，而真正的右派分子却隱化成虛无縹緲不可捉摸的了；他們都信共有，但誰也无法具体的指出这是誰来。其实，右派分子也还没有神秘化到这种程度，这里玩的是一种障眼的游戏，明眼人是一望即穿的。因为“助长”者原就是“利用”者，“被利用”者即是所謂“被助长”者；他們既然彼此說：“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我助长了右派分子”，可見，这“被利用”的和“助长”的，原都是些确凿无疑的右派分子。

然而，这毕竟不是游戏，而是反映了右派“头面人物”的阴

險居心。如果听信了他們的說法，就只能對他們高抬貴手。因為既然都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热心追隨者，充其量也不過是犯了些“立場不穩”的小錯，而且誠惶誠恐“投降”、“認罪”了，還有什麼过不去的呢？

人們變得聰明了，懂得了對賊是不能講“雅量”的，對於狡猾的慣匪尤其不能講什麼“雅量”，而是要對他們進行更堅決的韌性的戰鬥。隨着時間的推移和鬥爭的深入，“賊”形畢竟是要完全暴露的。馬哲民派人製造“小匈牙利”事件陰謀的暴露，羅隆基新的罪証的揭出，不就是一些例子嗎？其他人的尾巴，終究也是藏不住的。“自作孽不得活”，要想得到人民的饒恕，還是少耍些花招為妙。

（1957年8月12日“人民日報”）

反右派耍狠

禹 林

報載：太原鐵路管理局設計事務所右派分子王少英，在該所共青團員集會反擊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時，竟故作鎮靜地說什麼：“大家幫助我，應該和風細雨些，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來幫助我才對。”

很明顯，這個右派分子是在麻痺我們，軟化我們，是想逃避鬥爭。右派分子的花招是不難揭穿的，王少英就被當場駁斥的啞口無言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溫情主義的同志，很容易上這種當。他們雖然也承認右派分子是危險的，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但是總覺得鬥爭方式“過火了”，應該“和風細雨些”，

甚至錯誤地也認為對右派分子應當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特別是有些人認為本單位的右派分子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不同，認為他們沒有章伯鈞、羅隆基的罪惡大，對他們恨不起來，鬥爭時腰杆不硬，生怕傷害了右派分子似的。這是非常不利於反右派鬥爭的。

我們黨一貫是主張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用和風細雨的办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現在和將來也仍然要堅持這個公式。不過這裡要明確的是，這個公式只適用於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我們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他們既然是反動派，我們怎麼能夠把反右派鬥爭當作一般的人民內部矛盾來看呢？儘管右派分子中有主帥，有大將，有骨幹，有小卒，罪惡大小也不完全一樣，但是他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則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企圖毀滅社會主義，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也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是有罪的。就拿王少英這個右派分子來說，他曾猖狂地說“要殺共產黨一千個、一萬個……”，他還說“中國如果也象匈牙利一樣鬧大民主，我是一個積極擁護者”。再听听江蘇無錫的一個右派分子江乃方的叫囂吧！他說：“我是右派分子，我是你們的敵人……你們要鬥爭我們，你們遲早要被我們俘虜的。我在這裡大喊一聲，提醒你們！”請看，右派分子這麼杀气騰騰，這難道是和風細雨？這難道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嗎？其實，他們早就承認自己是人民的敵人了啊！要知道我們和右派的矛盾實質上是敵我矛盾，我們和右派的鬥爭則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因此，我們對右派分子的鬥爭要堅決，要狠！“堅決”就是要認清這一鬥爭的實質和目的，站穩工人階級立場，毫不动摇。“狠”就是對任何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和陰謀，要根據事實充分地加以揭露；對這些謬論

要进行充分的說理斗争，彻底批判，把它們全部粉碎。当然，矛盾是可以轉化的，我們也要努力爭取右派分子回到社会主义立場上来，真心向人民低头認罪，彻底改造自己，重新作人。我們的方針是要把一切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問題就在于右派分子的态度如何了。不过，右派分子是很頑固的，只有我們首先把他們的丑恶面目和一切罪行彻底揭露了，使他們的一切企图和幻想破灭了，才能使他們在群众中完全孤立起来，也才有可能挽救他們，促使他們向人民投降。如果他們的态度很頑强，不老实交代，不放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梦想，我們對他們的斗争又不狠，这不但縱容了他們，也不能教育群众和他們划清思想界限，反右派斗争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也就談不到爭取他們、挽救他們了。所以我們对右派分子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使他們感到“无地自容”，除非向人民低头認罪。

（1957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

致“最大的善意”論者

昌 達

反右派斗争中，曾有人以各种各样理由来劝說我們，要用“最大的善意”对待右派分子。

在緊張的階級斗争中，对于这种劝解想要不理，又恐怕态度簡單，使人以为我們太不懂善意了。可是，要考虑这个意見吧，不免要遇上一連串的問題。

首先想到的問題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进攻的时候，

却不見这些人站出来劝劝右派分子，要他們也能用最大的善意对党、对人民。想当时，黑云压城，右派分子要夺走中国人民百年来的奋斗果实，置劳动人民于黑暗的深渊，繼續过解放前那种灾难深重的痛苦生活。其用心的恶毒，不可謂不明显，善意的先生为什么不觉得，不劝阻？而当党与人民起来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打退右派进攻的时候，却反轉来要求左派行善，背靠着誰，面向着誰，如此清楚，尽管口口声声說自己“公正”、“客观”，也不能不使人怀疑这所謂“善”的實質。

因此，接着想到的問題便是：什么是这些人的所謂“善”？“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的立場会有不同的解釋。以我們看来，打击这些想使历史倒退的政治野心家，以保証全国人民进一步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这正是最大的善。就是对这些右派分子，这狠狠的追击，也是为了使他們向人民繳械投降，能重新做人，以免罪上加罪。所以，辯証地看，这狠实际上也是对右派分子的挽救，因此也是最大的善。善意的先生为什么不覺其善？那么，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善呢？从有階級社会以来，何謂“善”就一直在爭論。墨子認為善的，孟子覺得惡。在有了馬列主义以后，这人性的善恶問題，便有了明白的答复。人性善恶問題就是階級性問題。按照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凡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与当时的人民在一起，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是善。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階級，今天为了彻底解放全中国人民，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而起来反击右派，并且挽救那些墮入反动道路的右派分子，这不是最大的善又是什么？

也許这些同志的意思是，右派分子意見虽然錯誤，但也有“合理的內核”，何不怀着最大的善意去“沙里淘金”？我們何尝沒有“淘金”？君不見，大大小小的会上，同志們都合情合理地与右派分子辯論、說理，一层层剝，一粒粒淘。只是事实太无

情：剝的結果，表面鍍的金一下就剝得精光，到了內核，剩下了什麼呢？只見隱藏着一顆不折不扣反黨反人民的心。其實，沒有善意先生的那種書生氣，明眼人早已知道了在各種外衣里面藏着的這顆禍心。我們依然這樣耐心說理，使右派分子口服心服，這也是善意。

對待右派分子，不論過去與現在，我們都沒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連從前以反共起家，屠殺過革命者的劊子手，我們都根據情況，寬大為懷。問題在於他們的階級本性難移。是狼就慣於反咬人一口，東郭先生的狼狽相曾經引起我們發笑。因此，除了那些打着“善意”招牌企圖勸我們住手，以便要我們挨打，別有用心的人以外，我想也以最大的善意奉勸“善意”的先生，為了人民，也為了自己的生存，狠狠地與右派分子作鬥爭。

（1957年8月26日“中國青年報”）

是非和溫情

何 明

右派頭子羅隆基拉攏邵慈雲時，這樣說：“共產黨只講是非，不講溫情，象咱們小資產階級是講點溫情的。”（據9月3日“人民日報”第二版載）

不愧是老狐狸！羅隆基還真是有兩手。他確是看准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弱點：是非不分，溫情主義；而且也很知道溫情主義的斤量：你對是非馬虎一點，來點溫情主義，就幫了右派的大忙了。當然，羅隆基之流，並不是不講“是”“非”的，而相反的是“是”“非”分明的；君不見他們高喊社會主義一

切皆非，資本主義一切皆是嗎？他們不是為他們的“是”而鬥爭嗎？不過，他們的“是”和“非”是主觀的，他們主觀上認為“是”的，正是“非”，認為“非”的，正是“是”。拖着社會倒退的敗類的是非，就是如此。自然，他們又決不是什麼溫情主義者。他們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有不共戴天之仇，只有恨，那有一絲半點的溫情。而說什麼“咱們……講點溫情”，那是“狐狸給雞拜年”的詭計。他們對誰有溫情？對反革命，對一切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渣滓。君不見羅隆基為反革命呼“冤”嗎？

不錯，共產黨是最講是非的，一切要是非分明，尤其是和右派鬥爭——堅持大是、打倒大非，更是萬分認真。但是，它也最有溫情——對人民的熱愛。堅持大是，打倒大非，對右派分子毫不留情，決不講“溫情主義”，正是對於廣大人民的深情大愛。而對於人民內部的是非，也要說清楚；但卻是一保護、二批評，與人為善、“治病救人”，“溫情”、熱情的幫助人們進步。很顯然，越是是非分明，越是對廣大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對真理的熱愛。

右派分子提倡不講是非的溫情，那是狼在獵人面前耍的花招。你溫情一下，把它放過，它就自由自在的“溫情”的去吃人了。

把是非和溫情絕對起來，是騙人的把戲。其實，人們都是愛其所是、憎其所非的。有誰會反過來，愛其所非，憎其所是呢？天底下沒有這種人。不過有些人，是非馬虎，愛憎也不分明罷了。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就常常是這樣的。然而，是非模糊，或是是非不分，一律對之溫情，那也就偏袒了非，冷淡了是。在階級社會里，對人對事有所愛，必有所憎；你對右派分子有溫情主義，也就是對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缺乏熱愛。誠如魯迅先生所說：能憎才能愛，能殺才能生。

无产階級所認为的“是”，是客观真理；无产階級的“温情”（或者叫“热情”更适当一些）是对于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唯其如此，所以对于吃人的恶魔是极端憎恨的。无产階級的爱是偉大的，憎也是偉大的。而温情主义者則缺乏这种偉大的爱，也缺乏这种偉大的憎，所以常常稀里糊涂的帮了坏人的忙，以致被拖下水去。这一点，右派分子倒是心里明白：你接受了温情主义，我就可以捕住你，为我效点劳。我們千万不要以为温情主义是无足輕重的小毛病。

右派分子是我們的好“老师”，但需要从反面来学习。我們看到右派分子是怎样欢迎温情主义、极力要勾起某些人的温情主义，他們把温情主义的斤量看得多重，也就懂得了为什么必須坚决彻底的克服温情主义了。

（1957年9月7日“中国青年报”）

疑虑和温情

原应南

反击右派的斗争正全面展开，节节深入。絕大部分青年乘胜直追，斗志昂揚，他們态度明朗，立場坚定，不仅反击了右派，而且教育了自己。在这同时，却也有一部分青年，还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斗争的火力稍猛，他們就觉得过于严厉，右派的几点眼泪，又会引起他們无限怜悯。总而言之，他們在斗争中观望，对党的做法怀疑，对右派分子不无同情。就是說，还有些温情主义。

有人說这种青年是好心腸的“东郭先生”，那是不尽然的。

这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的报复，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象个透视镜，每个人的立场、感情，都会表现得清清楚楚。现在的形势，说简单确也简单：一方面，右派分子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因此给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在这样一个斗争面前，对谁同情，对谁疑虑，还不是立场、感情问题是什么？对右派分子还有温情，如果不赶紧砍断，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还不明显么？

这些青年的温情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暧昧态度，大都是由于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楚。那么，我们不妨剖析一下他们的疑虑：

一种是：“对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这样大张旗鼓地斗争，会有伤和民主党派的团结，会妨害相互合作。”不对。我们党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基于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各民主党派所一致举手拥护的宪法。宪法明确地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明确地规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符合这样基础，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合作；而离开这个基础，那么所谓团结合作不过是假象，实际上是貌合神离。这就要斗争，要戳穿假相，否则对社会主义就不利，民主党派当中的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就是离开了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基础的。既然如此，为了达到和民主党派的真正团结合作，对于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就必须迎头痛击。扫除这些谬论的黑云，才能显现出宪法的光芒。这不仅符合我们党的要求，同样也符合民主党派的要求。民主党派愿意和我们党很好地合作，而右派分子正是少数妨碍这种合作的败类，他们不能代表民主党派。因此，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批判，不仅不是妨碍我们党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相反，有利于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加强这种团结合作。“那么，又何必把他

們的陈年旧賬都翻出来呢，岂不是器量太小了么？”那些“好心腸”的青年又頗为不忍了。我們說，这无所谓“器量”，这样做对人民有利。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以前因为他們还可以做些事情，所以不念旧惡，不究他們的丑惡历史。可是那些右派分子却以为人民可欺，把自己装扮得純洁善良，“左”得可爱，于是招搖撞騙，連特号的右派分子罗隆基都說把“骨头燒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来”。那么，我們就老实不客气地把他們的鬼画皮一层层地剝下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讓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貨色，免得他們再欺騙人民，迷惑青年。

“那么，对党內的右派分子总可以寬容一些吧？他們中間有許多老干部，沒有功劳，还有苦劳。”不对。應該一視同仁。我們党是爱护自己干部的，他們是我們党的最寶貴的財產。然而我們的党是无产階級的先鋒队，它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队伍，它要作战。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一場异常艰巨复杂的战斗。而党內的右派分子，就是在这场战争当中投敌叛变，作敌人里应的分子，这样的干部已經不是党的財產，而是党內的蛀虫，他們和党外右派已没有什么差別。請看右派分子刘宾雁的自供：“我心目中那个党，是一个放弃对敌斗争，紀律松弛，各种思想和平共处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大同盟，是一个資本主义国家里乱嘈嘈的議会的那种党！”他們虽然名义上是黨員，可是實質上他們在反对党，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他們竭力按照他們的反党綱領改造党。如果这种政治野心得逞，哪里还談得上无产階級事业，不过是資产階級复辟而已。无产階級自然絕不能允許資产階級再騎在自己的头上，因而也絕不寬容混入自己队伍的資产階級的代言人。尽管他們当中有些是老干部，然而現在，他們和党之間存在的不是一般分歧，而是根本政治路綫上的分歧，是階級立場

的分歧，是政治綱領的分歧。党在这样严酷的階級斗争面前，自然不能姑息养奸，作无原則的寬容。

“对高級知識分子当中的右派分子可以留点情面吧，这些讀書人最怕名声扫地”。不对。如果說他們名声扫地，那么也是自作自受。对于高級知識分子，党和政府一向十分尊重，給他們很好的研究和生活条件，給他們很好的政治待遇。如象費孝通、錢偉长等，每个人都身兼許許多多的重要职务，待遇可謂极其优厚。可是他們仍然野心勃勃，心怀叵測，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們一心向往着資本主义，对于工人階級的領導是并不服气的，相反的还存心要跟工人階級較量。他們滿腦子資本主义，可是表面上还是高級知識分子，温文尔雅，道貌岸然，唯其如此，他們才能从容不迫地在青年当中散布毒素，扩充影响。如果不把他們的真相剝开，他們仍然会迷惑一部分青年，毒害青年；而且，如果不批判得他們心服口服，他們就不能真正地把立場轉过来，衷心地拥护社会主义，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就会伺机而动，还要貽誤青年。因此，不留情面地把他們的資產階級观点彻底駁倒，是对人民对青年大有好处的。孔子不老早就說过么，“予岂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或者，对青年右派分子的斗争不必那么猛烈，他們年幼无知。”不对。青年中間的右派分子并非出于一时言行不慎，他們的言行都有着深刻的階級根源，思想根源，都有着系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綱領，这些右派分子无的只是无產階級的良知，却很有資產階級之“知”。他們有資產階級的“知覺”，也有資產階級的“知識”。而且，又正因为他們年輕，他們在社会上工作的日子正长，会对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也就必須在斗争当中彻底改造他們，絕不姑息，使他們真正洗心革面，将来真正干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虽說如此，可还是有的人觉得这样是“太无情了”。的确，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存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对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无情的，可这正是因为对广大人民有情。我们不能一任右派分子叫嚣，一任他们篡夺领导权，再把人民拖进水深火热的时代里去，因此才狠狠地打击右派分子的阴谋，以保卫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前途。

因此，实际上，党对右派分子还是采取了寬大的挽救的态度的。问题在于右派分子自己，要他们自己去决定是自外于人民，还是赶紧低头认罪。

因此，我们希望那些仍然有温情主义的青年坚定起来，积极地投入斗争。否则，对社会主义建设，对自己的锻炼，甚至对右派分子本人，都没有好处。

(1957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应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星 环

当右派分子伪装老实，作出“检讨”，甚至痛哭流涕以示“忏悔”的时候，有些“好心肠”的人就被这种检讨和眼泪蒙蔽住了，他们说：算了，不要再斗争了，不要“一棍子打死”。

这些同志太天真了。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犯了某些错误的人，他们是从骨子里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达目的，死不甘心。他们的立场异常坚定，毫不模糊。章罗联盟在太原的“大将”王文光，不是就毫不隐讳地

叫出他“甘心死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嗎？

右派分子採取假檢討的戰術，目的就是混過這一“關”，等到反右派的鬥爭過去了，再窺伺時機卷土重來，東山再起。如若不信，有事實為証。

河南省的右派分子李白鳳，五年以前在他的所謂“蘇聯文學研究”一書受到批判後，曾滿懷仇恨地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我是狼，不怕流血，將來索代價”。“要算有些人的賬，三、五年後再說。”果然，今年春天，當天空一度黑雲翻滾的時候，李白鳳認為“索代價”的時機到了，就張牙舞爪地向人民反撲過來。他在開封師範學院鼓動學生鬧“大民主”，要挾院長快“斬馬騮”，在學校外面的許多報紙刊物上到處放毒，還親自到河南省文聯去點火。

今年春天，四川省的右派分子流沙河的毒草“草木篇”受到了批判。當時，這個以石天河為首的反動小集團，就密謀採取各種卑劣的手段，向黨進行反撲。反撲失敗以後，流沙河瘋狂地叫囂：“老子二天（即以後的意思）還要干。”在群眾正義的反擊下，這伙右派分子的反動氣焰表面上是降下去了，但是，正如這個反黨小集團的另一右派分子徐航所說的：“緘默並非消沉，緘默是彈藥正在裝進炮膛和槍膛。”果然到今年5月，這伙右派分子在“裝滿了彈藥”之後向黨進行了又一次攻擊，放出了他們的所謂“原子彈”。這次反撲，又被粉碎了。人們也許會想：這次流沙河等人該要向人民投降了吧？且慢樂觀。這個反黨小集團的頭子石天河，又在作新的部署了。他指示流沙河：“鬥爭是必須繼續的……希望你保持樂觀……不要完全採取退出的態度。”

黨外的右派分子“狼”心不死，黨內的右派分子又何嘗不是如此。以“電影的鑼鼓”首先向黨敲起戰鼓的鍾惦棠，雖然右派

面目早已暴露，反党鑼鼓也已敲破，但仍然拒不投降，指示他的党羽周文博，要他在由上海回北京之前，必須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大举向党进攻。

好了，好了，事情已經够清楚了。右派分子是千方百計、甚至可說是“百折不撓”地想把社会主义、把共产党“一棍子打死”的。當他們的第一棍沒有打成功之后，他們还要打第二棍、第三棍、第四棍……总之，要把社会主义、把共产党、把人民的天下“打死”为止。对于这样一些反动彻骨的人，难道我們还能够對他們温情脉脉而“不一棍子打死”嗎？他們已經公开告訴我們：“我是狼”，而且已經露出了吃人的牙齒，我們难道还要做“好心腸”的东郭先生嗎？如果不想被狼吃掉，就得一棍子打死它。这是东郭先生最后对付狼的办法，除此以外，別无其他办法。

不过，話要說清楚，我們所說的“一棍子打死”，和右派分子所說的“杀共产党人”不同。我們只不过是彻底、全部、干净地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和行动，讓他們在人民面前原形毕露，不能再迷惑人、禍害人。也就是說，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們“一棍子打死”，打得他們再也不能兴妖作怪。

（195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論打“落水狗”并不違反忠厚之道

願 言

“中国人善打落水狗”，这是上海的右派分子滕白也写給另一个右派分子陈仁炳的信里面的話。落水狗三字听來刺耳，然

而也沒有办法，因为这是右派分子們的本来的面目。

不錯，中国人善打落水狗。这并非我們秉性不“仁”，而只是因为我們吃够了不打落水狗的苦头。中国人素来忠厚，剛勇的拳师就决不再打那倒地的对手；免战牌一挂，就决不破城而入，乘胜追击那残余的敌人。忠厚人总以为对手也是忠厚之輩，向来是并不“嫉恶如仇”的。但是，“嫉善如仇”的人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往往“因为先烈的热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們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注〕东郭先生从猎人手下把狼救了出来，真是一片惻隱之心，忠厚得可以了，誰知狼得救后，却轉而要吞掉东郭先生。

我不知道是否确有东郭先生其人，然而我明白，这是总结了多么惨痛的經歷以后才得出的教訓。

回头再說落水狗。狗在岸上要咬人，而且势利得很，忠厚人有时也主張打下它的威风来，然而一經落水，又装出可怜相，忠厚人就以为此番一定悔改，不必“操之过急”了，于是心一軟，手就打不下去。殊不知“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聳身一搖，将水点洒得人們一身一臉”，〔注〕而后来性情还是不变，一有机会，还是要狂吠，要咬人。到了此时，忠厚人也只好一反忠厚之道，主張再打下它的威风来，不过，这不但比前費事，甚至“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对真正的忠厚人，我們应当說清楚这个道理，讓他們懂得打落水狗并不違反忠厚之道。对落水狗温情，看来仿佛忠厚，其实却是最大的殘忍。因为落水狗不打，爬上岸来，不但要将污水点洒得人們一身一臉，而且依然要咬人，連忠厚人自己也不免要被咬一口。所以，对落水狗有情，其实就是对那曾經被咬过、或者以后会被咬的人的无情。但是，另外还有一些所謂

忠厚人，他們貌似忠厚，其實心懷叵測，忠厚只不過是一層偽裝；他們原是落水狗的同類，希望人們對落水狗手下留情，不只是为了保護同類，也是為了保護自己，以便他們最後并合起來進行凶惡的反撲。對於這些所謂忠厚人，我們就要揭穿他們的偽裝，露出他們的真實面目來。

右派分子不是自封為落水狗的嗎，一點不錯，我們正是要打落水狗。不但要打，而且要狠狠地打。為了幫助右派分子“上岸”重新做人，在他們沒有改掉咬人的本性以前，我們是決不吝惜氣力和時間的。

〔注〕 這兩段話引自魯迅：“論‘費厄說頌’應該緩行”，見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一卷。

（1957年8月20日“人民日報”）

在“給黨員提意見”的背后

德 麟

有人說：有些人在“大鳴大放”期間只不過攻擊了某些黨員，並沒有攻擊整個黨，也沒有反對社會主義，說他們是右派分子，是不是有些過火？難道反對個別黨員就是反對黨么？

我以為，這論調，倘不是右派分子自己放出來的煙幕彈，至少也是患有“溫情病”的“好人”們的糊塗議論。這些“好人”們還沒有識破：右派分子的用意並不在於反對個別黨員，而在於用誣蔑個別黨員的辦法來丑化整個黨，從而達到推翻黨的領導的目的。因為右派分子懂得，黨是由黨員組成的，如果把一切黨員都形容成了壞蛋，那麼，整個黨的“一團糟”和應當“下轎、

下台”，就成了极其自然的邏輯結論。

有例为証。

在我自己工作的那所高等学校里，整风是从对党的工作和党员提意見开始的。在初期，广大群众本着爱护党的精神，对党的工作和党员提出了許多本質上正确的批評，我們是誠心誠意地听取的。但是到了后来，这“提意見”渐渐变得有点稀奇古怪了，成堆的栽誣、辱罵披头盖臉而来，一个一个的党员渐渐被說成世界上最丑恶的人了。这叫做“帮助党整风”么？后来一查，才明白，原来右派分子躲在各个单位里，混在群众当中，也来向党员“提意見”了。他們的“意見”是那样地多，那样地駭人听闻，以至于非把某些党员撤換掉，甚至逮捕法办不可。

确实，就这些躲在人群里“提意見”的先生們个人來說，似乎“只不过”攻击了某一些党员（对于离开他比較远的党员，他甚至不惜加以恭維），但是因为这些先生們几乎在各个单位都有，所以，倘若縱观全局，則人們的眼帘下就会呈现出这样一幅可怕的图景：所有的党员都是“杀人魔王”、“奸夫淫妇”、“違法乱紀分子”、“三害分子”、“踏着別人的尸体向上爬的人”之类，不仅不配做领导工作，而且也不配做人，当然只好一概“滾下去”了事。事实上，那些“指导”全校活动的右派先生們在“意見”提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也就出来作“結論”了：有的說，这个学校的党员“大都是品質恶劣的”；有的說，这个学校的新党员都是凭“入党术”入党的。于是，他們亮出家底，提出要解决“带根本性的問題”，要改变“制度”，就似乎是极有根据的了。不难明白，右派先生們对于誣蔑党员如此的不遺余力，乐此不疲，是用心良苦的。他們原来想把对于个别党员的丑化汇合起来，达到丑化全党。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

有人担心：照你这么說，似乎凡是对党员提过尖銳意見的

都有右派分子的嫌疑了，以后誰还肯提意見？我們說，我們黨員确实有缺点，有錯誤，我們永远离不开群众的批評，正象魚离不开水一样。善意的批評，即使言詞再尖銳一些，也还是有益的，我們热烈欢迎。但是恶意的攻击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們不能挨了敌人射来的毒箭还要称赞他射法的高明，对他表示謝意。只有坚决地击退这些“毒箭”，才有利于广大群众开展积极的批評。担心是多余的。

有人担心：善意的批評与恶意的攻击实际上难于辨別，我以為其实不然。右派分子丑化黨員的手法頗多，試举数端：

第一，是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地給黨員加上許多极大的罪状。例如一个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造謠說一位黨員負責干部偷了学生膳团的魚，而且繪声繪形，仿佛实有其事，并用大字报、漫画加以尽情的丑化，弄得滿城风雨，連小孩也知道“××偷魚”。又如硬說某黨員“强奸少女”，某某黨員是“奸夫淫妇”，居然也举出了“事实”，而其实乃是百分之百的捏造。右派先生們当中有許多“造謠专家”，他們是专干这一行的，其“勇敢”固无足怪。

第二，是故意把黨員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說成是黨員的品質問題。例如把肃反中的錯斗錯查說成“阴謀陷害”，說成“踏着別人的尸体向上爬”，說成“丧尽天良，灭絕人性”。有的甚至干脆說黨員是“卑鄙无耻”的“特务”和“便衣警察”。

第三，是故意把黨員根据組織原則和工作制度办事說成是黨員为了个人私利而运用的卑鄙手段。例如把請示汇报說成“吹牛拍馬”，把执行上級的決定和指示說成“欺上压下”，把党团負責同志組成的領導核心說成“阴謀集团”，把黨員对积极分子的信任和依靠說成“宗派主义”。

如此等等。

我想，凡未患“政治伤风症”的人们都可以嗅得出，这些先生们的“提意见”的内容是多么奇特，他们的“意见”与群众的善意批评又是多么不同。这难道还有什么十分难于辨别的么？

其实，右派先生们的这一套手法，早由他们的首脑人物储安平奠定了“理论基础”。储安平不是在那里起劲地反对“每一个单位都要派一个党员做头儿”么？如今右派先生们就正是在以丑化党员的办法来实现储安平的理想。如果经过他们的努力，把这些党员“头儿”都“撤换”了，“逮捕法办”了，那么可恶的“党天下”自然就完蛋了。这对于右派先生们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啊！不过，在“党天下”完蛋之后，是个什么“天下”呢？恐怕还是1949年以前的那个旧“天下”罢。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是理解得并不比“高明”的右派先生们差些的。

(1957年9月6日“长江日报”)

是“說錯了話”嗎？

丁 冲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目前的手法之一，是把自己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归之于“說錯了話”。于是他们装得象总结经验教训似地说：“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从今以后还是学做“金人”（金人即铜鑄之佛像——引者注）吧！

在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时，說錯了話的人的确是不少。有的同志由于看问题的片面性，只看到局部，沒有看到全部；有的同志由于道听途說，沒有調查研究；也有的是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不从工作出发。凡是具有以上几种情况的人，在“大放大

鳴”中所說的話或寫出的文章，往往是主觀、片面，或者是偏激的，因此就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甚至還會與右派分子的言論相呼應。例如，右派分子利用“左葉事件”向黨進攻，有些同志當時不經過調查研究，也寫了攻擊左葉的報道和文章。我們能說這些同志都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嗎？顯然是不能的。因為他們說錯了話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而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是政治問題。兩者有原則區別。同時，客觀的事物是錯綜複雜的，而且是不斷地發展變化着的，由於我們的認識能力有限，因此我們的主觀認識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符合客觀實際。特別是一般的人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還很不夠，說錯話更是難免的。黨從來沒有要求提意見的同志要百分之百的正確，也從來不追究提意見說錯了幾句話的同志。相反地黨百般鼓勵大家，要大家打破顧慮，大膽地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以便改進工作。

一般同志看到黨和人民政府工作上的缺點，是善意地提出批評，幫助克服缺點，從而加強黨的領導。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有意誇大缺點，甚至無中生有，顛倒是非，混淆視聽，以便煽動一部分群眾向黨進攻。他們叫囂共產黨搞得“一團糟”，趕快“下台”，要“輪流執政”，還誣蔑共產黨是“黨天下”，竟公然要“殺共產黨人”。可見右派分子具有自己的政治路線和政治主張。大多數右派分子更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向黨進攻。他們說出來的話和寫出來的文章，都是經過反復思考，有的還經過他們的小集團集體研究。顯然他們不會輕易說錯話的。右派分子把自己一切反動言論歸之于“說錯了話”，是想掩蓋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企圖隱藏在群眾之中，蒙混過去，以便“東山再起”。同時，他們又是借此誣蔑黨和人民對他們的反擊，並打擊群眾幫助黨整風和反擊右派的積極性。

資產階級右派的老爺們，总是把自己估計得那么聰明、能干，把人家估計得那么愚蠢。殊不知中国共产党具有三十余年階級斗争的丰富經驗；广大群众几年来經過許多次政治运动，在党的教育下，也都普遍提高了覺悟，擦亮了眼睛。因此識別右派分子并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主要标志是：仇視和反对社会主义及党的領導。他們的政治傾向是鮮明的，階級感情是强烈而深厚的。縱然他們說出来的話和写出来的文章是回环曲折，遮遮掩掩，欲吐还吞，放中带收，如“才子”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以及蕭乾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等匠心制作，但是一經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各方面事实的对証，也就原形毕露了。右派分子既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就不难被揭发出来，何况他們的反动言行大多是一貫的，有其历史的根源。据目前全国各地所揭发的右派分子，有的是长期一貫反共，并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家伙；有的是过去做过坏事在历次运动中被斗争，因而对党不滿；也有的是出身反革命、地主、資產階級的家庭，品質恶劣，坚持反动立場的人物，或者是长期受資產階級思想侵蚀，个人野心和个人欲望不能滿足，发展到政治上反党的人物。这些家伙耍任何花招和手法，均将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輝照耀下一个个露出原形。

(1957年9月4日“解放日报”)

斥“惜才論”

張 起

反右派斗争中，某些人的“惜才”观点又有所抬头。

“惜才論”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說法，今天又有了新的論据。他們說在过去历次运动中，反对惜才观点，都是对的；但在今天反右派斗争中却不得不考虑到真正的人才問題。因为过去几次运动中的对象，真正的人才总是一小部分，而今天的反右派斗争所涉及的多是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授等等大知識分子，是一些真正的人才。不考虑到这一点，必然使我們蒙受不可弥补的損失。所以，今非昔比。

果真“今非昔比”嗎？然，亦不然。

从現象看，的确，反右派斗争比过去历次运动所涉及到的“大知識分子”要多些，但这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要探求問題的本質，談“才”就必須弄清“才”是为誰服务的，否則就根本談不上可惜不可惜的問題了。

不論过去的三反、五反、鎮反、肃反或今天的反右派斗争，我們的着眼点只有一个，要反的都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人。这些人所干的勾当是直接違背人民利益的，因此人民就要“反”他；只有这样，才能保卫人民利益不受其損害。对这些人，他有才也好，无才也好，才大也好，才小也好，其本質是一样的，我們不能怜惜其中的任何一个。

人的“才”是受人的支配而發揮作用的。人不是机器，是有思想、有立場的高级动物。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立場决定

着人的思想行为。站在反人民立場上的人，縱然他才大无量，于人民何益？相反，其才愈大，所干的反人民行为愈凶狠，对人民危害愈深。

今天的右派分子中确实不乏“才俊之士”，有的还是专家教授之流的大知識分子，然而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上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在这种反人民的勾当里發揮了他們卓越的“才能”，象这样的人才是應該怜惜呢抑或必須反对呢？这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任何人都应弄清的一个界限問題。

当然，假如这些右派分子不是右派，假如他們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那么如果失去他們是可惜的。但这仅是一种假設。我們今天对右派分子开展斗争，倒是希图挽救他們，只要他們能够向真理低头、向人民服罪、脫胎換骨、痛改前非，人民还是可以寬大他們，給以工作机会。这才是真正的惜才。只有那些頑固的右派、坚持反动立場、坚持与人民为敌，那是他們自絕于人民，对于这样的人，毫无怜惜之可言。

“今非昔比”是錯誤的，在階級斗争里任何时候都必須反对离开階級观点的“惜才論”。

（1957年8月3日“光明日报”）